

张闻天的民主追求与实践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82 周年

● 何 方

党的十六大决议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邓小平也早就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然而从当前情况看,政治改革又明显滞后,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值此纪念党的生日之际,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党在民主问题上走过的道路,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但这个问题太大,一篇文章很难说清。因此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民主思想和作风堪称典范的一位早年党的领导人张闻天的某些情况,也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中共党史上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的一代“明君”

张闻天在 1935 年遵义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他上任后,一改原来的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作风,反对突出个人,开了中共党史上一代新风,把中央的领导作风提到一个新阶段和新水平。这

在当时是得到全党公认的。整风开始时毛主席说,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和遵义会议到抗战开始后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和我党生动活泼的两个时期。这以前,他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也曾倍加赞扬,戏称其为“开明君主”或“明君”,说洛甫(张闻天)这个人很民主,不争权,主持会议能让人畅所欲言。

张闻天一生都坚持马克思强调的领导民主化和反对个人决定问题,在任何领导岗位上都贯彻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后,他为纠正前任的一言堂作风有点矫枉过正,如同毛主席后来批评的,“洛甫每天要开 20 余人的中央会议。”这当然不必要,还可能误事。所以他很快就采纳毛的建议,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军事小组,授权对一般行军作战便宜行事。但他仍坚持重要问题开会解决的严格制度。直到 1938 年 2 月,他还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央经常要保证四、五个人的集体领导。”在任总书记的几年间,他主持的正式中央会议(多为政治局会议和常

委会)就有 137 次。他不像有些人那样,权力小时要求多开会以争取发言和参政机会,等到大权在握时就嫌开会麻烦了。因此开会多一直是张闻天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总书记,中央的会多。当省委书记,省委的会多。当大使,他也要实行集体领导。一个政治局委员级的大使和使馆二秘以上干部组成馆委会,定期进行,每季度还向全体人员作一次馆务报告,使内部工作完全透明,以取得群众监督。

张闻天坚持集体领导和反对突出个人,还表现在任总书记时这样两个不大为人注意的问题上。一是为使会议更加民主和体现领导集体的平等地位,除讨论全局的中央会议外,他自己一般不作报告和结论,而规定由分工负责有关问题的同志来作。所以那时的会议报告人常有变动,如讨论属于统战问题的西安事变是毛泽东作的报告和结论,白区工作会议又是先由刘少奇作报告。在一般会上,他也同大家一样在讨论时发言,只是必要时最后再作个简短的总结发

言。二是发电报,除少数一般性问题外,他总是避免个人单独署名,而尽量同其他领导人联名,其中单是和军事统帅毛泽东在三年内联署(多用“洛、毛”)的电报就有286份。有人估计,张闻天任总书记期间的中央会议之多和领导人联名电报之多,可能在中共党史上属于空前绝后。

张闻天不突出个人,甚至有点视名利如敝屣。对过去的工作和著述,哪怕是天大的功劳,他也从不提起,不让人知道,不想历史留名。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十余年,但对上世纪30年代下半期革命转折时期,他做的扭乾转坤工作,却几乎一无所知。在西安事变后他作为中央第一把手,

身履西安险境,领导处理问题,我还是在参加“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工作后才知道的。他从不愿抛头露面,遇到领导人合影总是往后躲。例如斯诺访问陕北,他以总书记身份会见过,但在《西行漫记》所附70余张照片中,其他领导人几乎全有留影,惟独没有张闻天。1935—1937三年间,中央绝大多数重要文件均系他起草,包括《遵义会议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这些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文件,但在他生前很少有人知道。

张闻天民主思想的核心:人民群众是主人

1949年,张闻天任中共辽

东省委书记,我在省青委做筹建青年团的工作。一次,他要向省委干部作关于群众路线的报告,要我做记录并于会后整理发表。这就是《张闻天文集》(四)选登了那篇《革命胜

利后的干群关系问题》。

张闻天报告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一句话:“人民是主人。”许多阐释和论述,都是以此为f中心的。例如,“人民是新社会的主人,是最高统治者,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现在是老百姓当权的时代,如果当干部的不好好为老百姓服务,对老百姓耍态度、摆架子、欺侮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就会迟早把他们撵掉,换上好的干部。”张闻天有关这一观点的论述,可说俯拾皆是,讲了一辈子。直到“文革”被发配广东肇庆,他还写了一篇《人民群众是主人》。其中又提到,党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这点之所以没做到,是因为一方面某些领导者常常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一方面人民群众中也有些人把党政领导者看作“官老爷”,“对他们歌功颂德,惟恐得罪他们而遭受惩处或迫害”。

根据我的体会,对于群众路线,张闻天的观点和我们许多人的了解根本不同。按我们原来所学,群众路线主要就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及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等等。其实,这只是视群众路线为好的领导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连封建社会某些比较开明的君主和清官都多少



1942年张闻天在陕北农村作调查

能做到。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就已有“采风”制,以了解民情,还可“择其善者而从之”。可见,我们原来的理解和张闻天的观点,实有天壤之别。这也是五四时期民主主义者和民本主义者之间关于“由民作主”还是“为民作主”的老争论。张闻天是继承和发展了前者,主张由群众“当家作主”。至于“为民作主”则近乎张之洞说的,只是“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这是站在群众之上的统治者和“父母官”的提法。旧戏上就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这同民主当然是两回事。

至于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没看到过张闻天直接回答的文献。但从他关于民主的浩瀚论述中,从他多年来的实践和言谈中,他并不认为民主只是手段。例如1949年在辽东工作时,他曾指导我写一本《人民代表会议讲座》,由他审阅修改后在报上连载(《张闻天文集》(四)中也选登了一节),其中就接触到这个问题。他以向工农讲话的通俗语言说道,革命是为了什么?大家说是为了解放。那解放又是为了什么?大家又会说,一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即解放生产力);二是为了当家作主、不受欺侮(也就是解放人本身,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而且在张闻天看来,不只长期以来的革命运动,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悠久历史中,自由和民主从来都是人们为之奋斗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他本人和大批知识分子参加

革命运动,争取自由与民主就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他对作为新文化运动方向之一的民主的解释也是:“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张闻天选集》第252页)这里已提高为制度,哪还能只是手段?把民主理解为手段,那就意味着是要以此达到别的目的。而且既然是手段,就不一定会认真对待:对本党或本人有用时加以强调,用过后又会抛弃。但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却恰恰是实现自由和民主。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未来要建立的社会则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自由和民主不可分。虽然自由并不等同于民主,但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与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所以在张闻天看来,问题是这样的简单:一个国家(或社会)是否民主,只要看那里的人民是否真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就可一目了然。

民主必须法制化而不能取决于领导者的态度

张闻天提倡和坚持的首先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干部的民主作风。民主制度

的前提是个人的自由和政治上的平等。他认为,把发扬民主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领导者的态度上,是对民主的误解。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因此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见《人民群众是主人》)。他所强调的法制化(他所处时代还很少谈法治),就是:在党内,严格遵守党章党规,保证党员应享权利和应尽义务(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在中国是张闻天第一个提出来的);在国家生活中,要完全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事,维护人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和社会的民主制度。由于无论过去在根据地还是解放后在全国,党都处于执政地位,因此他更重视党内民主。根据我个人印象,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强调民主法制化,特别是会议制度及干部的选举与罢免,张闻天大概是“木秀于林”。

对于会议制度,他更重视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应遵守党章规定如期举行,检查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改选中央领导;领导机关要定期向大会报告工作,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会议必须保持必要的透明度和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以免被少数人操纵和变成形式。在他主持中央工作后期的两三年间(前期因处于长征等极不安定的战争环境),在各种中央会议上讨论和决定尽早召开党的七大当在十次上下。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问题报

告中,张闻天对发展党内民主还专门提出“召集必要的经常的会议,大会,集体讨论,共同决定问题”。他任总书记期间,虽一直处于战争环境,但中央召开的大小会却并不少。直到1941年8月27日,他主持政治局会议还决定:每周开政治局会议一次,书记处会议两次。只是七大会期没能按原先的多次决定而拖延了多年。

对于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主张年会制,以防止造成个人专权和脱离群众。所以十月革命后,即使战争时期,俄共的年会制也从未间断,而且会议公开进行,报上还开辟争论专栏。只是斯大林当权后才逐渐加以改变,最后竟使十八大和十九大相隔十三年之久。中国党在陈独秀时代,亦即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也是实行年会制。六大党章虽仍写明年会制,但实际情况已变得很难实行。直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才决定“在最近时期”召开七大,并选出了准备委员会。此后虽多次提起,共产国际也再三催促,许多地方还按中央规定于1939年选出代表派往延安(我就是那年第一次参加了直接选代表)。但由于要先统一思想再开会(从此就都开成无争论的“团结的大会”),所以又经过四五年的整风审干(抢救)才于1945年举行,距六大已过十七年。七大党章改年会为三年,但在大半为和平时期还是过了十年才开八大。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等,就

更不讲章法了,以致有些政治局委员七、八年没参加过政治局会议,而一些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却可经常出席或列席中央多种核心会议。不按党章办事,不遵守会议制度,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有鉴于此,张闻天愈到后来就愈感到民主制度化的重要和迫切。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已实在忍耐不住,于是拍案而起,为争取民主(其实只是一点发言权)而被赶下政治舞台,后来竟做了十几年的阶下囚。

张闻天极其重视 按民主原则处理好党 和国家的关系并使之 法制化

主要办法就是党要通过各种会议的民主程序领导国家机关和其他群众组织,而不是直接命令和干涉。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又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还在建国前任辽东省委书记时,他就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办法是把人民代表会制度建立起来,使它真正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当“文革”期间各级人大已被停止活动时,他在流放中仍著文强调,“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无产阶级国家的表现形式。一切国家机关的重要决定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见《人民群众是主人》)“党不能超过国家,高居于国家之上”。“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的

讨论、审议、补充、修改和接受”。“党决不能靠少数党员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党只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內活动,共产党员还应成为尊重、服从和执行国家法纪的模范。(见《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还在抗战时期他就提出,我们不是只向国民党要民主,自己却不实行,不是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对立。“凡是我們向国民党所要求的一切民主权利,我们都应该首先自己实行起来。”(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这就把真实行民主和口头喊民主区别了开来。

不仅对于国家机关,而且对于群众团体,张闻天也要求尊重其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他批评那些“不去估计群众团体的特殊性,而一律使之‘党化’,或者不去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依靠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使自己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略谈党与非党的关系》)这种“党化”的或“官办”的群众团体,既不代表和反映本界群众的利益与要求,当然得不到他们的拥护,不仅形同虚设,还浪费国家钱财,引起群众不满。

最后还应着重说明的是,张闻天一辈子都特别重视民主选举制度。而且越到后来他越感到,造成党包办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关键还在体制,就是在一元化领导下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又往往集中于第一书记,变成

党委决定一切甚至是一个人说了算。还在上世纪50年代,我陪同张闻天到几个省去参观,就已看到从上到下各级书记的权威。例如一个有上千人的村子,党员一般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即使书记是党员选出而不是上面指定,他也成为该村的第一



1954年摄于列宁格勒,右起:宋以敏、何方、张闻天、鄢仪贞、刘英

一把手,领导和处理全村的一切事务。这哪里谈得上民主?

张闻天十分了解干部在社会主义国家所起的关键作用。因为实质上,在这些国家实现党的领导,主要靠的就是领导人的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干部的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如此明显,不仅张闻天,连宋庆龄在1979年2月给美国友人的信中也说,“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2002年6月13日《南方周末》董怀明文)无论终身制还是委任制,都是封建专制的传统。所以从五四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在为争取人民的选举权而呐喊奋斗。19岁的张闻天在《社会问题》一文中已提出“大家要干涉政治”,办法就是“实行普遍选举”。

他参加革命担任领导工作后,更是一直倡导用选举制选拔干部。即使在战争紧张的中央苏区,他也要求保证人民对政府干部的选举权、召回权(罢免权)、改选权,以及报刊的公开监督作用,并批评那种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现象。在任辽东省委书记时,他又明确提出,“今后干部要由人民代表来选举,当选的干部经常要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当某一个干部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可以将他撤换,另选好干部去代替他”。选举制度当然也适用于党内。在1938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就将“各级党委负责人的选举及定期的改选”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一条重要规定。他强调要严格按照党章党法办事,首先就指的是各级领导组织成员应由党员大会或由其代表大会选举,实行定期改选,免

去不称职的人和选进德才兼备的人。按理说,除非特殊情况,那种由上级组织(更不用说个人了)委任和变相委任下级党委书记的做法,是违背历届党章规定,因而是违法的。但由于多年来经常如此,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张闻天不但要求对民主政治和民主作风实行制度化和法律化,而且在其他问题上他都主张遵纪守法、按章办事,没有法度和规矩的,就应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做到一切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前外交部内部的许多规章制度,就是在他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他不只重视立,更重视行。他本人就是以身作则奉公守法的典范,在高级领导干部中也是少有的。例如我跟他工作十余年,还没发现过他有一次上班和开会迟到过。即使庐山会议后没完没了的批斗会,也

仍然如此。

张闻天民主思想和作风中值得特别强调的两个问题

张闻天的民主思想和作风不但贯彻始终,而且表现在各个方面。这里再谈两点:一是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二是仇视腐败,一生清廉。正是这两点民主精神和作风,现在更值得提倡和学习。

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一个悖论。作为既是知

识分子又是忠诚马克思主义者的张闻天自然受到这个悖论的困惑。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创立的,并且要经知识分子向工农灌输。既如此,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自当是工农的老师,理应受到工农政权的尊重。然而考茨基、列宁却认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对抗。所以一旦共产党代表工农在某地当了权,他们就成了改造和迫害的对象。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不但改造永无止境,而且每次思想

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多属于他们。

张闻天虽然未能摆脱这个悖论,但他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却在具体工作中缓解了许多矛盾。

张闻天对知识分子的民主作风主要表现在,尊重他们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他在整风《反省笔记》中曾检讨说,“我在马列学院内,特别提倡发扬民主,培养敢作敢为、敢独立思想的干部。”1940年《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又提“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的发扬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同年《关于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他也讲,“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党的领导要“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的充分自由”。还要照顾到“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仅从这几句话就已可看出张闻天确实是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

张闻天不只说说而已,实际上在工作范围内,做的还要多得多。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对他们宽宏大量、热情关怀、平等相待、以身作则,因而也获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这只要看他的许多学生所写回忆和怀念他的文章(如《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等)就会多少有所



1976年张闻天同夫人刘英在无锡

了解。直到现在,知识界对他的评价也还是很高的。至于张闻天信任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这里只举两个例子。有些喜欢提意见、被某些领导视为“刺头”而不愿意要的干部,张闻天不但不嫌弃,而且会和他們很好相处,带动他们积极工作。就是被李维汉、温济泽等同志描写为有个人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等严重错误的王实味,在张闻天领导下的两三年,不但没闹什么事,而且辛勤劳动,三年多翻译马列原著约200万字,同张闻天关系也处得好。又如合江省任省委书记时对日伪佳木斯市市长段宝坤的处理,也可视为正确处理知识技术人员的范例。段原系留日煤炭技术专家,日本败降前才把他拉来当市长。解放后,许多人认为他身为市长级的大汉奸,只能镇压。但张闻天认为他当市长时间短、民愤不大,且系工程技术人员,我们正需要此等人,因而应允其戴罪立功。他说服大家,并通过民主手段和集体讨论,最后决定对段进行保护和改造。后来段还因功不断得到提升重用。“文革”后他对访问者说,“有人死后要见马克思,我没那个资格,但我要用我的实践,死后毫无愧色地向张闻天汇报。”当然,像张闻天这样的个人作用终究有限。要真正在全社会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只有实行民主制度,大兴民主作风才有可能。

其次,张闻天的民主作风

也表现在节俭、廉洁、不搞特殊化上。这方面我的耳闻目睹极多,这里只提纲挈领地提以下几点。一是讲求节约、反对浪费。他一直强调我们国家还穷,应节约每一个铜板用来搞建设,不要图形式、讲排场。1953年他回国述职,就曾趁机向毛主席建议,取消每年的“五一”游行表演和对外国元首的夹道欢迎,参照国际惯例改革礼宾工作(后来在外交部又提出具体改革方案,因故未能实行)。对外援,他主张量力而行,千万不可打肿脸充胖子,慷人民之慨。

二是主张用法制规范干部待遇,做到公私分明,反对特权和特殊化。他非常讨厌那些用公款请客送礼、拉关系、巴结上级、谋私利的人。在驻苏使馆时曾有一总务干部,用公款给他报销了私人用的东西,不但当即受到他的批评,而且加上别的原因,还很快将这位同志调回了国。我还亲自听到过他批评各地竞相为领袖修建别墅的风气,认为影响不好,而赞赏胡志明始终保持俭朴。

三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的生活一直很简朴,连应享受的待遇他也推掉不少,例如退掉他不在家时给他新换的沙发和新铺的地毯之类。1950年进北京后,组织上安排了几处院子让他挑,他都嫌大,最后住进了一座临街的小楼,直住到被逐出北京。在外交部期间,几位副部长商议搬到东交民巷一个原外国驻华使馆大院,正楼让他住,其余

的楼大家各住一座。不料他坚决不搬,大家也只好作罢,直到1959年他被罢免,几位副部长才搬了进去。他对三个亲生子女的要求之严,可能在高级干部中属于空前绝后。他的大女儿始终是普通农民。二女儿原在外交部做打字员,他回国任副部长不久中央号召精简编制,他就动员女儿回上海去当了工人。1962年他送独生子去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一干就15年,他病逝时也没回到身边。

四是主动争取群众监督。在辽东时,他主张政务公开,加强舆论监督,鼓励发表不同意见,所以省委机关报上常有对当前工作的批评、建议和争论。到使馆工作后不能办报了,他便除开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外,还组织和支助俱乐部办墙报,而且每期必看,对墙报上的批评公开作答。

张闻天完全明白,要做到政治清廉、防止腐败,单靠教育干部为人民服务是不够的,根本问题还是建立人民群众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体制,只有人民及其代表掌握了各级干部的任免升降大权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张闻天一生关怀政治民主原则,老而弥坚,越到后来越加重视。仅以收入《选集》的文章看,从庐山蒙难起的13篇中就有7篇谈到民主问题。像他这样始终坚持民主信仰,条件许可时即尽力付之实施,遭到软禁时也还积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在中共领袖人物中堪称典范。

(责任编辑 致中)

西方民主

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 耿云志

七个阶段

近代一百多年中,中国人从初步认识和传播民主思想,到逐渐提出并尝试以改革或革命的手段建立某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经过曲折的奋斗而最终没有取得成功。这就是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这里我们先简括地回顾一下,近代中国人争取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奋斗历程所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

(一)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

起初,只有个别的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发现西方政制与中国的最大区别是它们有议会制度。继之,出使人员对西方议会制度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了解,并较具体地介绍给国人。随后产生了一批改革思想家,他们渐次提出效法西方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制度的想法。

(二)戊戌维新时期

在前一时期思想准备的基础上,康有为第一个明确主张效法西方进行政治改革。他领导了风靡全国的维新运动。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维新派推动光绪帝决心变法。康有为及其主要追随者们的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但碍于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没有公开提出召集国会的主张。即使如此,运动也还是失败了。但此次运动得到了较多的开明官绅与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他们通过公车上书、办学、办报、结社以及改革科举

制度等项活动而发生了较大的政治启蒙作用,并为以后的革命和改革运动做了思想与人才两方面的准备。

(三)辛亥革命时期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与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差不多同时登上政治舞台。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的领袖和骨干也同革命党一样流亡海外,且主要是在日本。这时梁启超在舆论界和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逐渐超过康有为。梁启超等把政治目标集中于争取君主立宪,故被称为立宪派。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围绕着中国究竟应采取何种途径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促使双方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较认真的研究,对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思考。但总的说来,革命党人把建立民主制度看得太简单了,而立宪派则又看得太复杂了,双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此时期,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着手预备立宪。虽然统治集团并无立宪的诚意,但这却给予立宪派以合法的活动机会。国内各地方绅商阶层和知识界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政治改革运动中来,民主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

此一时期,中国政治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份宪法文件《钦定宪法》,首次出现了民选的地方民意机构谘议局,并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地方自治、法律改革也有了初步的开展。立宪派在谘议局和资政院及举办地方自治过程中展开了积极的活动,特别通过组织和领导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

动而有力地打击清政府,削弱以至动摇了原有的君主专制统治秩序,在此过程中,他们积累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经验。

(四) 民国初创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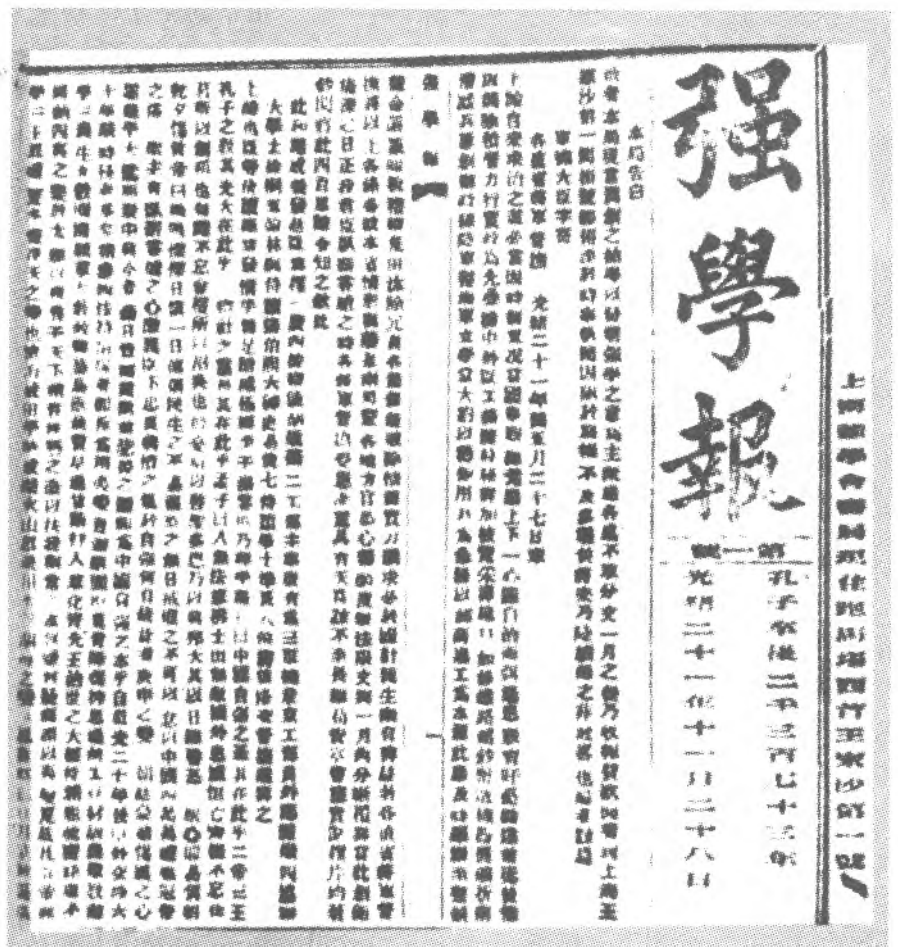
清政府的垮台来得比人们预料的要快。革命党和立宪派都是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忙投入民主制度的建设。特别是革命党人,他们长期忙于筹款和发动武装起义,大多数人都未暇认真研究民主制度的各种问题。但是,这些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在挑战面前没有退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方面秉持民主的理想,另一方面也顾及到国内的实际情况,大胆设计了一套民主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并建立起以革命领袖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壮举。他们先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宪法性文件;进行了一系列革除专制积弊、开创民主新风改革工作;建立起临时参议院,以作为民意机构。孙中山让位后,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还保存了一段时期。参议院北迁后,议决了国会组织法以及选举法等基本法律。随后又组织了国会选举,召集了第一届国会。当政制鼎革之时,结社风气大盛,人们纷纷组织政党,试图开创政党政治的局面。所有这些,对于沿袭了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的中国来说,都是极可贵的尝试。

(五)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本来就不很强大的民主力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又不能团结。民国创立未久,积蓄很大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北洋集团就把新的共和国政权抢到自己手中,接着就连续发生了两次帝制复辟。虽然很快就恢复了共和国,但由革命党人和立宪

派的精英们首创的民主制度却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这不能不促使先进分子进行反思:民主制度何以不能真正确立?他们的结论是,辛亥革命只革了一个王朝的命,并未革掉专制主义的命。专制主义仍深深扎根于绝大部分国民的头脑中。于是,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清除专制主义思想的带有浓烈启蒙色彩的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进行颇为彻底的清算。以此唤醒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使他们懂得个人的价值,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应有的权利与应尽的责任。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它的巨大的影响不在于直接改变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是在于,它让人们觉悟到个人权利的重要,它要人们相信,民主政治之能否确立,关键在于人民是否真正觉悟到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大大普及了民主观念,加深了对民主的理解,尤其是唤起了青年人的政治责任



1896年强学会出版的《强学报》



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16票当选,图为各省代表

感,为以后的民主运动准备了新的生力军。

(六)国民党统治确立时期

五四以后,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合作进行打倒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背离孙中山的遗教,在北伐胜利在望之时,屠杀共产党人,在北洋政府垮台后,建立起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训政体制,使五四以后民主运动的高涨再次遭遇挫折。

人民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训政普遍不满,自由主义者也持强烈批评态度,曾开展一次争取保障人权的运动。

30年代初,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争取一致对外,各党派各阶层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是产生1936年“五五宪草”的主要基础。

然而,当时在欧洲抬头的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的残暴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在中国实行新式独裁或许有利于集中国家力量外抗侵略,内图振兴。但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决反对这种主张,由此发生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争。自由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更加明确地肯定了民主政治的价值,而且通过此次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民主的认识,和对反民主思潮的警惕,并增强了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社会舆论。

(七)抗战及战后时期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为团结抗战的需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成立民意机构。在此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在国防参议会之后于

1938年成立国民参政会这样一个权力十分有限的准民意机构。在国民参政会内,不断有人提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宪政运动。其间,参政会内成立的宪政期成会对“五五宪草”进行了修订,其最重要的修正是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作为经常监督政府的机构。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核心坚决拒绝这一修正案。以后,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民主人士继续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强调人民权利的保障。这是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深化。

1945年抗战胜利,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以此为契机,促使国民党彻底放弃一党专制,联合共产党和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保证中国政治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轨道。为此,曾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并达成某些决议。然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坚持进行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为欺骗人民,一方面进行内战,一方面召集由国民党包办的所谓“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形式上完成了“宪政”的手续。而实际上,由于坚持内战,人民涂炭,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遍布全国。国民党政府动用军、警、宪、特对付人民群众,其独裁专制的性质反而更加强了。所以,国民党的制宪与行宪,是彻底虚伪的骗局,不可能挽救其统治。行宪国大召开一年之后,其政权土崩瓦解。这不仅是国民党统治的失败,而且也是中国建立

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失败。

认识与实践的背离

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大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确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与此相对的,在民主的实践方面,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实施民主制度方面,却倒是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虚化,越来越有名无实。

人们看到,清末民初那段时期,在民主政治的建设方面,确实从无到有做了一些事情。民主力量在谏议局,在资政院,在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初期,确曾有过不凡的表现,而政府当局,也不能不有所畏惧。社会上言论、出版、结社等项自由也确曾赢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一些海外研究中国民主史的学者大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时期,是不无道理的。但从袁世凯解散国会以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就越来越虚化,民主力量越来越失去合法的生存空间。五四新文化运动虽一度使民主思潮高涨,但终不能落实到实际的民主制度建设中,以至军阀曹锟公然贿选当上总统,同时却大模大样地把第一届国会制定而未及完成的宪法草案,匆忙修订加以宣布,摆出实行宪政的姿态来。后来国民党号称遵循孙中山的遗教,要通过训政,把中国带上民主宪政之路。而训政实是不折不扣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尽管其他党派、各阶层人民不断要求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宪政,但以蒋介石这个靠武力起家的独裁领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不肯结束训政。直到抗战胜利后,在国内外压力下,与各党派协商,做出准备走上和平民主之路的姿态。然而政协的决议墨迹未干,他们就把最大的中间派民主力量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把最大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宣布为叛乱,从而把全国拖入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炮制的“制宪国大”、“行宪国大”有多么的虚伪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所炮制的宪法上载有不少民主的条文,然而,他们实际所实行的是军、警、宪、特的高度恐怖的统治。西方民主在中国人的认识上与实际民主制度的建设上的巨大反差,给人印象真是再深刻不过了。这应该被看作是近

代中国民主史的一大特点。

软弱而分散的力量

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中屡试屡败,不获成功,其原因甚多,诸如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极其深厚,不易根除;中国地广人众,交通不便,区域差别甚大,难以政治统合;教育水平低,参政意识不易普及等等,等等。但最基本的原因是在于民主力量自身的脆弱。一种政治制度要落实到社会中,必得这个社会中最优势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方能巩固和持久。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长期稳定,持续两千余年,是因为得到中国社会中最占优势的社会力量——地主阶级的支持。然而,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始终未曾找到足够支持它的优势的社会力量。

诚然,在近代中国,民主力量也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只有个别官绅和知识分子略窥西方民主,滋生欣羡之情,但还完全谈不上民主力量。直到维新运动起来,提出民权的观念,才可算略有一点点民主的力量。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中国才真正产生了一批民主的社会力量。他们包括革命家、政治改革活动家、留学生、部分开明官吏与部分绅商,及在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从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部分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各省谏议局的设立,地方自治的开展,特别是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为动员和积累民主力量提供了条件。全国几百万人参与选举,几十万人参与请愿,无疑是展现民主力量的良好机会。但相对于旧体制所拥有的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警力量而言,民主力量毕竟还是很脆弱的。民国初年,有一度办实业、办教育、办报纸的高潮,民主力量有所增长。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民主力量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主要是有一定民主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数量大量增加,工商业资产者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而且由于平民主义思潮的扩展,民主观念开始传播到工农群众中略识文义的一部分群众。所以五四以后,历次民主运动都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到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后,反专制争民主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何以仍不能成功战胜专制力量,实现民主,或者说,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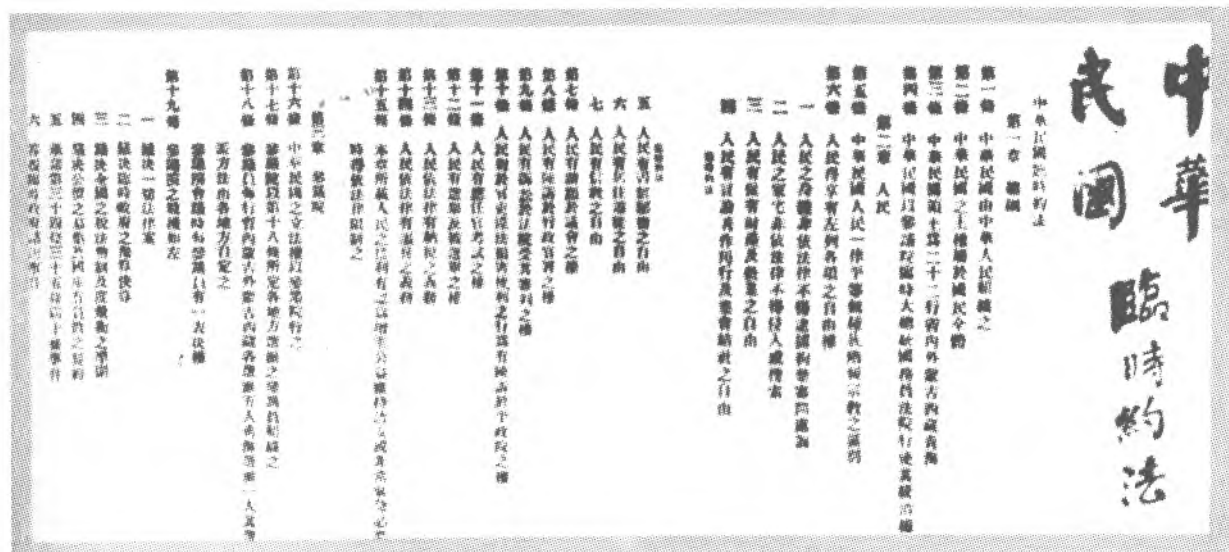
中国政治带上西方民主之路呢？

这里需要指明两点：(1) 尽管近代中国民主力量不断有所增强，但始终未能达成民主力量组织上巩固的联合。在清末就是团体林立的局面，而且旋兴旋灭，不能持久。民国初年，再度出现政团林立、各树旗帜、各申己说的局面，看其宣言、宗旨几乎千篇一律，本无性质上的悬殊。然而涉及实际利益，则各有追求，无法团结一致去对抗专制势力。即使到抗战时期，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他们的来源不是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而是各种地方、各种职业游离出来的不满现状、向往民主的人士，没有人能把他们真正巩固地联合起来。不能联合也就不能造成一个成熟而稳定的领袖集团，遂使他们的斗争常有分散和步调不一而减弱了力量，有时甚至被专制势力分化瓦解。(2) 这里考察的是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但中国自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反专制的社会力量中，就有一部分不再认同西方民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虽然在具体的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可以同其他民主力量联合行动，但决不可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归结于或等同于其他支持西方民主的力量。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在中国，支持西方式民主的力量始终是很有局限的，很脆弱的。

以如此有限的力量去对抗专制势力，并争取实现民主政治，有时民主派的领袖们不得不暂时借助非民主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策略性的目标。但

到头来常常是自己受骗、受排，希望落空。孙中山多次联合地方军阀以与北洋抗，到头来，事无所成，终于明白，军阀都是“一丘之貉”。梁启超曾想利用袁世凯的军政实力，稳定国内秩序，再通过国会及制宪活动逐步引导袁世凯走上宪政之路。结果是，国会解散，制宪屡受干扰，终于无成。后来，梁又试图利用段祺瑞，乃重蹈覆辙。最后，梁氏带着失落的心情被迫离开政坛。

民主力量有时把民主宪政理想化，对宪法和法律寄望甚殷，以为以实力做不到的事，可以靠法律达到目的，这就出现了对人立法的情况。民国初立时，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问题，革命党内部曾发生争论，结果依孙中山的意见，实行总统制。后来，当孙中山被迫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时，革命党人又修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企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这正是民主力量自身软弱的表示。在中国，对人立法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握有军政实力的独裁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修改法律。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重订约法，许多重要条文都是为自己而设。后来的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组织法》，也同样根据己意以为出入。当他任国民政府主席时，给主席规定了足以大权独揽的职权；当他不做国民政府主席时，这个主席便被规定为虚位的象征。这同样是民主力量过于软弱的证明。既然拥护民主的力量不足以制约政府，不足以制约掌握军政权力的人，而反过来，掌握军政权力的人，控制政府的人，可以随意立法，也可以



1912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随意摆布或排斥、打压民主力量,那么民主制度之不能成立,不能成功,就是势所必至了。

单薄的基础与动荡的环境

民主力量的生长、发育首先须有近代的生产方式为条件。没有近代的生产方式,民主力量就没有根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近代民主观念的发生,民主运动的兴起,并非源于近代生产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阶级,而是由知识分子将西方民主观念引进并加以传播所激发的。从晚清到民国,历次民主运动,民主力量的组合差不多都是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先导甚至主导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因为来自于各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其职业活动又有极大的分散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因此不可能构成一种固定的社会力量。它自身是非常脆弱的。

我们通常说的近代生产方式,就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自晚清资本主义发生以来(这里不考虑各种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直到20世纪40年代,除了极少几段短暂的时期,给予资本主义以较为有利的发展时机以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内忧外患、动乱、灾荒、战争与革命的状态中。所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人口总数中也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这里必须顺便说一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不仅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所争得的,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清楚地注意到这一点。近代中国社会没有为近代生产方式的发展,没有为民主力量的发育预备较好的条件,因此中国的民主力量迟迟未能成长到足够成熟和强大的程度。

民主制度的建设本身也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近代中国多次遭受外国侵略,先进分子曾以应付民族危机为理由要求改变专制制度。但是统治集团同样以应付危机为理由,限制、甚至打压民主运动,在清末是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即以抗战时期为例,各党派、各阶层民主力量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宪政,要求将国民党政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而国民党

也以抗战为理由,坚持政府集中统治权力。两者形成悖论。而为了维持大局,双方都不肯弄到决裂的地步。因此争民主的斗争也就始终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在军阀混战时期就更谈不上民主制度的建设。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往往都在大小军阀的掌握之中。国家权力,地方政府的权力,像球一样被军阀政客们争来夺去,国力、民力都在这种争夺中被耗尽。人民没有机会休养生息,没有机会发展、积蓄自己的力量。政治成了有势利者的专利品。

中国的民主力量,尽管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比专制主义势力脆弱,但还是不断地起来与专制势力做斗争。对付民主运动,专制主义者不外两手:有时出以直接的镇压,有时则加以利用,他们接过民主的旗号,像演戏一样,把民主的主要节目,如选举,如制宪等等都表演一番。这种假民主比对民主的镇压更加危险,它对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育有更为长远的更为巨大的危害。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宪法,搞了一个又一个,但没有一部宪法真正经过人民的认可,没有一部宪法真正实行过,兑现过。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民意机构或者根本没有;或者被冷落在一边,徒为专制横暴的点缀品;或者竟在军阀政客的直接操纵下做出反民意的决议来。这种情况也是令中国人对西方民主逐渐失望乃至绝望的一个原因。

从前人们常批评说,中国人想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必定失败。这句话如果主要是指责中国近代的民主志士们是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西方的民主制度,因而遭致失败,则此话不太符合事实。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梁启超,还是其他的民主主义者,在设计中国的民主制度时,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特点。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五权宪法思想,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虚君共和论、国会制度私议,都极具中国特点,而又大体具备西方民主的实质。所以不能责备他们生搬硬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失败,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是中国不具备实行西方民主的社会条件,没有足够支持这种民主制度的社会力量。

(责任编辑 吴 思)

蒋介石在1943年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

● 袁伟时

2003年，岁次农历癸未。回顾上一个癸未年——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统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在所谓“四强”后面

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为风光的成就是外交上。跻身“四强”，消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来绝非小事。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时就曾这样大事宣扬。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民党借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赢第一仗的。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5月5日宣布自任淞沪商埠督办，而请著名学者丁文江出任总办，全权管理上海，实行这一计划。丁文江实际任期只有8个月，其出色建树之一，是亲自与上海领事团的代表——英、美、日领事反复谈判，于8月31日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一举把租界当局属下的会审公廨收回，成立江苏管辖的上海临时法院。总之，除了汉口、九江租界由群众自发行动收回的特例（时间也是在上海收回会审公廨之后的1927年1月5日和6日），无论执政的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通过谈判逐步收回主权的，情况并无二致。

又以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为例,1925年10月26日开始,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至11月19日已经基本达成协议,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条件是中国政府同时裁撤祸国殃民的厘金。就在这时,实际控制北京的冯玉祥战败,政局动荡,会议停开。1926年2月复会,4月20日直系和奉系军阀联手又把段祺瑞赶下台,谈判又被迫中止,功亏一篑。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终于在1929年2月起实现了关税自主。

这些外交成就是历届政府和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多年努力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国民政府。

更令美、英和国民党政府尴尬的是,汪伪政权和日、德、意等国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迫使他们不能不改变留待战后再行解决的初衷,宣布立即取消不平等条约。

第二件事是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

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经过她的交涉,罗斯福还答应了不少援助中国的要求。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第三件事是1943年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保证世界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美国人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正式忝陪四强末座,从而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

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短短4天,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多次会谈。《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不过,在表面的光华后面,蕴藏着深刻的危机。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不可能真正成为对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美英(主要是美国)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支持抬高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们不放心也看不起,内心充满鄙夷。

罗斯福早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极为不满。开罗会议期间,他便对儿子坦言:“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而邱吉尔根本看不起蒋介石,对同蒋介石的会谈非常勉强。会议期间,蒋介石狮子开大口,要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而1942年,美国已经给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等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倍。蒋提出这个过分要求后,美国



1943年1月,中英代表签订条约,取消英国在华特权。图为外交部长宋子文在条约上签字

财政部长私下大骂蒋是“他妈的骗子”，“让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美国政府和国会没有什么人同意提供这笔贷款。当美国官员将实际情况通知蒋介石时，蒋氏居然称若得不到及时的援助，他的政府半年内将垮台，并以不派远征军赴缅甸和不修机场等威胁。美国国内一片骂声，说蒋的行为无异于勒索敲诈。

由于名不副实的“四强”之一的蒋介石政府不能承担重任，为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出兵打日本，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雅尔塔美英苏首脑会议上，他们又达成了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又如《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英国和苏联的租借物资，完全交由英、苏本国政府自行处理；而对中国，却有一个附加的条件，物资的处置必须在美国代表的监督下。无他，因为国民政府腐败，臭名昭彰。

到下一年，国民党军大溃退，日军横扫湘、桂，直逼贵州，美国政府干脆旧话重提，让美国将军统率全部中国军队！哪里还有什么“四强”的影子？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了，欧洲法西斯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美军在太平洋也节节前进。同盟国如日中天，唯独蒋介石及其政府在走下坡路。

宪政之路

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

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几十万，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问题的严重性最初是被美国记者察觉的，他们欲披露此事，蒋介石摇头不信，对灾荒轻描淡写，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所以会饿死那么多人，就是由于“最高领袖”不相信，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救灾措施，还照样征粮！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

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王芸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已经买好机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与的5亿美元，提出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

当时，独裁专制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非变不可。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课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他所讲的宪政理论上有许多荒唐之处，而实践上更是依旧肆意践踏民主和公民权利。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两篇重要论著：《中国之命运》、《中国的经济学说》。学界认为这是蒋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判断他的《中国之命运》，应该有一个标准。他不是说要实行宪政吗？从政治上说，最好的标准就是学界公认的宪政理论。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它有几个基



1943年10月10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与宋美龄合影

本要素：1，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财产、通信等自由权利。2，国家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务，又不致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3，宪法至上，并有严格的宪法司法、违宪审查制度。4，实行法治，司法独立。5，各级政府民选，层层成立议会，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国之命运》追求什么？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后面，他的内心独白是“朕即国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国家。这是与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理论。

《中国之命运》还声色俱厉谴责：“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他实际是在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其实，当时的地方势力对保护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庇护下，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发展。又如桂林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与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关。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国家里，确实没有政党甚至私人拥有军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那时有一个谁代表国家的问题。不能以拳头大小定是非，“军队国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应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国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过“共和”的办法逐步联合、统一。这样的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来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军队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割据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记里，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十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为此“应先用宣传”，“以澄清国际视听”！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剿灭共产党和地方势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这牵涉到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还是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人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在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军事顾问，还给了大批武器和金钱），不幸走上了武力统一的错误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共和统一。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这既能避免内战，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不得不致力地方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统一的道路，带来

的只能是内战频仍，生灵涂炭，专制独裁。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东方不少国家还在继续证明这一道理。每当听到一些国家军阀混战的消息，我总是认为他们的军人、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足够的智慧，还在重蹈中国的覆辙。

这几年史家黄仁宇有个观点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要说原始型统一政府的话，袁世凯老早就制造出来了。其实，国民党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没有解决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问题。北伐成功后，将原有的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架构给摧毁了。

国民党的基本口号是“以党治国”，突出党权，代替了民主的架构，代替了国会和宪法。国民党实行五院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他们规定，五院都由国民党中央的政治会议领导，立法院的权源是党，而不是民。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原来最后决定权归孙中山，后来经过反复的较量，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国内各方面势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尽可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战争时期权力需要相对集中，但蒋介石的权力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监督，形成了一个个人独裁的体制，导致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绵不断互相厮杀。1931年2月国民党重要领袖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仅因在约法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蒋氏软禁在南京。以此为契机，一批国民党领袖和两广军人于同年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严厉谴责蒋氏“迷信武力”与“个人独裁”，并且坚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

蒋不但没有建设起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决定一切，批个字、写张条子

就是圣旨,就是官员任命、财政支出和解决重大事项的依据。

二是建立特务系统,严密控制全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最初是复兴社,1938年,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中统。这一年还成立了一个带特务性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是建立书报审查制度,严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论。文艺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都必须先将原稿送到国民党各级宣传部或图书审查委员会去审查。在学校则实行所谓训育制度。

四是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他曾不厌其烦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地说,就是‘军事化’。”

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与现代国家的架构越行越远。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3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30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这种状况在1943年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反贪污也化为闹剧。

1943年前后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传统弊端在蒋身上的集中体现,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性。

当是时,内外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考虑实行宪政。这是整个世界难以抗拒的趋势。但是,真要实行宪政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乃至整个官场文化,蒋介石又没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

以德、苏为师与官僚经济

在经济领域,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也把“建国”、“富强”等口号整天挂在嘴边。

国家的富强一直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问题是如何才能富强。

严复在1895年后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强调富强与贫弱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个总结与现代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吻合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富强的关键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

蒋介石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想,将政府的作用归结于“养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养活子民,教民农战。蒋介石在1943年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使资本国有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并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统一而国有之”;由于德国用军事化带动经济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强调要实现“民生与国防之合一”。

不但蒋介石这样想,苏联计划经济的貌似成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经济使国家迅速发展,给中国知识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马寅初这样的对国民党的腐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统治者直言不讳,经常严厉批判国民党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货膨胀政策。在经济思想上,马寅初坚持自由经济,要竞争,要保障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德国国家经济学的影 响,认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特别是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更需要政府的统制。马寅初也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具代表性。进入30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管制经济”。马寅初说:“就现在之情形而论,苏俄之统

制经济可谓大告成功”。

这在 20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三民主义提出来开始,实行民生主义,就是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要由政府来办,甚至还包括土地国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孙中山的所谓土地国有等政策,后来也有所动摇。把公有作为理想固然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但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反映——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它的社会存在很多弊端,穷富差异、种族问题、妇女的权利等等一再困扰人们,侵犯公民自由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何去除这些弊端?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思想家解决不了。两次世界大战及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暴露得很充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这关系到中国建国的选择问题。而这时候苏联大张旗鼓地宣扬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国的思想界迷惑了,很多人愿意在经济上吸取苏联的那一套。

就蒋介石来说,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为师”的思想。

他早就对法西斯理论甚感兴趣。1931 年 5 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决定国家大计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在会议的第一天便提出必须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他认为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形式互异,而统治理论不外三种。中国应该选择什么呢?他说:“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若在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在如此明确的号令下,他的追随者们便掀起了鼓吹和贯彻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于是一批又一批党政军大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德国顾问包括柏林警察总监请进来盘踞军政要津;决心贯彻法西斯主义,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的力行社、复兴社等组织纷纷成立,而在这些组织推动下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如雨后春笋。《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意大利政

治制度》、《希特勒与国社党》及法西斯蒂小丛书等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著作顺利通过国民党图书检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执笔者和组织者竟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室的要员。

1933 年 1 月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的德国竟在纳粹统治下迅速恢复和发展,更令蒋介石羡慕不已。用蒋介石给希特勒密信中的话来说是:“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希特勒)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中正)之所钦佩也。”蒋氏对德国顾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两国关系的建议言听计从。从 1934 年开始,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组成为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请以翁文灏、孙越崎等知识精英作智囊。这些技术官僚满腔热情,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便与德国合作,请德国帮助建设工厂,而以原料偿还。他们的建设思想是要政府投入,搞官办企业。

这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客观上对官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实际的结果是发展了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经济。这也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为国民党走向毁灭埋下了伏笔。

当时,马寅初针对国民党的官僚靠垄断、走私、投机倒把发国难财非常愤慨,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至少要将他们的财产征收一半以上”。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和参议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出于爱国、爱党,马寅初不断四处去演讲,矛头直指孔祥熙、宋子文,终于触怒蒋介石。蒋下令要将马抓起来,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逮捕他。爪牙们想出一个办法,“请马院长去前线考察”,实际把他关押起来,其后被转送贵州息烽集中营。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各界人士及学生的不断抗议,后来才被放回重庆家中软禁,但还是不准他发文章,也不准他公开作报告。直到 1944 年这些禁令才被冲破。讲富强,却不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话,那不是南辕北辙吗?

政治、经济是密切联系、很难割断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谓富强自然只能是黄粱美梦。

(责任编辑 吴 思)

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

●王民权

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

省军区副政委)交代问题,如交代不好,即封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巾,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



1966年9月,串联到西安的北京红卫兵游行

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西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当时个人崇拜已登峰造极，侮辱毛泽东的罪名是谁也担当不起的。《陕西日报》明知造反学生是项庄舞剑，矛头一开始就是对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也不得不起而申辩。8月26日就向“全省以及全国160多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大量印发题为《这是在干什么？》的传单，辩称“本月二十五日本报四版印有毛主席像和背面第三版印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新闻标题，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天报纸、版样由四人分工，四版画刊是使用《人民日报》原版，三版新闻系新华社电稿，按版编排。审大样时是一版一版打出清样审查，第四版因用《人民日报》原版，不作审查。毛主席的像我们经常要刊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语句，也要经常刊登，因而有时很难完全避免出现类似□□□□□□□□，别的报纸也有这种现象。再说，人们看报总是一个版一个版地看，不可能透过一版看二版”，表示“要继续努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陕西日报》办得更好。革命的同志们对我们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我们衷心感谢”，并说围攻报社是“一小撮怀着不可告人的邪恶图谋”的坏人操纵的，要“革命的同学们、同志们”“千万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谨防政治扒手，不要上当”。8月31日，又以“陕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再次重申前面的辩词，同时进一步提出例证，说“我们翻阅了近一个时期全国的许多报纸，都有类似本报八月二十五日的版面的情况，说明出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这怎么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呢？”并且特别指出，“这次前来质问《陕西日报》的绝大多数群众，

他们是出于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但“这次事件是有极少数人利用部分群众不明真相进行煽动，并向报社提出无理要求”，“故意破坏党报的威信，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封公开信将参加事件的人加以区分，表现出相当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而《陕西日报》出版部也于8月27日贴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揭露坏人诬蔑党报》的大字报，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根本不能联系也决不应该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死硬联系在一起，公然进行反动宣传。他们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们的目的不是恶毒万分吗？报纸和其他书刊一样，我们平常阅读时，哪里会对着光看？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才采取这种办法进行煽动和欺骗，真是无耻之极。”一些对交大等校师生持反对观点的，如西安医学院、火炬小学等校的师生和庆安公司、肉联厂冷库的部分职工，同样于8月26日贴出“我们最最强烈、最最坚决地谴责交大、冶院等校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陕西日报》在排版中三、四版的偶合大肆造谣生非，围攻我《陕西日报》社，破坏《陕西日报》社的正常工作，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更使人不可容忍的是，向省委提出无理的‘六项要求’！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准，戳穿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妄想变天的大阴谋”的大幅标语，和“仅根据八月二十五日《陕西日报》上的一个问题，完全断定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提出立即改组编辑部、停刊的要求，我们认为在事实真相没有彻底调查清楚之前，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现也存在类似严重问题，他究竟属什么性质，我们也不能过早下结论”的大字报。西安医学院二院部分师生题为《是精心策划吗？》的大字报，还逐一列举了（1966年）7月1日的《羊城晚报》8月24日的《健康报》，7月18日、6月29日、6月19日、8月15日的《人民日报》，6月19日、7月1日的《解放军报》，7月1日的《文汇报》和5月2日的《羊城晚报》，说“以上报纸，真（也）有‘黑帮首领’、‘反动派’

字样（意为类似陕报的情况）”，厉声质问，“难道这都是反革命策划的吗？既然你们警惕性很高，交大同学在毛主席像背后写着‘造反有理’，你们是造谁的反？为什么不把他揪出来？”从而断言，“显然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而造谣生事，煽动群众闹事”。这些声音给危境中的《陕西日报》以可贵的同情和声援。



1967年，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并召开庆祝会

但是，交大等校的师生并不善罢甘休，继续按照其奇怪荒唐的逻辑对《陕西日报》进行地毯式搜索与“轰炸”，深文周纳，指责该报不仅8月25日一天，从1966年3月31日往后多日的报纸，都存在着同一性质的“问题”。比如，1）3月31日第一版《西区首府百万人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副标题上的“沉重打击”中的“重打击”三字，正对着第二版的毛泽东头像。2）4月17日第三版的通栏标题《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正对着第四版的《十足的法西斯暴徒》标题。3）4月22日第一版《毛主席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中的“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正对第二版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等等。

不仅如此，造反师生还进而引申开去，说该报除了在相反的两个版面恶毒地侮辱毛泽东（包括林彪、列宁），还有大量有意篡改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文章，误导群众等问题。

如8月8日转载《人民日报》关于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消息，《陕西日报》副标题中删去了原有的“全国人民无比崇敬和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信仰、无比崇拜毛主席，日夜盼望买到毛主席著作”一段，而其他省报则

和《人民日报》一致。

再如8月21日《陕西日报》发表《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报道，不仅只报道了“保皇”的西安中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医学院和西安工业学院等，对“勇于揭发省委黑线”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等则只字未提，“题目和内容极不相称”，而且“题目字体和版位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一句话，《陕西日报》烂完了。

事情愈闹愈大，不仅陕西，“从新疆的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的东山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造反师生一方面抓住这些莫须有的“问题”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对陕西日报社传单和公开信中“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参与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社会舆论“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为不满，步步进逼。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11月2日进驻陕西日报社，进行所谓“检查”。12月14日，《陕西日报》被迫就印发

传单做出公开检讨,公开承认报社“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对待革命学生运动上,执行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承认报社从8月26日到9月下旬先后印发的30多种、700多万份传单,是受“省委指示”,“在指导思想都是为了反对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起了挑动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的坏作用”,承认“当时革命学生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心情来报社对八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以及本报其他一系列错误提出抗议,严加声讨,是完全正确的,是正义的革命行动”,表示郑重地为传单中所说的“一小撮右派分子”、“一小撮反革命”、“别有用心的人”等,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向“一切革命同志、革命同学”,特别是被传单“加以攻击和诬蔑”的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校的部分革命师生,“赔礼道歉、认罪和认错”。同一天,陕西省委也就《陕西日报》印发传单做出公开检讨,公开承认省委“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压制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使陕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承认“《陕西日报》印发《这是在干什么?》、《关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等攻击诬蔑交大、冶院、西工大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传单”是省委指示的,“主要责任应由省委来承担”,明确表态:“除了霍士廉同志(省委第一书记)代表省委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开检讨外,我们在这里作再一次检讨。凡《陕西日报》社印发的传单中把革命师生、革命群众说成是‘一小撮右派分子’、‘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等等,都应一律平反,并向这些同志道歉,请罪。凡是因为这些传单的影响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其责任也应由省委来承担”。

但是,检查团认为,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检讨极不深刻,“企图在大帽子下逃之夭夭”,“……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根本没有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诚心。他们非但不主动消毒,为革命群众平反,反而设置重重障碍,抵制检查。刘澜涛、霍士廉、刘刚(西北局宣传部长)、舒同(省委书记处书记)等直接指示《陕西日报》社印发

造谣传单的人,至今还未向革命群众作出具体的交待和检讨材料。”1966年12月17日,检查团还印发了《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传单,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提出一个与陕报传单截然不同的说法,来“肃清其恶劣影响”。结果,“8·25事件”成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摆脱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恶”,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社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陕西省委、西北局大权被夺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这起风格独具的“文字狱”,可谓奇之尤者。虽说其发动者并非大权在握的人物,而只是一些造反的师生;其成狱之由并非真的就是报上的文字犯了什么忌讳,而只是版位的某个偶然因素触发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灵感;其最后的裁决也并非最高当局直接、间接的干预,而似乎更像是运动浪潮合乎规律的推助,但其影响于当时的世态人心,也可谓至深且巨。李松晨等主编《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问清楚后,他们就依样画葫芦。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可以推到遵循《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的版式,可以不负责任。”其实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陕报“8·25事件”有关,或者说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教训而时兴起来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国家对农村从 1953 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当时的政策是：“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和“多缺多供应，不缺不供应，什么时间缺，什么时间供应”。这个政策在安徽亳县深得人心，广大农民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在以后的几年里，购了过头粮，回销粮卡得较紧，但农民口粮尚可吃饱。

1958 年“大跃进”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粮食统购统销是在高估产下的高征购，在低标准和时有脱销的情况下统销。1958 年——1960 年，三年粮食统购统销情况是：

1958 年全县农业人口 71 万，粮食实产 4.55 亿斤，征购任务 3 亿斤，完成 15119 万斤，占任务的 50.39%，商品率 33.8%，人均负担量 213 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 526 斤。

1959 年全县农业人口 70.8 万，粮食实产 3.27 亿斤，征购任务 2.2 亿斤，完成 12924 万斤，占任务的 58.74%，商品率 39.5%，人均负担 183 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 357 斤。

1960 年全县农业人口 56 万，粮食实产 27885 万斤，征购任务 1.4 亿斤，完成 6833 万斤，占任务的 48.8%，商品率 24.5%，人均负担量 122 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 464 斤。

从以上粮食统购统销来看，每年粮食征购占到实产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留给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除去种子、饲料、社办工业等项用粮外，农民的口粮很低。1960 年全县农民人日均口粮仅有半斤左右，而且大部分是红芋片。1960 年春是最困难时期，人日均口粮仅二两左右，不少地方人日均口粮只有一两几钱。

尽管如此，由于征购任务大，导致年年完不成任务，季季完不成任务，样样品种完不成任务，

亳县统购统销反右倾的严重后果

● 梁志远

相对的农民负担是年年过头，季季过头，样样品种过头。而在统销上一压再压，完不成征购任务，缺粮不返销（按高产估产，不承认缺粮），多缺少返销。就这样每到播种季节还向社员逼交种子。正像人们所说的“粒粮进国库，万民难求出”，以致大批农民饿死，“左”的无法再“左”了。

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经过如下历程：

一、高举反右旗帜，把大力反右贯穿在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始终。三年的“大跃进”历经了反右派和反右倾两大运动，1958 年有不少干部因反映粮食统购统销中的问题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少干部因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而被拔了“白旗”或挨批评、受处分。

1959 年春因未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要求回销粮被视为“西北风”和“右派势力的新反攻”，整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同年秋，城乡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与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联系在一起，不顾土地抛荒，秋季旱情严重，粮食减产的实际，以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衡量一个干部左、中、右的标准。把大批干部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无情打击。例如十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邢占秀，因公社粮食征购任务进度慢，向县委如实汇报了“粮食征购中有些地方卖了豆种，明春会出问题”等，被阜阳地委点名批评为右倾，责令

停职反省。

1960 年的统购统销更加变本加厉，开展了更加残酷的斗争。直到 1960 年 4 月，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地、县委还硬着头皮在会上大讲什么“余购”、“缺销”。实为搜粮统购，缺粮少销或不销。

三年反右领先的粮食统购统销，批斗了大批干部和群众，打了一批右倾，处分了一大批干部，



1953年11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通過《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圖為《人民日報》刊登的命令全文

使农民吃了空头粮,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大力表扬、奖励善于大吹粮食高产、大购过头粮,狠压粮食返销的“先进”人物。其实这些“先进”人物,只讲迎合领导浮夸心理和自己的政治需要,毫无党性,残害农民,最为农民所深恶痛绝。例如,五马公社,一位刚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提升为县委副书记的宋××,1958年去分包五马公社,即时,伙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放出亩产4万多斤水稻“卫星”,全社粮食生产跃居全县第一,秋季征购大量过头粮,从而夺得全县粮食帅旗。1960年3月4日正当本社农民开始大量饿死的时候,他们竟把二月份县委分配该公社的人均每天不足四两的回销粮,退回“节余粮”4500斤,从而在县委扩大会上,受到大力表扬。同时对其他如实反映情况,要求增加回销粮指标的公社,给予严厉批评,并要学习五马“经验”。他们的“经验”残害了农民,殃及全县。结果五马公社是违法乱纪和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公社。

在这种形势下,全县浮夸风越刮越大。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继续大吹高产,粮食大有潜力可挖。农民的生活“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食堂三干三稀”等等,到处高喊,实际上则加重

了农民的非正常死亡。

三、采取强制手段搞粮食征购。三年中一般从当年的六月到翌年的三月,用九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抓粮食征购,除各级党委作为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抓征购外,县、社均有专门的粮食巡回检查组织,并派出大批不脱产监收监打常年驻队人员,一般每生产队最少一人。

每当粮食收获开始,未等粮食晒干就要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五天一放小“卫星”,十天一放大“卫星”,放

不出“卫星”的层层都有批判斗争的场面。

为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层层采取扣人不放的办法,逼迫交粮。1959年11月中旬,在县委召开的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上,除批斗粮食征购右倾典型邢占秀等人外,大搞人人过关。用会内与会外相结合的办法,社队交了粮下余,立下完成任务的保证,才可放行,否则留在会上“整顿”。因此,绝大部分大队卖口粮、卖种子、卖饲料。十河公社孙大庄大队地处豫皖边界,为了过关无奈向河南省某大队借粮几千斤,放出了粮食入库的“卫星”,免除了一次批斗。

1960年10月31日——11月18日,共19天时间,县委召开社队七次电话会,一次县委扩大会,逼粮入库。会会都有常驻亳县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地委第一书记任松筠,县委书记赵建华中的一人讲话,点名批评粮食征购落后单位或个人,结果又有不少队粮被购光。

由于采取各种强制手段,逼死人命的事件三年中屡见不鲜。有的地方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采取斗、扣、打等办法以致逼死人命。例如,1958年县园艺场王阁生产队张会计,先在“核实”产量会上,因报不到领导要求的高产,被斗、被扣;报

了高产,接着高征购,而征购任务完不成,又批斗为瞒产,从而被逼投井自尽。死后则宣布瞒产私分畏罪自杀。1960年夏位岗公社马厂大队马厂生产队口粮基本卖光,社员无法生活。队长张万春痛哭后,上吊自杀被救。

为完成粮食征购,以瞒产私分和偷盗粮食等罪名乱捕乱关,县政法部门抓人之多是罕见的。如古城公社焦瓦大队共产党员、民兵营长赵恩太,1960年秋因本队粮食卖过头,农民口粮太低,浮肿、死亡不断出现,留两窝红芋未切片上交而被捕法办,关死狱中。1960年6月27日,张集公社门庄大队按高估产高征购,仅完成40%左右而多数农民无口粮,为此被列为县社的打击重点,抽调力量在县公安局郭副局长领导下调查,避开小麦估产过高的实际,结论是全大队721户有偷窃行为,占总户784户的91.9%,而不偷的63户全是老弱残废。同时家家进行搜粮。批斗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大队副书记×××受到党纪处分,逮捕了几名“偷盗”青麦较多的农民,从而农民的基本生活权利遭到严重的破坏。

每当粮食接近成熟和收获季节,全县农村翻箱倒柜,挖地几尺搜粮,已成普遍现象。不少的村队每当农民田间劳动收工回家之前,不分男女老少,全面搜身,以防偷盗。

四、关键时刻,一再压缩统销,强行调出农民的口粮。1960年春节前后,农民的吃粮标准很低。据县委生活检查组2月11日在大杨、观堂、城父等公社检查,普遍人日均口粮不足四两,其中城父公社丁楼大队人日均口粮一两三钱(十六两制)。农民因饥饿而死亡越来越多。在农民口粮低到了不能保命的情况下(按照人日均口粮三两计算,全县库存粮尚缺133万斤),阜阳地委副书记武建周,地委秘书长徐有贞坐镇亳县,决定调出库存粮300万斤。徐有贞说:“统购要从茅根、淀粉、干菜、粮食等多方面着手,还要保证社员吃到‘六、七、八两’,省地委都知道你们的情况,要保证按时完成调出粮食任务……”

在此期间,大面茅根已近扒完,各种代食品已极为紧张。有的粮站已无粮可供。加之运输工具缺乏,阴雨较多,粮食时有脱销,从而使全县农民非正常死亡进一步加剧。

五、各种代食品严禁市场交易。随着农民生

活紧张,亳县于1959年12月29日起向社队分配了代食品收购任务。同时各种代食品由国家供销部门挂牌统购,一律不准市场交易。有些队由于代食品不多,连带叶的红芋秧都去出售。这样一购一销,供销部门仓容较小,有的露天存放,经雨霉变。虽然同时制定了供应办法,但却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各种代食品不准市场交易之后,黑市粮、馍和代食品价格猛涨。黑市小麦每斤由原1.3元左右增到1.8—2.0元,红芋片每斤涨到1.3—1.5元,二两重红芋叶面馍涨至0.8—1.0元;红芋叶每斤0.8—1.0元……极端贫困的农民,本来可用0.35元钱买一、二斤红芋叶充饥,至此也难买代食品补贴了。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1960年底。

六、停止统购,落实统销,支粮到户,堵塞干部多吃多占的漏洞,形势好转。1960年冬季,虽然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纠正“五风”,但由于粮食统销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农民的口粮仍未落实,少量农民的口粮还是层层剥皮,不能如数吃到农民肚里。因此浮肿、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在继续发生。《县委生产生活简报》如实反映秋冬死人,被地委通报全区并报省委之后,引起省委高度重视,为亳县增添了大批力量,帮助县委整风。首先停止了粮食征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落实了粮食统销,并采取“口粮一次落实到人,分期供应,支粮到户,超支不补,余归个人”的办法,有效堵塞干部多吃多占的漏洞。同时口粮仓库采取“三结合两把锁(即干部、群众、工作队,钥匙是群众代表、工作队各持一把)”,一直管到接上新麦。

由于口粮落实,标准虽低,加上代食品,农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形势迅速好转,疾病、外流、非正常死亡至1961年春节基本停止。

粮食统购统销事关农民生死。经过“大跃进”三年的反复高购低销,国家宪法和粮食购销政策均成为一纸空文,从而引发了广大农村荒、逃、饿、病、死的普遍发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多方面深入调查表明,亳县农民非正常死亡率达30%以上,其他方面的损失也极其严重。因为口粮缺少,发生了杀亲吃肉等违背人情的实例。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血的教训。

(责任编辑 吴 思)

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 孟 起

1960年,我从北京第四中学高中毕业后。经过层层选拔考上出国留学预备生,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去苏联列宁格勒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攻读放射化学专业,一切均由国家安排妥当。在当时,不可能有私人出国,唯一的留学就是由国家保送去苏联或东欧几个国家,学习的专业亦由国家决定。就在我刚刚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拒绝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专业,而只允许学习打猎、养蜂、园艺等专业,父亲建议我转去清华大学继续学习。

在清华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方建筑,也不是水木清华的楼台水榭,而是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在那里我看到了校长蒋南翔和副校长钱伟长的决战——共产党和右派分子的决战。这是给刚入校新生的第一课,无疑是告诉我们在清华园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唯有跟蒋校长走,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同时,我看到了蒋校长的许多照片:中等身材,圆胖脸,眯缝眼,带着金丝眼镜。就是他,在反右斗争中,把留美导弹专家钱伟长等一批右派批驳得体无完肤,落荒而逃;也就是他,既是清华大学校长、高等教育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更是中国教育界最高权威。蒋南翔给我最初印象是一个和我父亲一样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对他的崇敬之感油然而生。后来从父母那里又听说蒋校长早年在清华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清华地下党创建人之一,他和夫人欧棠亮的结合是由周恩来介绍撮合的……这使我更加敬仰这位校长。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说过话,他不知道在一万多名清华学

中有我,但我开始知道他。

1966年6月,我正在清华大学南口200号基地(原子能反应堆)作毕业设计,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爆发了。当时整个“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往往是一个事件还未搞明白,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事件又发生了,搞得人们晕头转向、应接不暇。我们不得不停止毕业设计回校闹革命,整个清华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教部长、校长蒋南翔,由于17年来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而被批斗,由王光美带领的中央工作组也被轰走,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一统清华、红极一时,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语录歌和革命口号,红卫兵小将行色匆匆,到处是战斗的气氛和火药味,而由清朝重臣那桐亲书“清华园”三字的二校门也被推倒了,整个校园里朗朗读书声消失了,我迷茫地看着这一切,还未等我醒过劲来,我的父母已被批斗,赶入牛棚,家被抄得一干二净,三个妹妹各奔东西,我成了黑帮子女。

席卷全国的革命大串联活动开始了。清华红卫兵散在各地,校园里人几乎都跑光了。有一天,清华井冈山的一个小头目对我说:“给你点儿活儿干,你去高教部看黑帮吧!”我想:反正也出不去,找点活儿干也好。当时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高教部联络站设在西单二龙路高教部西院大楼的二楼,原来有四个红卫兵负责,后来全都跑光了。该大楼北边是一排二层楼板房,高教部的走资派蒋南翔、刘冰、黄辛白等部长5人,局长6人,共11人的劳改队就住在此地。当时,我的日常任务就是每天监督黑帮分子劳动,看管他们的日常活动,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并代表

清华井冈山与各地红卫兵组织联系、写工作汇报。一时间,我虽然不是红卫兵,却成了红卫兵在高教部的最高掌权者。我开始按红卫兵的要求严格监督黑帮的活动,严密监视、管理他们的日常活动,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我开始提审司局级干部,后来是部级,但一想到要提审蒋南翔,我的心里就怦怦直跳,我不知道用什么态度提审他?要他交待什么问题?更如何训斥他?终于不得不提审蒋南翔校长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约九点左右,我通知蒋南翔暂时停止劳动,到我办公室来,当他平静地坐在我对面,透过他那金丝边眼镜仔细地端详我时,我也正好奇地审视着他:肌肉松弛、神情木讷、一脸的疲惫;开场白过后,我板着面孔,学着红卫兵的架势说:“蒋南翔,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沉默。“你听见了没有?”沉默。“你和彭真、林枫是什么关系?”还是沉默……我开始着急、发火、在想怎么让他开口。“你是几年级的?哪个专业的?”他突然操着难懂的江浙口音反问我,当我回答后,他又慢条斯理地说:“你是应届毕业生,在清华学习了六年,你应该自己有一个判断,我们党所执行的是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无言以答,我开始沉默,接着双方便都陷入了沉默……最后我以自己都不能听见的声音说:“蒋南翔你老实点!你滚吧!”第一次的提审就这样宣告结

束。

第二次提审蒋南翔时,我不再板着脸、装腔作势和狐假虎威了,因为这些对他完全无济于事。我开始以相互平等的态度、和蔼的口气同他对话,甚至是讨论问题;但他仍然是沉默多于交谈。在接触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发现蒋南翔是一个非常内向而又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话不多,而一旦出口,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平静的举止中透着临危不惧的个性。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人们都被逼疯了,整天都在干着哭笑不得、而又自相矛盾的事,我明明是被红卫兵扫地出门的黑五类,可又能代表红卫兵发号施令;我明明知道这些黑帮是好人,可却要叫他们劳动改造;我明明知道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要逼他们交待反革命罪行。好在整个联络站就我一人负责,我开始胆大妄为起来,当时规定不许黑帮看报、听广播,我却开始给他们看《人民日报》,继而《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再接着我把《清华大字报汇编》及《井冈山》小报也拿给他们看,我知道这么做是在冒险。因此,我规定报刊让他们看完当天收回,不过夜。他们非常配合,为了增加他们的阅读时间,我把他们每天劳动时间从八小时改为四小时,分成二拨对换着:半天让他们劳动,半天让他们读报,给外人一种表象,只要劳改队里黑帮们在干活儿



1959年,蒋南翔(右五)等清华大学负责人观看教师学生设计的国家剧院模型

即可。同时。我把蒋南翔由扫厕所、刷马桶等最脏、最累的活掉换为较轻松的清扫食堂的活儿，而让一个“叛徒”司长顶替了他。这样一来，整个劳改队一下子活跃起来了，长时间的封闭被打破，死气沉沉被掀开，由于他们知道外面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开始学习、思考，相应的讨论也多了起来，偶尔还能听到老人们的谈笑声，渐渐地我把单个提审变成了“神仙会”，经常找几个人到我办公室，就当前的形势发表议论。刚开始他们还很谨慎，按报纸的调子鹦鹉学舌，后来渐渐熟了，也摸准了我的底牌，便逐步打消顾虑，畅所欲言，直至认真地讨论起来。副部长里要数黄辛白和刘冰发言较多，黄辛白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派工作组？为什么撤工作组？为什么要让红卫兵起来造反？……总之，文革中的任何一件事他都想不通。而刘冰，高教部副部长、清华党委副书记，文革前，我曾在学校听过他的多次报告，现在的他仍像当年一样：身躯高大、昂首挺胸、侃侃而谈，他能巧妙地引经据典并用毛泽东的话来批判当时的革命理论，讲得头头是道。难怪他1969年复出后，由于骨子里难以和“四人帮”唱一个调而再次被打倒。至于蒋南翔始终是沉默多于言谈，但是别人发言时他却从不闲着，专注聆听，仔细记录，同时他那眯缝的小眼在明亮地闪动着，我看得出他的脑子也没有闲着，他在不停地思考着。我有时查夜，别人屋里都熄灯了，唯有他屋里的灯光还在：他不是踱步沉思，就是在奋笔疾书。

有时“神仙会”也展开热烈的辩论，我的极左思想往往受到他们的群起围攻，把我批得体无完肤，这便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在与他们的讨论中我明白了许多永恒不变的道理；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感到平等和温暖，我们之间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亲情。

1967年1月，北京的严冬零下十几度，凛冽的北风席卷着黄沙，扑打着窗户，才下午四点多钟，暮色已早早降临，我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报，突然，六、七个外地红卫兵夺门而入，操着江浙口音：要揪斗蒋南翔等走资派。我看了他们的介绍信才知道是浙江大学的红卫兵。浙大是全国22个重点高校之一，直属高教部领导，因此揪斗蒋南翔等人是名正言顺之事。但我想：这时如果让

他们把人带走的话，必定凶多吉少。于是，为了先稳住他们，我急着端茶倒水、准备晚饭，同时我告诉他们：清华“井冈山”有规定，如蒋南翔等人需要离开高教部必须由蒯大富亲自批准才行。我当时马上装模作样地打电话联系，然后告诉他们：总部负责人不在，你们先回去，待总部批准后，再通知你们来提人，他们虽然不满，但又慑服于清华“井冈山”之名，只好悻悻离去。浙大的红卫兵走后，我因家中有事，亦匆匆离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大雪纷飞，我冒雪蹬车去高教部上班，刚到二楼，见一个人蹲在办公室门口，近前一瞧，原来是劳改队里年龄最大的刘司长，他对我说：你可来了，出大事了。原来，我走后不久，浙大红卫兵又杀了回来。他们直奔后面的小二楼，并将蒋南翔等人装入麻袋，扔上早在门口等候的大卡车，直奔火车站。当时恰好年迈的刘司长在厕所，忽闻动静不对，没有出来，才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当时我一听，焦急万分，顾不得一切，马上与清华“井冈山”、浙大的红卫兵联系。然而一切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一个人颓然坐在办公室里，感到筋疲力尽、两眼无望地注视着窗外：真不知这样的天寒地冻麻袋里的老人们会怎么样？用麻袋把他们扔上卡车，然后装上火车，他们能挨到浙大吗？他们的命运将如何……甚至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

大约一周后一天的傍晚，寒风刺骨，风雨交加，在寒冷昏暗的暮色中我蹬着车去高教部值夜班，刚到楼梯口，我看到有一堆东西，走近看见几个大麻袋，我随脚踢了一下，麻袋微微颤动了一下，我即刻明白了里面可能是他们，便立即将麻袋打开：只见一个人缩成一团，全身在颤抖着、臭气扑鼻；接着我又打开第二个：其中的人也是缩成一团，已不能动弹，身体滚烫、喘着粗气、奄奄一息；又接着第三、第四个……我将他们一一抱出麻袋，放在水泥地上，他们已无法站立，痛苦的折磨和极度的衰弱已经没有一点力气，我拿起一个脸盆，跑着来到西单商场，买了半盆馄饨及十几个烧饼等急忙回来，让他们赶紧吃，他们显然已是很长时间滴水未进了；其中的一个局长被打掉三颗牙，嘴角还在渗血。接着，我又去打了一盆水，帮他们擦脸时才发现个个鼻青脸肿、浑身带伤。待他们吃了点东西，稍稍恢复些体力，他们

才告诉我：被装在麻袋里，像货物一样在火车上被踢来踢去，到杭州后分别在浙大、杭大等几所高校接受批斗，处处受到非人的待遇……我连扶带抱地将他们一个个送回小板楼住处，我扶蒋南翔时，发



清华大学红卫兵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宣传破“四旧”

现他的金丝边眼镜已被打丢，其右腿拐得厉害，我问他：骨头有没有伤着？他说开始很疼，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安置他们停当后已夜深人静，我久久无法入睡：看着这些革命老前辈被无知的年轻人折磨成这样，我实在心疼，他们紧紧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几十年，并建立了新中国，对党忠心耿耿，却成了走资派，而乳臭未干的少年都成了高高在上的革命派？

经过几周的治疗和恢复，劳改队也恢复了正常。毛泽东又发出了“回校闹革命”的最高指示，那听话而又闹够了的红卫兵回到了学校。一天，清华“井冈山”通知我马上交接工作，回校闹革命。于是我很快办了交接手续，趁着晚饭间的空当，我向“劳改犯”们一一告别：他们注视着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瞬间我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难得啊！最后我来到蒋南翔的房间向他告别，我说：“我要走了，回校闹革命，真正的清华“井冈山”要来接管你们了，你要多加小心，多保重！”他一脸茫然，沉默一会儿，他说：“谢谢你对我的关照，你走了，我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他走到小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支笔，然后从手腕上摘下了手表，走到我面前说：“孟起，我身上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这两件是我随身用了几十年的东西，你留着吧，如果以后咱们还能见面，你再还给我；如果不能见面，你就留作纪念吧！我也没有什么人可托付的了。”我接过这两件东西，激动得不知所措，我心里明白：他的夫人

欧棠亮在中联部正红得发紫；而子女却下落不明，也许我是他唯一能托付的人了。我看着这两样东西：一支派克笔和一块欧米茄手表。这些在当时算是名贵物品。我想了想说：“笔我留下，表你留着，说不定需要时用它换钱哪！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再坚持了，而彼此的双手长时间、紧紧地握着，难以分开；我哽咽着对他说：“蒋校长，我们一定会见面的，我等着您，多保重……”泪水顺着我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也热泪盈眶地说：“谢谢你，坚强些，我们一定会重逢的。”我感到浑身一股暖流在涌动，这位老人平时沉默寡言，神情木然，然而却拥有一颗激情火热、坚强不屈的心！

回校后，我将派克笔仔细清洗了一遍，用布裹着，并在宿舍里找了一个常人难以发现的地方藏了起来。

有一天，突然有几个红卫兵抡着皮带，踢门闯入，高声嚷着：你是孟起吗？我回答是。话音刚落，其中的一个举起皮带朝着我的脸猛抽了一鞭，我顿时两眼冒着金星，天昏地暗，脸上火辣辣的，还没容我反应过来，几个人将我双手反剪，被按着头，紧接着屁股上又挨了几脚，然后，便莫名其妙地被押走了。他们把我推进了一间小屋，接着将门反锁了。屋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又气又恼，拼命地拍打着门，大声叫喊：放我出去！为什么要关我！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没有人理我，渐渐的我的嗓子喊哑了，整个身体疲惫不

堪，瘫坐在水泥地上，借着门缝透进的一丝光线我才看清：这是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仓库，没有窗户，里面堆放着各种过期的刊物、报纸及一些彩旗等杂物。我干脆躺在上面，内心渐渐平静下来，思索着红卫兵为什么要抓我？绞尽脑汁地猜测各种可能性：是高教部的“劳改犯”出卖了我？这似乎不太可能。或许是我父母的“专案”又发现了新的罪状因此而牵连到我？我更寄希望于他们搞错了，然后将我放了；但是，我苦苦地等待了两天，连门也未被打开过，我有些熬不住了。正当我昏睡之间，突然门被打开了：门外射进那刺眼的光线晃得我两眼难以睁开，随后我被双手反绑着，并有人将一个牌子往我的脖子后面插了进去，然后被一帮人连拖带按地押到了大礼堂，台下坐满了红卫兵小将和普通群众，全场人声鼎沸：“打倒现行反革命”、“打倒走资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便是语录歌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其他五、六个人同时被押上了台：“批斗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大会开始了，台上声嘶力竭，台下群情激昂，我被按着头，撅着屁股，两眼直视地板，双手被垂直反绑着，当时，我什么也无法看到，什么也没有听清，整个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根本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大会整个过程简短有力，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那时，像“批斗反革命分子”等名目的大会经常开，犹如耍猴一般容易，人们已司空见惯。红卫兵又将我押往台后，给我松了绑，又朝着我屁股一脚，滚吧！没等我回头问个究竟，那些红卫兵早已作鸟兽散了。回到宿舍后，同室好友悄悄地告诉我，水利馆前的墙面贴满了关于你的大字报……我耐着性子挨到了半夜，套上棉猴、戴上口罩、怀里揣着手电筒，悄悄地来到了水利馆前：《蒋南翔的变天账》为大标题，副标题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孟起通风报信……其内容全部是蒋南翔的日记实录：某月某日，孟起给我送来了《人民日报》……我认为今天的社论……某月某日，孟起送来了《清华大字报汇编》第四期，其中有几篇大字报我不能苟同……某月某日，孟起为了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文件，将我们的劳动时间减半，并改为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甚得诸公拥护……某月某日，孟起将由打扫厕所调换至食堂劳动……至此，我全明白

了。蒋南翔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红卫兵接替我后立刻抄了他的住所，搜查出了这本“变天账”，显然我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事实”面前我无冤可伸，罪有应得嘛！

1968年我离开清华大学后，无论是在胜利油田劳动改造，还是在燕山东方红炼油厂当司炉工、车间主任期间，我始终关注着蒋南翔的消息。在那个年代里，好消息几乎没有，而坏消息接连不断，不时耳闻蒋南翔在不停地挨斗，他仍顽固不化、抵抗到底。我心里明白：他在维护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为了坚持真理，他宁死不屈，确实是一条硬汉子。

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然而，仍然没有关于蒋南翔的消息。直到1978年，从朋友处听说蒋南翔已复出工作，并在天津市委任职，我半信半疑，抱着投石问路的心态，致函于天津市委，不久，便收到了来自天津的复函，并且还是蒋南翔的亲笔，内容简短：孟起：你好！我已开始工作，现任天津市委文教书记，不久可能回北京工作，希望能早日见到你。保重！

数月后，单位领导转告我，蒋南翔已调入北京工作，并任中科院副院长，他希望能与我见面。在约定的时间，蒋南翔派车来燕山石化总厂接我前往中科院，在那里我见到了阔别了19年的老校长；我们再一次紧紧地握着手，热泪盈眶地彼此问候，接着他说：“对不起，让你吃苦了。”说实话，这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又可见我挨斗之事他早已有所闻，然而，与他相比我所受的苦又算得了什么。在这久别重逢之时，我仔细地端详着蒋南翔：他基本没有变，似乎比以前更内向、沉默寡言，表情甚乏；然而在他额头间的皱纹更加深刻，这是十几年来历经沧桑的见证。另外，当我将他托我保管的笔交还于他时，他异常地惊喜，他要我将它留作纪念，但我却不知为何执意要归还于他。

踏入他办公室的瞬间，它那宽大而舒适的环境，柔软的地毯，明亮的家具，一下子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他已不再是十几年前在那板楼的小屋里的那个近在咫尺的蒋南翔了。在这以后，蒋南翔又几次来电话约我，我也曾赴约过几次，但总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共同语言越

来越少,另外,他的工作很忙,我也不愿意多打扰他,由此而渐渐地中断了联系。

1980年,我被国家经委选派前往日本研修企业经营管理科目,回国后被分配在邮电部下属之508厂工作,并任厂长,这是一个千人以上的大厂,以生产集成电路为主,当时亏损严重……我接手后,吃住在厂里,并决意参照日本的企业管理办法将它彻底改变面貌……该厂位处小西天,我每天早晨在师大附近跑步,有一天清晨,我正在跑步,远处望见前面有位老人在散步,背影似乎很熟悉,我加紧脚步跑上前去回首望去,那位老人亦恰好透过他那金丝边眼镜望着我,并用手指着我说:你,你是……他是蒋南翔,真是巧遇;我们边走边聊,原来他就住在附近四号院的部长楼里,已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从这以后,因为彼此离得很近,我们不时在一起聊天、讨论,由于他对企业管理不熟悉,每次谈及此话题,他都很认真地听我讲,还不时地提问,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有时还作记录,我见此赶紧劝住说:请别写日记,他听了便开怀大笑;在彼此谈话间,他仍然听得多,讲得少;但每次的交谈他都能教导我处事的原则及给予我各项事宜上的支持。当时,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为了精简人员,我一下子裁掉了300员工,不少人上告国务院、中纪委,随后国家经委便派调查组对我展开调查;然而,蒋南翔却鼓励我:只要是正确的就要坚持下去。又当我准备改造工厂的封装工艺,并急需外汇时,他又主动提出帮我张罗外汇额度等等;这些帮助在当时解决了我很大的实际困难。我与他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更加了解,我们有时边吃边谈,经常聊到夜深人静才散去,那时,在不知不觉之中,彼此已成了忘年之交、平等以待的挚友。当时,在他老人家的支持下,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工厂已扭亏为盈,我也因此被选为人大代表。

1984年,我被调至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被派往东京任驻日总代表及东华基金事务局局长。从此以后,我与蒋南翔的联系便基本中断了。当时,中信党组书记、副董事长熊向晖是我的上司,他是清华早期地下党,并与蒋南翔是老战友,从他那里我常能了解到有关蒋南翔的近况。



蒋南翔 1988年3月16日摄于北京医院

然而,由于我常驻海外,回国机会较少,而每次回国皆是公务缠身,来去匆匆,所以很难有机会再与蒋南翔相见。

记得1986年间,一次,熊向晖告诉我:“南翔同志住院了,在北京医院,你抽空去看看他。”我去看过他一次。他逝世前半年的一天,我曾去北京医院看望他。那时,他已病情较重,身上插满管子,鼻子里吸着氧气,脸色苍白,神情憔悴,言语吃力,当他认出是我时,热泪盈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并劝他不要讲话,彼此就这样长时间地心心相印地偎依着,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深感如此一位在文革中被批斗千百次而宁死不屈的斗士,而如今被彻底地击倒在病魔面前,那是多么地无奈和可惜啊!探病号的时间到了,他仍然不愿松开手,我更依依不舍地离他而去,这便成了彼此间的永别。

半年后的一天,我接到了向晖同志来的电话:南翔同志去世了。下面的话便哽咽住了。我伫立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久久地注视着窗外……一场暴风雨之后,蒸腾的水蒸气模糊了喧哗的东京都,仿佛一切均腾升在云雾之中。我明白,这是上苍在悼念南翔同志。我的师长、共患难之挚友,尊敬的长者安息吧,您那硬骨头精神将永远驻在我心中。

(责任编辑 吴 思)

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

● 曾彦修

对于康生在土地改革中的极左错误,20年来,报刊上传说甚多,可惜多为想当然耳的凿空之说。真实情况,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而谬说则至今还在制造不歇,例如,说毛岸英仿佛是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核心似的,这就是言必个人崇拜的陋习仍在作怪。

近几年我从山东阳信县(当时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接到的来信也说明当地现在已不大知道1947—1948年的基本情况了,还以为是我们这个土改工作团去打倒了他们的区委书记景晓村同志等的。而报刊上对康生1947年春夏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超左、大左、特左、左得出奇的事实反倒未看见一字(身历者、知情者确未公布过一字),或至多说一点听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康生的这整段事情就成了一锅糊涂粥,并使参加过这个工作团的人员连带受点累。参加过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成员,现尚存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等四个当时的青年工作团员。老年团员健在的,还有高文华、贾连夫妇,但高当年即在病中,虽随团行动,已不能下村了,估计他知道的具体情况会少些。土改团这件事谈不到是大事,只因康生一直是团长,陈伯达挂过短时期副团长的名,随行学习的又始终有毛岸英,于是乎各种各样的讹误、附会就无止境地在报刊上出现了约20年。恐怕还要编造下去的。于光远、凌云、史敬棠三人看来懒得辟谣,我只在这里写几句把这事说一说,反正在医院里也闲得无事。

工作团缘起中央组织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可能是在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中央就决定组织一个土改工作团出发了。延安党中央各机关的撤退工作,实际上1946年的十、十一月份就大动了。撤到延安以北大约三天路程的以瓦窑堡为中心的很大一片区域。春节后,住在撤退地区的中宣部的毛岸英走了,未听说去何处。过几天中宣部临时负责人许之桢通知我说,已指定我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由中央各单位派人参加,分头出发,到晋西北兴县中央晋绥分局集中。同时告诉我,毛岸英也是到这个工作团去,他大概是与康生同行。

我走到兴县后,才知是由中央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由康生任团长,陈伯达任副团长。团员几乎全是老同志,有张琴秋、高文华夫妇(高是1936年刘少奇到平津前华北党的主要负责人),廖鲁言夫妇,徐冰、张晓梅夫妇(先期赴山东),李国华(李立,中组部科长,即现在的局长,听说是参加三湾改编的红军现在仅存的一位),张越霞(博古夫人),张勃川……几乎全是20年代参加党的老同志。“一·二九”到“三八式”的新党员只有四人(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后来田家英

插进来了个把月。)凌云是这个团的秘书兼康生的秘书,实际管团内事。

到了晋西北时,李井泉任晋绥分局书记,似乎他也是一个一言堂的一言堂,但在政治局委员康生面前,官低几级,也就只有绝对服从康了。

延安出发的全部工作团员插在晋西北的四地工作:1、康生带领曹轶欧、凌云、毛岸英在晋绥老区二专区临县郝家坡工作,那里是工作团总团部。2、陈伯达率田家英(后赶来参加)、史敬棠二人到静乐县工作。3、张琴秋率李国华、张越霞等老同志及曾彦修到解放区朔县工作。4、廖鲁言率于光远等到半老区保德县工作。下乡一个多月后,刘少奇、朱总、董老等率队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组织中央工委,路过兴县,把陈伯达带走,陈又把田家英带走了,工作团便取消了静乐县这个点。

二

1947年三、四月,全体人员到晋绥中心兴县会合后,分四路参加到由当地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中。第一路由康生自领,分团长是临县地委书记赵林,但一切由康说了算。

康的总部设在临县郝家坡,是一小村,40来户。另三队为陈伯达静乐分团、张琴秋朔县分团、廖鲁言保德分团。这三个分团均由晋绥的领导干部任正团长,延安出发的工作团老同志任副团长。这几个分团各相距数百里,又无长途电话,全是各自为战,互无丝毫影响。因此,康生对我们的工作均一无所知,我们对他也一无所知。大概到了1947年7月,在临县郝家坡,才由晋绥分局召开了一次土改工作试点汇报会议。晋绥八个地委书记大多到了(似还到了几个县委书记)。会议是汇报各地土改试点情况,并定出新的做法。实际一切听康生指示。会上,保德地区是由廖鲁言、于光远二人参加,但于临时生病,住了医院,会议全程未能参加。朔县地区大组本应由分局组织部长、正组长张邦英或副组长张琴秋(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但他们回来不易,一个人要一马、一饲养员、一警卫员陪送,还得叫我跟着。因此决定不去,叫我一人去听会。我走了八天才到郝家坡,其中从兴县到郝家坡就要走两天。

路边村庄,几乎全有延安撤过来的党中央机关。我就信步走去,走到哪里天快黑了,就去找那里的机关,只要说明来意就可以住宿。我走到一处公路边,已晚饭后,看见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谢邦选等同志在散步,上前去说明来意,即要我进村吃饭住宿。饭时,老谢等几位同志说康生在郝家坡土改,死人很多,到处挖“底财”(也写作“地财”),掘坟墓,群众极反感,几老意见多得很,但不便提,你最好去见见吴老(吴玉章),听听他的意见,反映给康生同志。我回答,已八点多钟了,不便去打搅吴老了。而且几老都不便讲话,我还能开口?这些意见是:死人太多了,吊打太多了,追“底财”太厉害了,挖祖坟太厉害了……尤其是最后一项,是完全不对的,最脱离群众,老百姓在背后骂,只有二流子赞成。所以,我还未到达康生总部,一股前所未闻的恐怖气味就已经把我吓坏了。

三

康生在郝家坡土改试点汇报会议上(李井



康 生(1898年—1975年)

泉主持并全程参加),有什么“左”得出边的错误呢?我看到的主要几点真实情况是:

第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康生从根本上废除了划分阶级的生产关系标准,即是后有剥削行为的主要标准。晋绥原有一个划分阶级标准的内部文件,原则上是正确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可是康生硬是在会上说,正是这个文件“害死人”,束缚了干部和群众的手足。他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这是原话,我在场听见的)当然非真烧,是作废的意思。这本是晋绥自订的土地改革的小宪法,把这个东西烧了,当然就只能盲动了。毛1948年春末夏初过兴县时曾批评了这件事,说是晋绥分局“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而一字不提康生。晋绥1947年自春至秋有半年多时间土地改革搞极左,根本上就是出于康生的这个指令。我在场感到震惊,自然是反对康这种彻底打倒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但自延安前几年整风抢救后,一个普通党员对一个政治局委员哪还敢提意见,那是彻头彻尾的“反党了”,所以我不敢作声。只能做驯服工具,听任康生胡说八道。1978年国庆节前后,我在昆明一招待所遇见了李井泉,我上前自我介绍,说我是在郝家坡亲耳听见康生下令把马克思主义烧掉的,你受了冤枉,我愿向中央写信证明。李说,谢谢你,不必了,毛主席当时就知道是康生讲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康生主动来向我握手,说了声:对不起,让你挨批评了。所以这事就不谈了。李井泉是平和的,只是有点神秘的微笑。1982年我又在成都遇见当时晋绥分局宣传部长、30年代马克思主义农村问题专家张稼夫同志,对这个问题谈了两个钟头。张说,那个划分阶级的文件,是用了很大功夫弄出来的,我和段云同志等带着工作组经过多次调查后起草,分局通过的。康生那么轻佻地就叫一把火烧了,这人连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也不要了,老人家知道是康生叫烧的,批评的是我们,我们也没作声,当然,我们没扛住康生也有责任。

第二、康生过分看重没收与分配所谓“浮财”、“底财”,使农村更加混乱、破败。所谓浮财即土地以外的物件,如衣物、家具、牲畜、农具特

别是粮食等。为追求这些东西,特别是银元、手饰等,就由一些游民及小青年带头,大挖人家的祖坟。总是多少有所收获,就越挖越厉害,群众反映极坏。附近疏散过来的中央机关,也没有人赞成的。那时附近还有一个中央授权的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也无权干涉康生。

第三、由于过分追逼浮财、底财,所以就不得不依靠少数农村游民分子和极少数“勇敢分子”,这些人一掌握了斗争主导权,必然就要发生残酷武斗现象。被斗者痛不欲生时,自杀就多了。康生那个40来户人(我听说是37户)的郝家坡,就死了几个人。乱打乱斗,自杀,使农村陷于极端恐怖状态中,这丝毫不是什么“革命秩序”,而是对社会秩序、社会生产、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即旧式的流寇作风。至于近20年报刊上讲得最多的,说康生发明了个“化形地主”阶级,因此把很多破落户都作为地主斗了。这说法反倒不确。在康生来到晋西北之前,当地报上已经很有“化形地主”之说了,康生不但不予纠正,反而火上加油,承袭了此项谬说。在郝家坡会议期间,有天晚上康生叫我单独去汇报朔县情况。我讲了个把钟头,康的态度倒始终和蔼,听得进去,这是事实。我还强调了地主与富农的区别,经营地主与纯封建性地主要有所区别等。康耐心地听下去了,笑着对我说:这些全是你的花样吧?张邦英、张琴秋他们恐怕连这些名词都没听说过(指“经营地主”、“不带封建性的富农”等词)。康对我的指示是,回去向张邦英、张琴秋传达,一切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不要搞那么多框框。并特别告诉我,不要那么强调地主、富农的区别,像你村的那两户大富农,不要那么书呆子气了,分光了了事,不然你拿什么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我感到康这人是二重人格,道理他全懂,为了乌纱帽,他只能做他明知不对的事。

我跑了八天返回朔县,对康生那套极左做法一丝也不敢泄漏,尤其对任何人均不敢提康那里到处挖祖坟的事一个字,如果我提起了这些事,工作团内万一有人要求起而效法,就压不住了。

我回朔县本村后,把两户勤劳殷实的兄弟富农全扫地出门了,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硬是在我的授意下,眼睁睁看着把那个农村中那

一点儿唯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彻底毁灭了。我眼见两条大犍牛被牵走了（八家人各分一条“牛腿”），当地最先进的光亮农具被拿走了，我知道它们从此也就完了。我看过《被开垦的处女地》，牛拉去几天就死了，我现在就在被迫做临时的拉古尔洛夫。建国后，我在上海郊区劳改时，看见那么多精美绝伦的龙骨水车都变成了一堆堆的废木片，真叫人痛彻心肺！我们多少年以全力破坏农村中的那点儿落后的生产力，还硬说是在不断革命！

康生这套做法的实质，归纳起来，我以为不外三条：第一条是严重破坏了、粉碎了马克思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标准彻底破坏了；第二，破坏了阶级斗争中正确的阶级路线，放手让游民阶层唱了主角；第三，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和工商业生产。通俗地说，康的乱打乱斗造成的三大结果是：大混战，大恐怖，大破坏。归结为一个“大”，则是大破坏。康生可谓提前20年实行了“大乱特乱”政策。

郝家坡会议的两个半月之后，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会议。作为中央派出的土改试点工作团团长的康生，在这个会上却没有发过一次言，我以为这恐怕是少奇同志他们看穿了康生的左倾，没有让他发言。另一方面，朱德、董必武同志却作了长篇发言，他们二人的发言是我听见的、包括以后听见的对土改工作最正确、最稳重的发言（但大会上有的长篇发

言比康生还“左”）。土改试点工作团员全都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

四

1947年约4月中，全国土改会议结束后，土改试点团暂时在西柏坡等村待命转赴河北冀中区工作。此时康生另有任务，早已由康生、曹轶欧夫妇带着凌云及毛岸英乘车赶去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的阳信县了。看来是紧急任务，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之后，1947年11月9日，留西柏坡等村的全体团员按原计划乘大卡车赴冀中，于12月13日抵达冀中区区党委所在地饶阳县某村。工作团在冀中的整个时期，康生均在山东整人，我们一无所知。工作团在饶阳县搞了一个多月，即接康生山东电，令全体团员立即去山东渤海区阳信县同他会合。这回是步行了好几天才到阳信县乡村的（老同志们坐农村大车，循例由“三青年”分管食、宿、行照顾）。我们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某村时，康生已去胶东整人去了。

我们到达时，渤海区党委书记已经是新任的张晔了（或向明）。行署主任好像叫×人凤。前任

論 言

我想講的是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這是幾個重要問題，但不是土地改革的全盤問題，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都獲得有很大的成績，在廣大的解放區內掀起了熱烈的羣衆運動，已經或正在徹底消滅中國存在幾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剝削制度，使千千萬萬的中國農民翻了身，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民運動，也是我們今天戰爭能夠勝利發展的基礎，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所最爲懼怕的。去年九月土地會議，全般地討論了土地改革問題，並作出許多重要決定。中央機關土地會議的結果，頒發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建議各解放區政府施行，土地法大綱的公佈，清楚地明確地在全國人民面前指出我黨土地政策的方向和辦法，我們應該堅決擁護。任何對於土地改革的動搖投機變遷，甚至防礙都是不能容許的。但是土地改革工作是一項繁重複雜的工作，我們爲了維護土地改革爲了實現土地改革的目的，除了提出土地法大綱之外，還必須對於農民實際運動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給以正確地具體的解決我現在根據中央最近的決定，建議在這一偉大運動中所發生的，必須引起全党注意的下列幾個問題。



1948年1月，任弼时发表讲话纠“左”，中共中央将讲话转发全党

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王卓如均已被撤职了。这两人,我始终未见过。现根据一些书籍和前几年从当地来信得知,1947年秋渤海区党委循例先开整党工作会议,然后搞土改。华东先是派邓子恢去参加这个会,要求首先把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王卓如拉下马。邓子恢去后,久久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康生奉命急驰山东渤海区去完成这个任务。康打掉景晓村后,又赶赴胶东区去打掉该区区党委书记林浩(与饶漱石合力)。因此,我们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地鲁西北阳信县时,并没有见到康生,因为他已到胶东区去整林浩去了。看来,要狠狠整人的事,非康生莫办(景晓村、林浩二同志均早已平反了)。

至于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根本原因是,康生这时已不可能这么干了。他在整完景晓村、林浩这两个区党委书记后,已进入1948年2月,已不准那么左倾蛮干了。我们工作团到渤海区党委时,已是旧历春节前几天,此时下村不合适,上面决定过了1948年的旧历春节初五之后再进村。这时,任弼时同志1948年1月15日在陕北做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政策问题》报告,明显纠“左”,政策界限分明,解放区人手一册,全党谁敢顶着不办?康生已无可能另搞一套左倾政策了。此时,康生本人对工作团关于工商业问题作了一次反对左倾的长篇谈话。康生在胶东整了林浩之后,回阳信县渤海区党委时,康夫妇、凌云、毛岸英四人是一同回来的,车过黄河口,去当时的工商重镇羊角沟,眼看一片破败,工商业几乎全整垮了。康生这次对我们讲的全是反“左”及坚决保护工商业问题。以后凌云同志又给我们补充了很多具体情况。康的这次讲话,当然是受了任弼时同志报告的影响,他的全部精神是反“左”,则是绝对的事实。所以,近20年报刊上说康生在山东如何大搞极左时,康正在山东根据中央指示反对极左。康生这个人是一个极具二重人格的人,为了越来越大的乌纱帽,他可以干他明知道是极坏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毛岸英随康生撤出延安,随土改工作团行动,一是安全撤退,二是随团学习,并非正式工作团员,因为他才从苏联回来半年多,他没有正式任务,但可以化名到各处看,也什么

事都可列席。小毛作风粗犷,个性爽朗。在渤海区党委时,于光远、史敬棠、曾彦修、毛岸英四人总是住一间固定的房子。小毛从胶东回来后,在我们面前批评过康生,说康生整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太狠,太过分,缺少政治家风度,又极力赞扬饶漱石,说饶是个政治家。曾等三人,才从延安整风、抢救、审干出来,余悸尚存,反而温和地批评了小毛,说在背后议论中央负责同志是不对的,要他不要再对别人讲这些东西了。小毛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不错的。主要是他没有表现出一点天潢贵胄的气息。

五

康生在冀西北土改试点中,已不是什么左倾,而完全是胡作非为了。但因为无民主可言,上级就是真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话已形同上帝,明知他大错特错,不管你多少老长征,老马克思主义者,老干部,在这个权力尖峰面前,都不能反一声。当时在康生土改试点周围居住的诸“老”究竟有哪些人,我不很清楚,我想下列党内外诸老,大部分总在那附近。这就是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张曙时、李六如、李木庵、续范亭、陈瑾昆……叶帅也在那附近,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不反对康生那一套,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对康生提一点意见。这才是最可悲之处: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的影子哪里去了?权力即真理,集中即真理,越来越发展,到这时(1947年)已经是一种铁定的制度了。

郝家坡会议,不是一个小型的庐山会议么?康生叫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就得烧,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一点疑问,什么人都得在权力面前、在荒谬绝伦面前做驯服工具,而这反被荒唐地美化为“党性”。像康生这样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人,竟被认为是毛以外最大的理论家,在上世纪40年代,他是整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60年代他被任命为党中央的“理论小组”组长。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终于发展成为纯自杀性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民主,就一切进步都不能得到保障。不消灭权力即真理的这种“黑洞”,那就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责任编辑 吴思)

《长征组歌》创作始末

● 李遇秋

领受任务

1965年2月,时任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团长的晨耕同志找到我和生茂,说上级交待下来一个任务: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写的《长征组诗》谱曲。当时的情况是,这个任务同时还交给了总政歌舞团,要总政歌舞团写成专业合唱团用的大型作品,而我们则写成群众性的队列歌曲,类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分节歌,也就是一个旋律、多段歌词反复唱的那种,便于在群众中传唱。

《长征组诗》的完成稿应当是14段,但当时只有10段,后4段是写长征以后的事情,如东渡黄河等,当时还没写出来。我和生茂仔细研究了诗稿,觉得如果这10段诗词谱成一个旋律倒是简单方便,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同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者是统一内容、同一情绪、简单直接的歌词内容。这种情况,多段歌词用一个旋律是可以的,也比较贴切。而《长征组诗》在情景转换、节奏变化、感情跌宕上的幅度之大,在我们接触过的大部分作品中,还没有遇到过。所以,《长征组诗》的10段诗词,作为歌词来谱曲,是很难用单一旋律来表现的。也就是说,这10段诗词用一个旋律是“装”不进去的。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晨耕同志也同意了。

进入创作

“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这一总的

创作思路和原则确定之后,《组诗》的谱曲工作便正式开始了。最初,我和生茂的分工是他谱写前6段,我从第7段开始往后写。自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回团后,领导交给我的常常是一些器乐作品、话剧配乐、舞蹈音乐和声乐伴奏等等这类“别人干不了”的工作。虽然歌曲也写过一些,但是,为《长征组诗》这样大规模的诗词谱曲还是头一次,而且作者又是萧华同志。所以,对于这次创作我是非常重视的。我参考了手头的许多资料,还特意观摩了当时正在北京演出的秦腔和眉户剧。

第7曲《到吴起镇》的旋律初稿写完以后,看来生茂不太满意。这时他已经完成了前4曲的旋律稿的起草。他和我商量:“时间太紧,写旋律我还行,编合唱我干不了,咱俩分工吧,我写旋律,你编合唱,来个流水作业,这样可以快一点。”我同意了。

后来,生茂把我起草的第7曲旋律稿做了较大的修改,只在其中保留了一些音调。8曲以后的旋律创作情况是:唐诩起草了第8曲《祝捷》,生茂、唐诩共同起草了第9曲《报喜》,又将第1曲《告别》改变速度和情绪,作为第10曲。

与此同时,我的编写多声部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着。为了更加符合内容的需要,我在对全部的原始主旋律进行处理时,尽可能地在音乐方面进行艺术加工,而不仅仅是添加一些声部。如第3曲《遵义会议放光辉》(原来叫《进遵义》)开头的女声二重唱,使用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手法,连续几个大二度的碰撞,突出了民族地区特色;第5曲《飞越大渡河》,我觉得原主旋律的紧张度还不够,欠一把火,便在前面加了一大段

“划船号子”，等到歌词出现的时候，情绪已经“成熟”了，这也是我自己颇感得意的一笔。第10曲《大会师》套用第一曲的旋律，可以发挥“再现”的功能，使整个作品更加统一完整。然而它的情绪却需要做很大的调整，所以我就利用合唱，唱出雄壮高亢的“啊”声，并加以发展，把原来的压抑情绪一扫而光，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长征组歌》的声乐初稿（包括主旋律稿和部分多声部稿）终于拿出来了。

起草和讨论是交叉进行的。每起草若干曲便进行一次讨论。我和晨耕、生茂三个人（后来又加上了唐诃）对每一曲的旋律稿进行研究，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对我来说，这也是向他们学习，提高“课堂以外的实际创作能力”的绝好机会。晨耕虽然没有亲自动笔起草，而在组织工作上，创作思路，排练演出的落实等等方面，却也出了不少好主意，作了许多工作。

最后，关于作品的命名，按照作品的规模样式的常规来说，应当叫做“大合唱”（Chorus）、“交响大合唱”或“清唱剧”（Cantata）。但是，当时我们参照并借用了萧华同志的原作《长征组诗》这个标题，改动了其中的一个字，即将“诗”改为“歌”，于是就叫做《长征组歌》，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方面来看，就这部作品自身而言，这个命

名应该说是很贴切的。没想到的是，从此之后，凡是多段词曲组成的大型声乐作品，都被称作“某某组歌”（Suite）了。我在这里说明这一背景，目的也是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大家还是沿用原来习惯的、世界通用的称谓更好一些。

杭州汇报

《长征组歌》的初稿定下来以后，在1965年的4月中旬，由晨耕同志带队，在萧华同志的秘书李圭同志的安排下，我们一行四人到杭州向萧华同志汇报《长征组歌》的创作情况（当时萧华同志正在杭州养病）。汇报时，从第1曲到第10曲，我们四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在合唱的段落，我们就每人一个声部：唐诃唱女高、我唱女中、晨耕唱男高、生茂唱男低。汇报进行得不错，萧华同志很满意。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不顾病痛，安排了10天时间给我们讲解《长征组诗》，每天用一整个上午，讲解一段歌词。他逐字逐句地讲了《组诗》的创作过程、意图，以及对音乐的要求；讲了长征途中相对应的历史情况和动人故事。讲到生动时，他也手舞足蹈；讲到感动时，我们都为之潸然。这次讲解，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可以说，这次的杭州之行，我的收获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我进一步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以及后来的

多次大的修改，打下了形象的、历史的、文学的基础。

后期创作

“五一”节前我们一行回到北京，之后又对《长征组歌》的声乐初稿从头到尾进行了一次研究。我们边讨论、边修改，直到拿出了较为满意的初稿作为定稿，创作的第一阶段就基本上完成了。接下来，



1965年4月在杭州，萧华同志和《长征组歌》的四位曲作者合影。左起：生茂、唐诃、萧华、晨耕、李遇秋

对初稿的旋律进一步地进行润色、编写全部合唱、写好乐队部分,特别是把握好独唱、合唱、以及器乐三者之间的既要互相协调配合,又要突出各自的特点,最后写出全部总谱的艰巨任务,就完全落在我的身上了。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是:唐诃在这方面没有专门学习过;晨耕学习过两年,但由于他身兼总团副团长和歌舞团团长的要职,每日公务繁忙,



本文作者

常年脱离五线谱,也就忘得差不多了;生茂虽然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过,可是他一门心思用在“写好旋律”上,对多声部技术不感兴趣。而且在平时的创作中,旋律以外的活儿都由别人代劳,久而久之,他也就自认为“只能写旋律”了。

我的经历对我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很有帮助:我出生在冀中,经历过几次大的“反扫荡”炮火的洗礼,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华北地区的几次大的战役;1950年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经过长达6年的学习后,毕业回团做专职作曲工作。

我没有爬过夹金山,可是有在十冬腊月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在大山上行军的经历;我没有走过草地,可是一连三天吃不上饭,从地上抓一把野菜充饥的日子也过过。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有生活、有素材、有技术”的优势,每三天完成一曲,10段曲子30天便完成了任务,而且基本上未作改动,全部一稿通过。

6月下旬到7月底,正是在三伏天里,那时没有空调,没有电扇,3平方米的小屋热气蒸人。我一头扎进屋子,脱了衣服,脚下踩着凉水盆,背上披着凉毛巾。胳膊上满是痱子,桌子的木沿都被汗馥糟了。就是在这样一种难以想象的、最艰苦的条件下,终于写出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音乐

作品《长征组歌》。

写作总谱时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还不限于此。我写的总谱,是要给演出队伍用的。但是当时团里的演出队伍情况,可以说是极为简陋的,按常理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大型的作品。那时战友歌舞团歌队的编制,连独唱演员算上也只有22人,而排演大合唱的常规人数应在60人以上。于是,领导上决定把歌剧团的一些演员、甚至舞蹈队的人员借来,凑了40来人。其中的一些人当时还不识谱,他们是“听”会的。在这种情况下编合唱,太简单了效果出不来,稍复杂一点儿他们又不会唱,使用“复调”手法更是没门儿——即使我们的专业合唱队员,也从未唱过复调作品。

乐队的情况就更糟糕:1964年的“乐队改革”,强制性地取消了一切西洋乐器,拉提琴的改拉二胡,吹小号的改吹唢呐,一顶“改与不改为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的帽子,压得大家无法说。到排《长征组歌》时虽说恢复了管弦乐队,但也还是残缺不全。配器当中根本无法解决平衡与融合等基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来个“中西结合”,有一件算一件。以残缺不全的管弦乐队作为框架,把箏、扬琴、二胡、三弦、唢呐等等平时只是用来独奏的乐器,都填充在这个框架里,像写重奏一样,让它们各自担负起适当的声

部任务。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还相当的好，许多同行还要向我请教“中西结合”的经验，问我怎么会想到这样子使用乐队。直到现在，总谱上的有些民乐声部还是“不可替代”的，如第6曲中的三弦、琵琶；第1曲的笛子、二胡，第8曲的唢呐、三弦、琵琶等等。

当时我有一个原则和决心：不管编制多么简陋，音乐不能简陋。我用写多乐章交响乐的技巧、手法和概括力驾驭全局，用写大歌剧的精神对待每一个片段，用写电影音乐的想象力去塑造形象。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直到现在，《长征组歌》中的一些场景音乐，如第2、第5、第6、第7曲的序奏，仍然可以说是很优秀的。

正因为我用的是“写重奏的手法写合奏”的思路，来处理《长征组歌》的多声部和器乐部分，才能在1966年《长征组歌》跟随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演出时，歌队（包括独唱）和乐队都压缩到了只有18个人，仍能保持着原有的丰满的效果。指挥唐江同志回来讲，在莫斯科演出时，一位苏联指挥家到乐池察看，当他看到乐池里只有18个人时，激动地说：“你们居然能让十几个人奏出一个大管弦乐队的效果，这太不可思议了。”

几次大的修改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逢写了比较大的、分量重的音乐作品，不论成功与否，都要抽出几天时间及时作一番总结，肯定成功的经验，找出存在的不足之处，避免在以后的创作中重复失误。而对于《长征组歌》的总结，我却是用了半生的时间。每看一次演出，每看一次总谱，每提笔作一点修改，或者每经历一次记者的采访，我都要用“现在”的眼光把它重新审视一番。

自从《长征组歌》上演以后，经历过几次大的修改。第一次修改是在1975年，《长征组歌》上演十周年之际，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纪录片，同时要在北京搞一次大规模的公演。利用这次排练、演出的机会，我们研究将《长征组歌》中一些不甚满意的片段做一次加工修改，具体操作由我来执笔。这次我重点将第2曲的结尾、第5曲的结尾和第10曲的开头做了修改。这次修改时，合

唱队比十年前有了较大的提高，所以我也就可以稍稍放开一点手脚，使用了十年前不敢触及的专业技术，如转调、复调等，来推动音乐的进行，提高音乐的表现力，使得形象更加准确、音乐性更强、合唱效果更完善了。

第二次大改是在1993年。当时北京军区的有关领导听了舞蹈界的意见，想把《长征组歌》改成歌舞形式，于是增加了舞蹈：一大群演员满台跑来跑去，比比划划进行图解，结果是画蛇添足，劳民伤财。这次修改也是由我执笔，忙活了大半年，总谱写了一大摞，最后不了了之。

第三次大改是在1995年，由中国合唱协会牵头搞的。在由词曲作者和组织者参加的预备会议上，大家决定还是由我来全权执笔进行修改加工。大家同意我为这次修改制定的大方向：保持原有的主要旋律和艺术风格，扩大合唱编制，丰富合唱手法，增加使用复调等专业技术，也相应地扩大合唱部分的篇幅。乐队部分的配器也扩大了编制，基本上是需要什么就用什么，前后历时半年，总谱写了一大摞。

改完以后进行了录音，经各级领导、专家审听，一致给予好评。这次的修改和审听从上到下，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以及有关领导的重视，影响很大。参与到这次活动中的各界领导和专家有：王平、高占祥、杨伟光、莫文骅、周巍峙、吕驥、李焕之、时乐蒙等，还有词曲作者（王新兰代表萧华）和聂中明、胡德风、郭淑珍、王秉瑞等。

1995年夏，在中国音乐家协会进行了第一次审听。孙慎、冯光钰、时乐蒙、张非、王秉瑞等领导 and 专家出席。在会上，大家发表了十分肯定的意见。1995年10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二次审听。会议由莫文骅将军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的领导、国务院文化部的领导、音乐家协会的领导等几十个人。王平、张震、高占祥、吕驥等同志在发言中，对《长征组歌》的加工修改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张震同志说：“《长征组歌》原来就很好，现在经过你们这一加工，就更加锦上添花了。”这个谱子在成都和西安也进行了演出，反响强烈，非常成功。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饶余燕先生说：“说心里话，确实好多了，好的不是一点半点。”

（责任编辑 致 中）

中国言论史上的王造时

● 傅国涌

不畏权势 伸张正义 发起宪政运动

1932年3月28日,南京,对话的双方,一方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一方为时为“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的一介书生王造时。

汪精卫:“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王造时:“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国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不负政治责任的人,说说还无所谓,汪院长万万说不得。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儿,不能拿私人请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先是“慷慨成一死”的少年英雄,英姿勃发,文采斐然,后是遗臭万年的汉奸。1932年的他无疑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视天下为私有,何等嚣张、自私、不可一世!王造时虽年仅而立,却曾是清华学生领袖,经历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为此坐过牢,又是留美的政治学博士,面对居高临下的汪精卫,他不亢不

卑,针锋相对,几句大白话就将这位堂堂政府首脑驳得体无完肤。

蒋介石使出他惯用的拿手好戏,拉拢王造时,为己用,先是通过王造时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1932年秋天又派蓝衣社特务头子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新亚旅馆的一番对话——

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

王回敬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有了这两番掷地有声的对话,王造时的名字就足以载入史册,何况他是盛名赫赫的“七君子”之一。与他熟悉的徐铸成回首前尘,写了一篇《记王造时》,首先提到“王是当年为坚持抗战而下狱的‘七君子’之一,而且决不是‘凑数’的。”“写出一篇篇犀利的战斗文章的,主要是王造时。在苏州法庭上,侃侃而谈,据法据理,质问得法官目瞪口呆的,也是王造时。现在如翻阅当时的报刊,还可以看到他的演词和文章,虎虎有声,闪闪发光。”后人往往只知道他作为“七君子”之一下狱这段历史,其实他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在办刊、办报、写政论,在以“文人论政”为根本特征的中国言论史上,他当然有一席之地。

从1925年到1930年,王造时留学美英5年,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追随拉斯基教授研究过“费边主义”。回国之初,他不顾老同学、老师的



1936年11月,国民党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史称“七君子事件”。图为在狱中高歌的六君子(左起)李公朴、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

劝说,拒绝到南京做官,而是选择到私立的上海光华大学当教授。不过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就在《东方杂志》、《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中西接触和中国问题的发生》、《中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等系列论文,在知识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并于1935年结集为《中国问题的分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论文体现了王造时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但还只是学院中的学理分析、学术探索,他很快就要破墙而出了。

在王造时回国之前,胡适、罗隆基等就在《新月》这个平台上向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发起了第一轮冲击,史称“人权运动”(或“新月人权运动”)。在罗隆基、胡适遭到迫害、相继北上之后,王造时成为《新月》后期的一员大将,发表了一系列政论。1931年8月,他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成就了《新月》最后的辉煌:

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建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原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卖官鬻爵,引用私人,收入中饱,

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狐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要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

这样痛快淋漓、锋芒毕露的文章,矛头所向,“流氓皇帝”蒋介石几乎已呼之欲出,这篇文章成了他在《新月》的最后一篇文章,“几乎使新月书店被反动当局勒令关门大吉”。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玩弄“下野”游戏,王造时才幸而未遭什么迫害。10月10日,王造时写出了《救亡两大政策》,提出第一项救亡政策是“对日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第二项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这本小册子由新月书店出版,并向上海和全国发行,产生了巨大影响,王造时迅速成为民间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人物。

在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的同时,他和大批有声望、有影响的著名知识分子一道发起了历时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针对汪精卫、于右任(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所谓“要实行真正的宪政,一定要经过训政时期”等论点,1932年5月13日、14日,这位“手无寸铁的教书匠”在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三大报上同时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汪精卫、于右任二氏的言论》,逐一反驳了汪、于“反对结束训政”的那些理由,他的论证可谓鞭辟入里,

既有毋庸置疑的逻辑力量,又浸透着现实批评精神。6月19日,他又在《时事新报》发表《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的长文,以带有感情的笔墨,从宪政能避免革命和内战、宪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宪政是法治的基础和民治的条件等方面阐述了他主张实行宪政的理由,他接着写下这样一段话: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我们的生命,随时可以被人家陷害;我们的财产,随便可以被贪官充公;我们的住家,随时可以被人家搜查;我们的名誉,随时可以被人家毁诬。我们不能安全的耕种,不能安全的作工,不能安全的经商,甚至于不能安全的教书。……我们有的是无限的义务与剥削;我们无的是任何的权利与保障。……现在各国宪法,大概都有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规定。

只有实行宪政,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他之所以主张实行宪政的重要理由。他认为,如果不能和平方法达成宪政,就“没有理由否认人民革命的权利”。

这些文章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他所参与的这场历时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也得到了以孙科为代表的国民党开明派的积极回应。1933年1月,在孙科主持下,立法院成立了40多位立委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宪法。

办刊、办报、写政稿, 痛砭国民党腐朽统治

匿名信、带子弹的包裹邮件都没有让王造时屈服。1932年11月,他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执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国家“不应为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阶级所垄断”,“有违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任其居何地位,有何权势,皆应受同等的制裁”等主张。同一期还发表他的《国民党怎么办?》一文,一口气向当权的国民党问了13个“怎么办?”其中还提出了足以与罗隆基在《益世报》的“一国三公”社评相媲美的要

命一问,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这三个“中央政治会议常委”各居一地,“各有怀抱,不能合作,中枢久悬,负责无人,请问当权的国民党怎么办?”

《主张与批评》是王造时自行创办的第一个刊物,早在清华求学时期,他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主编,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负责编辑北京学联办的《上海惨剧》日刊,得到邵飘萍、孙伏园的赏识,请他主编《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共出了12期。这是王造时早年与报刊结下的因缘。留学时代,他在留美同学中建议每月省些钱,“作为将来回国办刊物的基金”,得到许多学子的热烈响应,创办《主张与批评》以及之后《自由言论》的经费一部分就来自这个“基金”。

12月,王造时接连发表《怎样打倒贪污》等文,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任何一个时代找不出这么多的贪官污吏;在世界各国政府里面,更恐怕再找不出像我们这样贪污的政治”,“贪官污吏简直是一群屠夫。”国民党政府成了“有组织的强盗机关”。他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提出五条肃清贪污的办法,包括选举和监督、文官制度、高薪养廉、严厉刑罚、开放新闻等。

这样尖锐的言论自然为国民党所不容,《主张与批评》只办了四期,国民党当局就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等罪名“秘密通令全国查禁”,被迫于12月15日停刊。王造时不服,向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抗议。

仅仅过了一个半月,1933年2月,他又在上海办起了《自由言论》半月刊,他说:“去年我们办了一种《主张与批评》半月刊,……我们自信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所以早就向政府提出取消该项禁令的请求,交涉至今,仍无结果,而外患的严重与国势的危急,已至千钧一发的地位,再不容许我们再事缄默,因此我们决定出版本刊,来继续说我们应该说的、并且不能不说的话。”杂志一出版,“四日内”就销售一空。由于经费匮乏,《自由言论》从撰写文章、约稿、审稿到编辑、校对,几乎都是他一个人。期间,他发表了《安内必先攘外》等与当局唱反调的政论,还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在《自由言论》上为人权大声疾呼,发表了《自由

之战争——民权保障运动》、《对内的平等》、《泛论爱国的功罪》等,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指控当局“没有法律根据”的“任意逮捕、拘禁、审问、处罚”,“捕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习惯。拘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手段。杀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威风。”他无比痛心地说:“只有在野蛮老不长进的中国,民权还要我们来争。”

高官厚禄没能收买他,装了炸弹和子弹的包裹也没有吓倒他。6月18日,中国民权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王造时也名列蓝衣社的黑名单,这是李烈钧特地给他看的,他将黑名单交给《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公开发表(这是美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中外舆论一片哗然。当局恼羞成怒,7月,他就失去了光华大学的教职,国民党还通令各大学不准聘他,他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一家九口一时生计无着。8月,在章士钊等的支持下,他开始挂牌做起律师,并应王云五之约替商务印书馆翻译《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等著作。哪怕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依然坚持办《自由言论》,直到年底被查封,共出版了21期。

一年后,他把自己“九一八”以来发表的25

篇文章编成《荒谬集》,以“自由言论社”的名义发行。他自述:

“九一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个事变。因为受了这种不可言喻的刺激,我才开始我的政论。起初是出了一本小册子,后来是在报上发表文字,又其后是先后办了《主张与批评》及《自由言论》两种刊物。而结果是:刊物被禁了,书也教不成。为什么叫做“荒谬集”呢?因为我在言论上所得到的罪名是“言论荒谬”,其实内容是否“荒谬”,只有请读者来判决。

1936年3月、5月,作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王造时先后参与创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周刊)和《救亡情报》。

1938年5月,他在江西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吉安创办《前方日报》,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终于将这份资金、人才匮乏的地方小报办成不仅在江西、而且在东南地区、甚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1939年及1943年秋天,以重庆为中心曾两次掀起民主宪政运动,王造时也挥动如椽大笔在《前方日报》发表了《什么是宪政?》、《宪政与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政治家与政客》等一系列文章,与大西南遥相呼应。他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图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前排左起)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和冯英子等浸透着热血和智慧的国际评论也让人刮目相看。1942年6月,他在《前方日报》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以其远见卓识而被全国许多报纸转载,产生了很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他一心想把《前方日报》迁到上海,尽管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李惟果、上海市长吴国桢都是他的清华同学,吴为了敷衍他解决了一些房子,但许可证始终办不下来,这一计划只能化为泡影。

《前方日报》在偏僻的吉安坚持到1949年。1948年5月9日,《前方日报》在创刊十周年的社评中自称“站在超党派的人民的立场”,“今日中国,实在太需要民主了!”这一天,王造时也发表了给报社全体同仁的公开信,他说,《前方日报》“虽是一张地方报纸,但在抗战当中,被文化界誉之为一张新兴的报纸,我们的社论被列为全国八、九种重要报纸之一,我们的专论常被别报转载。到了现在我们更觉得骄傲,因为我们环顾国中,深信这是一张比较自由的报纸。”“这张报纸没有背景,经济能力非常薄弱”,能维持十年以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首先来自他本人的人格担当、他身上坚定的道义理想。

国民党特务不断的恐吓、当局的“警告”乃至“暂行停刊”都未能改变其争民主的基本态度,十年间,三位总编辑遭到迫害:一被迫离开,一被逮捕,一被通缉。另有两位编辑、一位记者被捕,《前方日报》从来没有屈服。1949年5月,国民党当局出动武装强令停刊。“文人论政”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那个曾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王造时将渐渐遗忘。

终生未参加任何党派,认为国家本身不是目的

王造时曾几度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加入过什么政党,青年党的曾、左、李以中央委员相许拉他入党,他拒绝了。张君勱筹组国家社会党,拉他作为共同发起人,他拒绝了。李济深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请他当中央委员,他不参加。1938年至1940年,国民党要人孙科、陈诚、张群、陈立夫、陈果夫曾多次拉他入党“都被拒绝”。1940年甚至以他不是国民党

员的理由不准其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可他宁愿不当院长,也不上国民党这条船。1943年冬天,国民党通过他的老同学、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要他起草一部“适合最高当局身材的,切合国情的宪法”,被他拒绝。除了民族危机关头,他热心参与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连民盟等民主党派他也没有加入过,他只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

他在《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一文中说:“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抱如是的国家观,‘人呼我为牛,我应之为牛,呼我为马,我应之为马’。”

1949年后,他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与“七君子”中其他人的身居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是共产党对他1941年致斯大林的公开信问题“存有误会”。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正好他从江西到重庆,他受救国会委托,执笔起草了那封措辞、语气都很友好的、相当克制的公开信,共有沈钧儒、史良等九人签名,“反苏”这顶帽子却落到他一人的头上,其实他在1947—1948年的反美扶日运动中表现更积极,几乎当时在《大公报》发表的联名信都有他的签名。1949年5月,史良北上前夕特地看望他,并透露因为这封公开信的问题“共产党对他有误会”。因此,他只能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7年他之成为右派,也与此有关。

“文革”中(1966年11月2日),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入狱。1971年8月5日,这位曾以其热忱、言论、活动、书写过大时代的知识分子病逝于狱中,骨灰盒上写着他的原名“王雄生”。7年后(1978年2月31日),他获得平反,接着,“右派”也“改正”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后世的人们早已忘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过这样一个人,一个曾深刻影响了历史的人。1999年,《爱国君子·民主教授——王造时》在他故乡的江西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他生平的传记。一部像样的《王造时文集》至今尚未出现,更不用说他的全集。

(责任编辑 吴 思)

宣侠父—— 左联中的国民党中将

● 刘小清

20世纪30年代初,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文人云集的进步文艺组织中,竟然有一位黄埔一期生、官至国民党中将的秘密盟员,他就是宣侠父。

宣侠父为浙江诸暨人,留日学生,192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入黄埔军校,之后因反对蒋介石而遭开除。宣侠父长期服务于军界,在他一生中有着一连串赫赫有名的头衔: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中将政治部主任、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抗日同盟军军军委常委、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五师师长、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以及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等。这是驰骋疆场的戎马一生的体现,他的名字总是与枪林弹雨、金戈铁马相联系的。但是,正是这样一位一身英武之气的国民党将官,却是左联的秘密盟员。

其实宣侠父是一位智勇兼备,文武双全的难得人才。宣侠父很早即出版有著名的《西北远征记》。曾经读过这部作品的阳翰笙以“文笔生动、流畅、感染力很强”对其作了评价。

宣侠父虽然身在国民党部队,但作为中共秘密党员,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他又非常关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1931年初,宣侠父来到上海,当他得知进步文艺团体左联已在上海成立后,迫切想与左联取得联系。

当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阳翰笙受组织委

派与宣侠父见了面。

据阳翰笙回忆说:“他当时住在先施公司(或永安公司)的旅馆里,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30岁左右,长得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仪表非凡,说起话来干脆又儒雅,像文化人又有军人风度。他对人热情诚恳,我们一见如故,谈了很久,从左联工作谈到写作与出版,从他的西北军的经历谈到他的近作。”

此前,阳翰笙只知道宣侠父为黄埔一期生,是共产党员,但却未见过面。阳翰笙进黄埔工作时,宣侠父已离开了广东。以后亦听说他由李大钊委派进入西北军冯玉祥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但对他别的方面了解不多。这次见面后,阳翰笙才感受到了宣侠父儒将的魅力,因而才有他们的一见如故。

宣侠父从阳翰笙口中了解到当时左联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严酷岁月中,处境极端困难,很多出版机构以及期刊社都被国民党查封了,进步书籍出版很困难。当时宣侠父自己正在写自传体小说《入伍前后》,因此对出版界现状十分关注。于是他对阳翰笙说:“既然出版这样困难,我们是不是自己办个书店,我可以想办法搞点钱,交左联来办。”

对左联来说,这可是雪中送炭。阳翰笙闻之连连说好。

此后阳翰笙专门召集左联党团会议讨论此事。出席会议的有冯雪峰、夏衍、钱杏邨、田汉等人。阳翰笙向大家介绍了宣侠父的情况、这次与

他会面的经过以及他的建议。与会者均认为宣侠父的支持对左联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左联党团会议为此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指定由阳翰笙以后直接与宣侠父联系。

之后，阳翰笙又与宣侠父相约见了好几次，商定了几条意见，即资金全部由宣侠父负责，编辑工作由左联负责，书店的经营管理工作由宣侠父物色人选。现在即着手书店的各项准备工作，下半年书店开张。

宣侠父随即又提出要与左联其他一些作家见见面。当时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不便于集会，于是在阳翰笙的安排下，宣侠父分批与夏衍、钱杏邨、冯雪峰、楼适夷、杜国庠以及丁玲等人见了面。

丁玲对这次见面印象十分深刻，以后她曾在《回忆宣侠父》的文章中详细谈到了这一印象：

1931年夏天的一天，朋友通知我，有一位国民党的军官想开书店，邀请我们左联的几个人到他住地的旅馆去谈谈。我以一种最大的好奇心，去到一品香，很想见识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无从见识的什么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我一向对那些国民党的军官是陌生的，而且是仇视的。对这位军官，我只知道他想开书店，愿意和我们左翼文人合作，出版我们左翼的书，并且让我们主办杂志。我们筹议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将可以在这个书店出版了。

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前往与宣侠父见面的。之后，她又说：“我赶到旅馆，找到那间住房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到了不少人。我认识的有左联的华汉（阳翰笙）、雪峰，可能还有别的人，我记不清了……我仔细看那位主人，30多岁，黑黑的脸庞，长得五大三粗，如果穿上军服，一定像军官。可是现在看来，虽然身穿西服，却像一个刚从乡下来的中学校的体育老师，讲一口不太好的江浙官话，声音柔软，与他的外貌极不相称。”

经过介绍，丁玲知道他就是宣侠父。在与丁玲打了招呼后，宣侠父继续与阳翰笙等谈他一本书的构思。丁玲在一旁听着，很吃惊地发现这位“五大三粗的军官”原来也写小说。

这一晚，大家只是见见面，没有谈书店的事，只谈文学。丁玲以后说：“我用他的谈吐对证他的职业，听得出，他比我有多得多的经历，我只能

总是听着，看着，思考着。我最初的印象，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像一个乡村中学校的体育教员。非常朴实、温文、诚恳，是一个有思想，爱文学的以国民党军官为职业的人。这种印象是令人不得不思索的。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共产党员，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内做党的工作的秘密党员，这就解除了我的许多疑问。”

事实上，当时左联中有不少人起先也有很多与丁玲一样的疑问。在与宣侠父接触后，不仅消失了这些疑问，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敬意。

之后，宣侠父介绍了他的同乡同学周谦卿担任书店的经理。经过他的多方奔走，并通过杜月笙的关系，最终在英租界的七浦路找了一个铺面，另外还租了另一间弄堂房子，专门用来存放书和纸版，这是为了应付以后万一书店被查封时，书和纸版不至于受损。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准备并不是多余的。

书店开张了，这便是湖风书局。由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便是由湖风书局负责出版的。



宣侠父

据阳翰笙介绍，“当时左联和文总还需要办一个内部领导性的刊物，苦无资金，办不起来。这时侠父刚好又来到了上海，我问他能不能在经费上再想点办法？侠父慷慨地一口答应说：‘经费我包了。’就这样，由冯雪峰和楼适夷主编的左联和文总的内部刊物《文学导报》也同时办起来了。《文学导报》的前身是《前哨》，因《前哨》色彩太红，出版一期后不得不停刊。

《北斗》和《文学导报》成为当时左翼作家的重要阵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均在其中发表了大量文章。《文学导报》同时还刊载左联的各项重要决议和行动纲领，成为当时左联工作的指导性刊物。

由宣侠父出资办的湖风书局还出版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其中有鲁迅译作《小约翰》以及郭沫若、丁玲、阳翰笙、钱杏邨、夏衍、穆木天等人的作品。另外还有高尔基的《夜店》、《母亲》、《我的大学》等。以至在以后湖风书局遭租界当局查封时，英巡捕竟然说了一句：“这里简直成了高尔基书店了。”

宣侠父15万字左右的自传体小说《入伍前后》也是湖风书局出版的，这是讲述一个士兵的起义和曲折斗争经历的故事，具有炽热的革命主题，文笔生动，鼓动性强，在当时革命文学中是不多见的。以后阳翰笙说：“但因为内容太‘红’了，不便于公开出售，所以是内部发行，还假编了一个书局的名字，这本书赢得了同志们的普遍赞扬。后来我一直想再版重印，以为纪念，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找到这本书。”

湖风书局当时还是左联的一个活动据点，左联的同志们经常在那里碰头，商讨工作。据阳翰笙介绍，湖风书局“是左联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唯一的、自己出版的机构”。

一次，宣侠父到上海约见阳翰笙。当时宣侠父已在梁冠英的二十五军任高级参议，他希望左联能够派出一位同志到二十五军协助他做一些思想工作。之后，阳翰笙与当时“文总”党团书记朱镜我等商量后，认为这是件好事，于是便派杜国痒前去。不久，杜国痒化名林伯修与宣侠父一道前往二十五军任职。

这次，宣侠父与阳翰笙见面，还提出了一个出乎阳翰笙预料的问题，即宣侠父希望能够加入

左联。用阳翰笙以后的话说，“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份，公开加入左联显然不妥。后经左联党团组织决定，吸收他为左联秘密盟员，这件事只有几名左联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1933年4月，由于二十五军被调往鄂豫皖苏，宣侠父与杜国痒便离开部队返回上海。不久，组织上又调宣侠父到吉鸿昌部队，在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的抗日同盟军北路军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五师师长。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蒋介石下令通缉宣侠父。宣侠父秘密潜往天津与吉鸿昌会合。1934年1月，宣侠父陪同吉鸿昌到上海，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宣侠父被任为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在国民党军政要人中进行统战工作。

蒋介石对宣侠父十分恼火，在多次拉拢未果的情况下，决定实施暗杀。1938年8月1日晚，宣侠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回家途中遭特务绑架，就在车内特务用绳索将宣侠父勒死，然后抛尸一口枯井内。

宣侠父遇害，震惊了十八集团军以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为此曾多次找蒋介石提出强烈抗议。

宣侠父牺牲时年仅39岁，正如阳翰笙所说：“他的牺牲是我党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责任编辑 吴 思）

说 明

本刊今年第6期《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一文两处有误：李慎之逝世的时间应是4月22日；“这时，我在新华社任副社长，对干部的调动有审批之权。”此句重复，应删掉。谨此说明，并向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阎锡山之父的金融发迹史

● 王鹏飞

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阎书堂七岁入私塾念书，十四五岁时“辍学经商”，给人家商店当伙计。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是：“庄稼人赚钱靠血汗，买卖人赚钱靠手段。”因此，阎书堂开始习商，就在学习使用手段上下功夫。没有几年，他就学得貌似忠厚，心怀诡诈，人称“笑面虎”。

后来阎书堂在五台县城里开设了“吉庆昌”钱铺，资本约为五百吊。铺内有店员二人，一是梁世爵，一是阎锡山。他们在阎书堂的安排下，经营钱铺的具体业务。“吉庆昌”除经营少数杂货外，还放高利贷，出“钱帖子”。但是阎书堂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投机买卖上。当时交通不便，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时高时低，他便买空卖空。1900年他在一次大的金融交易中，下了最大的赌注，满以为这次可以发一笔大财，不料一败涂地。他卖掉铺内杂货还债，尚欠两千吊。持有“吉庆昌”钱帖子的群众闻讯，纷纷要求兑现。阎书堂实在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局面，便决定潜逃回家躲债。

父子二人在梁世爵等人帮助下，把钱铺残存的货物和家具，偷偷运回河边村老家，不再去五台县城。回村以后，阎书堂一筹莫展，每天到曲成喜开的“泉泰成”商店闲坐，有时也帮忙干点活，中午便在那里混一顿饭吃。到过大年时，债主们又赶来讨债，有的还雇人向他逼债。阎书堂白天躲在村里不敢见人，晚上才出来向人告借。曲成喜后来借给他一些钱，他才置办了年货，马马虎虎把年过了。

过了年之后，父子二人眼看在村里呆不下去了，便决定南下太原。父子二人连夜起身，到了忻县，阎书堂怕太原花销太大，便把阎锡山留在过去有交往的成钰东药铺帮忙混饭，自己一个人先到太原。到太原后，

他落脚于柴市巷“荣庆棧”，靠求亲告友过日子。不久，他经同乡介绍在太原与人合伙包揽土木工程，后来又在巡抚衙门“稿房”里找了个闲杂差事。阎锡山后来也跑到太原，他先在太原柳巷“裕盛店”当店员，1902年考入武备学堂，1904年被派赴日本留学。阎锡山出国时，阎书堂领到一笔安家费，这才敢回河边村老家安身。

阎锡山回国担任教练员和标统等职务以后，每月的薪俸，除了生活费以外，大部分被他父亲要去还债。辛亥革命后，阎锡山被举为都督，民国二年，他派岳叔徐一清到五台县按原欠六成付款，清理债务。有些人在无可奈何之下接受了这一条件，有些人鄙视这种作法，宣布不要，以落个人情。这样阎书堂的债务才算还清。

阎锡山后来搜刮民脂民膏是以百万、千万银洋来计算的，但是爱钱如命、贪婪吝啬的阎书堂并不以此为满足。一方面，他经营土地，先后在河边村强买好地五百余亩，除了修建房屋、祠堂、学校、商店等占用百亩左右外，其余四百多亩，雇用六家佃户替他耕种，他坐得三分之二的收获，每年约分粮食近三百石（每石三百斤）。但是，经营土地利润有限，商业高利贷和金融投机者出身的阎书堂，只是把它当做解决人畜吃粮的手段而已。

阎书堂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金融投机、放高利贷和经营商业上。民国初年，他又活跃于忻县金融市场。他在“聚德昌”存放银洋两万元，后来增加到七、八万元，专作投机之用。有时他亲自出马，更多的时候是委托经纪人替他交易或出放贷款和赁款。阎书堂坐镇河边村，每天九点以后，经纪人便到忻县警察局打电话报告当天的“数子”（白银、银洋和制钱的比价）做了

多少,谁家买了多少,谁家卖出多少,自己是买是卖,还要报告当天放出多少高利贷,收回多少,贷赁利息各多少。

后来,阎书堂又大开商店,在河边村开设经营绸缎布匹和杂货的“庆春茂”,经营粮食米面和烧酒、制粉的“庆春泉”;在忻县开设“庆春厚”钱庄(后改名“聚丰泰”);在太原开设“道生恒”药铺和“庆和堂”商店。不久,又在河边村以村民储蓄名义开设“协同兴”商店,以办理村福利事业为名,开设“河边营业公社”,以阎氏家族名义开设“思源远”和“积厚成”两家商号。这四家商号以村民或族人的少量投资为点缀,实际上大部投资都是阎书堂的,大权也掌握在阎书堂手中。因此,它们与“庆春茂”和“庆春泉”,被统称为河边阎家六大号。他还在河边村开设了无营业铺面的内庄“源记”,专搞高利贷业务。此外,太原的“复合公木厂”、“晋森木厂”、“山西营业公社”、“营远汽车公司”、“营记火油公司”、“德生厚银号”、“源积成银号”;天津的“亨记银号”,大同的“裕晋煤矿公司”,包头的“晋复邨农场”,晋北的“富山水利公司”、“广裕水利公司”和“广裕公司二支店”,河边村的“庆春木厂”,五台县和定襄县的“营业公社”都有阎家的大笔投资。这些商店和企业的活动颇有特色,经营手段五花八门,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利用金融手段牟利:“庆春泉”出“钱帖子”,并且印上“周行钱”三字。这种“钱帖子”通行市面,等于把群众的钱拿到自己手中作流动资金。它应该既能买货,又可兑现。但是阎书堂却暗中吩咐经理阎愈荣不予兑现。

利用雄厚资本操纵市场:1919年阎书堂投资2万元,在忻县开设了“庆春厚”钱铺,采取“想买先买”和“想买先卖”的手段,参与金融投机。他想卖出,必须提高“数子”以后,才有利可图,因而一上市就指使他预先约定的助手替他“拉黑牛”,首先大量买进。市上的“虎头儿”们见他们一来就买,以为行情有变化,也都抢着买进。由于买进的人多,“数子”就上涨,例如银洋与省钞的比价一上市时是一比七,很快就会涨到一比八或一比十。这时,他又大量卖出。反之,以贱价压低“数子”后,他又大量买进。这样,一买一卖,往往获利不菲,而不能摸底细的人,常常跟着他们倾家荡产。由于他们具有左右市场的能力,所以“庆春厚”的掌柜赵汝奎曾猖狂地说:“咱柜上想叫上涨就上涨,想叫下跌就下跌。”

利用信息优势搞金融投机:1930年阎锡山倒蒋失败后,山西省银行的钞票贬值,二十元省钞只值银洋一元(当时官定省钞二元五角值银洋一元,市价五元值一元,1932年以新省钞一元值二十元将旧省钞收回)。阎书堂不仅对战局变化了解较清,而且在天津等地都驻有业务人员,因而消息灵通。“聚丰泰”在省钞贬值之初,便在山西省银行和其他银行大量贷款,仅一次就汇过十万元。最后以银洋一元折抵省钞二十元还了贷款。对于号内存款不准提取。当时他接受存款,是按银洋与省钞一比二点五计算的,最后以一元新省钞顶二十元旧省钞结算存款,赚了不少钱。

利用政界关系获得定货:阎书堂经营的商号和投资的企业,当时的官府都给予照顾,有利可图的事他们都有优先权。例如,1913年成立的“复和公”木厂,因阎锡山和张瑜(阎的结拜老大)为主要股东,便由他来包揽太原军政机关的建筑工程和南北重镇兵营的建筑工程,造价高昂,质量低劣,验收草率,获利极为优厚。又如,阎锡山于1919年推销“和平戒烟丸”,1932年又制售“戒烟药瓶”(鸦片)都是由他的商店“道生恒”加工制作的,除了加工费外,用掺假减料等办法盗换大量鸦片,获利无数。

依仗权势获得成本优势:阎书堂在河边村经营的商店都直接从天津、北平等地采购货物并交山西采运处以军用物资的名义,由平绥路和平汉路运回山西转到河边村,不出运费或少出运费,因此价格比太原市的还便宜。于是,河边村的阎家商店,就成了五台、定襄、忻县、崞县等地商人进货的批发站。这几县的市场,基本上由阎书堂垄断。

由于阎家的企业,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因此牟取了大量暴利。当初,“庆春茂”的资金为二千元,“庆春泉”三千元,“道生恒”和“庆和堂”也不过二三元,但到1927年,四处股本已达三万五千余元。忻县“庆春厚”于1919年成立时,每股一千元,1923年第一次结账,每股分红三千元。改为“聚丰泰”后,1927年结账,每股分红一千元,1931年结账,每股分红九千一百元,1935年结账,每股分红四千八百元。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阎书堂靠着儿子的权势,便由一个倾家荡产的投机商人,变为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了。1934年12月阎书堂死去时,单他聚敛的钱财,据说就有六百万元。

(责任编辑 吴 思)

吴祖光与曹禺的文坛恩怨

● 张耀杰

吴祖光与曹禺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具有神奇色彩的两位天才剧作家。曹禺1933年暑假完成传世巨著《雷雨》时,只有23岁。吴祖光1937年写出大红大紫的成名作《凤凰城》时,只有20岁。1942年写出代表作《风雪夜归人》时,也只有25岁,夏衍看完后觉得不像是年轻人的手笔,于是便给出了“神童”的称号。“神童”吴祖光能够以并不成熟的《凤凰城》登上文坛并一炮打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曹禺的发现和扶持。

吴祖光的《凤凰城》

据吴祖光介绍,《凤凰城》是根据抗日英雄苗可秀的真实事迹写成的。苗可秀是东北人,东三省沦陷后,他离家奔赴战场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军作战,被俘后经日寇多方劝降,宁死不屈而牺牲于凤城县。

1937年的吴祖光,是国立戏剧学校里比不少学生还要年轻的校长秘书,《凤凰城》是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写成的。完成后交给校长、同时也是吴祖光表姑父的余上沅,余上沅虽然答应帮助看剧本,一个星期过去却没有看上一眼。吴祖光只好擅自取回剧本去向曹禺求教:“我找到了同住在校园里(长沙稻谷仓王氏宅院)的教务长、编剧课专任导师曹禺老师,简单说明了情况,把稿子交给了他。……第二天一早,曹禺先生就找到了我,他十分高兴地肯定我写出了一个好戏,并且认为这正是目前抗战的形势之下最需要而还没产生的剧本。……他当时就把校友剧团的负责人、毕业生余师龙找了来,叫他和剧团的同学们赶快阅读和研究这个剧本。”

《凤凰城》于1938年5月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汪德、余师龙导演。“正好剧中人当年的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先生来到重庆,他是苗可秀的校长。另一个剧中人赵侗亦来到重庆,他是东北青年铁血军司令苗可秀死后的接班人。这两个剧中人都参加了《凤凰城》的首演式。整个演出十分轰动,并立即影响及于全国,以至港澳和东南亚。是全民抗战以来第一个以抗战为主题的多幕大戏,亦是抗战八年以来演出场次最多的戏。”

1938年6月11日,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为筹办“战时戏剧讲座”,邀请参加讲座的各讲师和工作人员举行茶会,商定开班事宜,曹禺应邀参加。7月25日,“战时戏剧讲座”在重庆小梁子青年会正式开讲,第一讲就是曹禺的《编剧术》。置身于抗战洪流之中的曹禺,一上来便抛开自己原本与“生生地把‘剧’卖给‘宣传政见’”的“宣传剧”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抗战宣传剧找足了既继承传统又迎合时代、既正统卫道又进步革命的神圣理由:“一切剧本全都可以说有着宣传性的,不单是抗战剧。……我们的古人曾经说过:‘文以载道’。简单地说,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现在整个民族为了抗战,流血牺牲,文艺作品更要有时代意义,反映时代,增加抗战的力量,在这样伟大前提之下,写戏之前,我们应决定剧本在抗战期中的意义。”

在确立“文以载道”的抗战戏剧观的曹禺眼里,吴祖光的《凤凰城》就是抗战戏剧的榜样和标本:“实在讲,伟大的戏剧,好的结尾的动人之处,固然在结构的精绝,然而更靠性格描写的深刻。例如:吴祖光先生编的《凤凰城》,结尾苗可

秀死了,大愿虽然未酬,但是他的伟大的人格却更加深入观众的心里。假如依着一贯的公式,不顾真实,硬为凑成一个欢喜的结局,观众纵然一时鼓掌欢呼,但绝不及原来的结局那样深远动人,足以启发观众崇高钦敬的心情,激动强烈的抗战意识。”

关于曹禺当年大加称赞的《凤凰城》,晚年吴祖光在《“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一文中介绍说:“就是在我20岁的1937年,非常偶然地写了这个《凤凰城》,……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教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征总带着义仆张生,直到他殉国死难,完全是旧戏里公子随身的书僮那样的主仆关系。第一幕可秀和妻子分别,赵侗打趣,居然唱了一段京剧‘平贵别窑’。弟弟可英要随他参加战争,他劝弟弟要好好读书等……现在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这也说明,比起半个世纪以前的1937年,我到底还是进步多了。”

由这样一段话,不难发现曹禺随后写出的颇具自传性色彩的独幕剧《正在想》和四幕剧《蜕

变》,与吴祖光《凤凰城》之间深层次的微妙关系。

曹禺的《正在想》与《蜕变》

1939年4月,日本飞机多次对陪都重庆进行狂轰烂炸,国立剧校继长沙、重庆后,再一次奉命搬迁,被疏散到距重庆300里外的江安小县,设校址于城西紧靠城墙的文庙中。来到江安后,为配合自己的教学活动,曹禺把墨西哥作家约菲纳·尼格里的独幕剧《红丝绒的山羊》改编成为《正在想》,于1939年10月19日在校内首演。关于《正在想》,西德学者乌韦·克劳特在采访记《戏剧家曹禺》中写道:“一些人认为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剧作,有人甚至盛赞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笑剧’。……曹禺认为原作是个‘很富有乡土气息的作品’。他把该剧的背景搬到了北京天桥,那里是各种艺人麇集的地方。他写这幕剧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大汉奸汪精卫。‘但是,人们大多把它当成一幕滑稽喜剧,’曹禺告诉我说,‘了解它的真正目的的人很少。’”

《正在想》讲述的是一个与时俱进赶潮流却偏偏弄巧成拙直至丢掉性命的蹩脚剧作家和戏班班主的滑稽故事。剧中的老窝瓜是马家戏班的班主,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表演滑稽戏法的老行尊。眼见蹦蹦戏、说大鼓、单口相声、歌舞团之类的同行们生意兴隆,“傻好儿”老窝瓜忽然间豁然贯通,悟出了“要发财,得改行”的道理,决定以后专演最受欢迎的“话剧”。这位连中国汉字都不会写的“傻好儿”,竟然构思了一部被称为改良《平贵回窑》的文明话剧。在托门口摆摊的算命先生帮忙写出剧本之后,他专门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马天才”。在妻子小甜瓜面前吹嘘自己“我想的这几出戏,就够我万古扬名,以后,整千整万的钱,都归你”的“图名不图利”的“马天才”,到了群魔乱舞的观众眼里,却是一个任人取笑玩弄直至置于死地的“冬瓜甜瓜老窝瓜,一脑袋浆糊烂扒扒,加点酱油放点醋,就当作猪脑髓吃了吧!”的既可悲又可笑的“大傻瓜”。

无庸讳言,在老窝瓜“马天才”与小甜



曹禺与郑秀、女儿照于江安

瓜身上,是影印着、存活着曹禺与妻子郑秀的几缕身影和神韵的。曹禺与郑秀当年在清华园里,就是通过戏台上的扮演情人戏开始戏台之下的情爱追逐的,而吴祖光大红大紫的《凤凰城》,正是一部“手势腔调俱脱不了旧剧的气味”的“改良《平贵回窑》”。写作《正在想》的曹禺,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写出过像样的作品,更何况郑秀一年前已经生下大女儿万黛,养家糊口的担子不可推卸地落在了不善营生的曹禺肩上。相对于后生可畏的吴祖光来说,曹禺也完全称得上是老窝瓜“马天才”那样的老前辈、老行尊。正是在妻子郑秀的催促逼迫和吴祖光后生可畏的异军突起所形成的强大压力的推动下,曹禺才颇为急功近利地接连写出了《正在想》和《蜕变》。

关于曹禺当年由《正在想》到《蜕变》的精神面貌,吴祖光1982年4月28日接受田本相采访时评论说:“家宝这个人,你同他谈话,他时常出神,心不在焉,你问他,他说他没听见,他让你再说一遍。他根本没听你讲话,他在想他自己的心事,可能正在想着戏里的情节。他有一个动作,他右耳上有一个小肉瘤,俗名子耳,他经常摸着这个肉瘤,一出神就去摸它,张瑞芳曾说,这是曹禺的‘灵感包’,一摸它,灵感就来了。他有时还把一张纸叠起来,把顶部揪掉,展开来纸上有一个洞,他使用这个小孔去套那个‘灵感包’,可笑极了。还有,他平地上走路也摔跤,是因为他的左腿绊了右腿才摔倒的,可能也是心不在焉的缘故。他看戏的时候,也许他就没看,好戏还是吸引他的。他脑子里总是想他自己的事,他总是‘心有专注’。他胆小,拘谨,怕得罪人。”(田本相《曹禺传》第265页,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版。)

写作《雷雨》、《日出》、《原野》的曹禺,原本是“如神仙,如佛,如先知”般“升到上帝的座”的超人剧作家,到了《正在想》中,却变成一个只会写“手势腔调俱脱不了旧剧的气味”的“改良《平贵回窑》”的“傻好儿”老窝瓜。从《雷雨》到《正在想》,足以见出剧作者曹禺与时俱进赶潮流的变务虚为务实、既务虚又务实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曹禺接下来创作的《蜕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为了彻底摆脱人间地狱黑社会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而寻找到的一条不

须跨越从此岸到彼岸的鸿沟天堑,就可以直达天堂净土修成正果的通天大道。

《蜕变》中寄托着曹禺全部理想的女性人物丁大夫,通过在人间地狱黑社会的此岸世界里付出既替天行道地斗争革命又忍辱负重地奉献牺牲的沉重代价,先换来手握重权的政治救星梁公仰,对于人间地狱黑社会的“伤病医院”实施蜕旧变新的行政改革;进而在蜕变后的天堂净土式的新医院里,以替天行道受招安的专家功臣的身份,凌驾于包括政治救星梁公仰在内的所有同类和同事之上,修成被一营伤兵山呼万岁的唯我独尊、超凡入圣的天堂正果。沿着丁大夫的孙悟空加梁山好汉式的先替天行道再修成正果的“图名不图利”的人生道路走下去,便有了曹禺建国后在历次政治风浪中揭发和批判同事朋友的不正当行为,文化大革命中连他自己也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之中。

政治运动中的曹禺与吴祖光

1957年夏天,戏剧界的反右运动是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的。为了罗织罪名,党内人士擅自把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大鸣大放的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14期发表。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做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

在前一篇文章中,针对着这位在国立剧校时期比邻而居的老同事,曹禺颇为形象地描述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

在第二篇文章中,曹禺一口气摆出吴祖光的三把刀子。第一把刀子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领导的思想”。第二把刀子是“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一九四三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比当时还要坏!”最令曹禺恼火的,还是吴祖光牵扯和冒犯到他曹某人头上的第三把刀子:“譬如贤如

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

在1957年3月召开的作家创作规划会议上,曹禺曾提到一个创作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生活里面事实是怎样,作者的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是怎样”三者之间的“距离问题”。吴祖光认定这不仅是曹禺的“口是心非”,而且还是曹禺“剧本写不好”的一个根源。曹禺虽然不断表白自己的作品没有写好,甚至于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中忏悔自己是“挂羊头卖狗肉”和卖“狗皮膏药”,却容不得别人评说他的作品如何不好。于是,他摆出自己的《明朗的天》来进行反驳:“我曾经写过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在《明朗的天》里,我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而在我这一生仅仅写过很少的几本戏剧创作过程中,我最恨的也就是把写作当作虚伪宣传的工具。但是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在那段思想改造时期,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龌龊、太无耻……”(曹禺《质问吴祖光》)

相对于这种理直气壮的揭发批判文章,更接近于曹禺本人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的,应该是他多年后说出的忏悔话语:“吴祖光,我去南京剧校不久,他就来了,一起到了四川。……对于他,我要多说几句,我是对不起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时,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这些,我真是愧对这些朋友了。现在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这‘文革’中,我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我是欠着这些朋友的。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怕事,连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可是我做不了一些事情,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吴祖光

比起曹禺本人的忏悔和反思,曹禺和吴祖光在江安国立剧校任教时的学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刘厚生,对于曹禺既呕心沥血又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生,另有更加独到的分析和总结:“解放初期,他觉得共产党什么都是对的,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誉和待遇啦,要高得多,统统都有了。在经历了一段之后,他很清楚,每次政治运动过后,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了。这点,他看到了。所以,每到关键的时刻,他就犹豫了。是说真话,还是跟着表态?这时,他就不那么率直了。”

关于自己一生中所遭受的政治磨难,晚年吴祖光的概括是这样的:“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随着戏剧大师曹禺与同为戏剧大师的吴祖光先后去世,他们之间的戏剧情缘和文坛恩怨,已经成为过眼烟云般的陈年旧事,这陈年旧事之中,却隐藏着太多太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去探索、去追究。

(责任编辑)

李辛白 创办白话报 的爱国志士

● 马俊如 童毅之

李辛白(1875—1951),安徽无为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孙中山始创同盟会时的会员之一。1907年,同盟会派李辛白到上海,在同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蔡元培支持下,创办了《白话日报》。该报一反常规,完全采用白话文,宣传反帝反封建,深受广大平民百姓欢迎。用白话文办报,这在中国报业史上尚属创举,胡适推崇李辛白是“我国白话文的开山老祖”。该报发行约两年,因触怒英帝和清朝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年)岁尾遭查封,李辛白被迫逃亡至安徽芜湖,参加地下武装反清斗争。

1912年,李辛白与于逊臣合作,创办了芜湖最早的大型报纸《共和日报》。此报采用白话文,针砭时弊,宣传新文化。半年后,因受袁世凯《报纸律》钳制,加上时局动荡、经费困难而停办。

1913年,受蔡元培邀请,李辛白至北京政府教育部任佾事,他和鲁迅的交往自此开始。

在北大出版部的日子里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李辛白到北大担任庶务主任。时隔一年,北大规模扩大,新设总务部和出版部,蒋梦麟任总务长,李辛白任出版部主任。

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负责书刊杂志的审定工作。当时担任出版委员会的委员有:李辛白、沈兼士、胡适、钱玄同、陶孟和、王星拱、张才椿、陈衡哲、钱稻荪、张祖训、陶履恭、肖友梅等。由沈兼士、胡适先后任委员长。李辛白在委员中排名第一,并任出版部主任,负责全校书刊杂志的编辑、

出版工作。

出版部除出版教材、学术著作和讲义外,还出版期刊杂志,如1917年1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创刊的《每周评论》、1919年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新潮》杂志等,这些进步杂志在“五四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李辛白在这些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方面,总是全力以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新青年》杂志问世已历年余,新文化运动亦已发端,其锋芒所向,针对严重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旧思想、旧势力,这些观点与蔡元培的观念相吻合。因此,蔡校长把《新青年》派勇于革新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辛白等当作他整顿北大的有力支柱而一一延聘。从此,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进一步蓬勃向前发展。

1919年5月2日,北京大学联合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决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游行示威。5月4日早晨,北大八所大学公推北大负责起草宣言书。10时左右,北大学生狄福鼎返校向《新潮社》告知此事。《新潮社》推罗家伦起草《五四运动宣言》。旋即狄福鼎将“宣言”送交李辛白,请他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李辛白当即组织赶印,原定印刷5万份,由于时间紧迫,只印好2万多份,就匆匆送出散发。这是“五四”这一天唯一发出的印刷传单。

“五四运动”引发全国学潮高涨,军阀政府把这次学潮归罪于北京大学,“罪魁祸首”是蔡元培。“解散北大,撤免蔡元培校长职务”、“章、

曹以三百万金收买歹徒刺杀蔡元培”、“焚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等传言一时风起。蔡元培为了保护学校,被迫声明辞职离京出走。6月5日,军阀政府批准蔡元培辞职,由胡任源署理北大校长。这项决定一出台,北大和北京各高校师生在进行“惩办国贼”斗争的同时,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胡留蔡”运动,李辛白始终积极参加。他出席了5月11日召开的北京专科以上院校联合会成立大会,参加讨论代表会拟定的《上政府书》,并在《上政府书》上签了名。6月7日,北大召开教职员紧急大会,会上李辛白坚决赞同“挽蔡拒胡”的决议。

“五四运动”使作为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负有盛名,但北大校长蔡元培却受到了反动势力的集矢攻击,视蔡为眼中钉,必须拔除而后快,因此制造种种事端,一再加逼于蔡元培校长。其后蔡曾三度辞职,一次出国考察。在蔡离职期间,由“北大评议会”领头组成“联席会议代表团”和“临时委员会”集体商讨做出决策。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现存的上述会议录中,多有李辛白的签名。他是“联席会议代表团”和“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从这些会议录中可以看到,李辛白是始终不渝地支持蔡元培和进步学生同北洋军阀作斗争,坚定地维护蔡元培所开创的北大新局面。

创办《新生活周刊》

李辛白创办的《新生活周刊》,是他在北大时期一项杰出的贡献。《新生活周刊》于1919年8月创刊,1921年8月被迫停刊,一共出了55期,是五四时期很著名的小型通俗刊物。该刊32开本,七天一期,星期天出刊,由设在北京后门内东高房17号《新生活》报社公开发行,并开办了一个“老百姓”印刷所,承担印刷及外来业务。

李辛白创办这个刊物,是想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扩大到民间去。该刊思想新颖,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富有战斗力。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都积极为该刊撰稿。李大钊署名“守常”和“孤松”,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60多篇,都是短小精悍、笔锋犀利的时评,是《新生活》最有分量的文章。

李辛白在《新生活》创刊号的启事中说:“本报的宗旨是,希望四万万同胞睡到五更半夜,摸一摸心,想一想,打算一打算,在这欧战告终、皇帝将绝种的新世界新潮流中,何以谋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国家的生活。本报内容不顾全什么门类,哪一期有什么,哪一期就登什么。总之,无益的事不记,无益的话不说。本报定价极廉,希望各省各县诸君酌量定购,分寄到内地去,送送朋友,也是一种特别的礼物,越能传到农村越好。”

《新生活》发表过大量的有关反帝爱国运动的纪实报道、评论、杂感、小说之类的文章,向人民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第一期就发表了高一涵的《青岛伤心史》(连载)。高用演义体裁详尽地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围绕青岛问题,列强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历史史实。

1919年10月10日,北京市5000名大中学生捐款买了17万只面包,在面包上印有“劳工神圣”、“推翻专制”、“打倒官僚”、“不用仇货”等血红色的字样,将全市分为27个区,每区一队学生,推两大车面包,沿途散发给穷苦人民,同时发表讲演,散发传单。李辛白就这一事件,亲自赶写了一篇题为《国庆日的北京》,刊登在《新生活》第9期,对这次活动作了生动的报道。

1919年11月21日,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了3万人的集会,抗议日军屠杀福州人民的暴行。除了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外,还强烈要求商界抑制日货,与日经济绝交。在群众压力之下,北京市商会会长安迪生当场签字,担保北京全体商界遵照执行。李辛白在《新生活》第十七期及时以“北京国民大会”为题,详尽地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

《新生活》在反对军阀官僚,要求民主权利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李大钊在《新生活》第6期发表的《赤色青色》随感中说:“世界上的军阀怕赤(赤军的赤),中国现在的官僚政府怕青(青年的青),这都是他们眼里危险的颜色。”李辛白在第一期发表的《告自讨苦吃的青年》的随感中说:“你们说的什么仇岛(指日本)”,就是他们(指军阀)的衣食父母,所以你们爱国的行动,他们当然是认为大逆不道,是谋叛,是造反,自然要派出鱼行(指安福系)里的小伙计来找题

目,告你们,捉你们。”这两篇杂感虽都很短,但揭露军阀勾结外帝、仇视青年的嘴脸,却是入木三分。

李辛白在《新生活》第17期发表的《我明白了》这篇随感中说:“八年以来所借的外债用到哪里去了?我们小百姓卖儿卖女的租税用到哪里去了?国家为什么穷到这步田地?国家为什么乱到这步田地?我近日在报上看到两条新闻,我才稍稍地明白了:

一、东方通讯社消息,曹锟、冯国璋、张勋发起组织一个强国实业公司,资本一万万元。发起人分认1000万元,现正分电各省军政长官,请其赞成……

二、徐恩元与美国资本家合组一中懋银行,资本1000万元,中美各半。张勋认50万元,冯国璋认30万元,黎元洪认20万元,段祺瑞认20万元……

李辛白在《新生活》第21期发表的《国民之耻》这篇随感中说:“现在人谈起时局来,对于议员多说‘某是张作霖的人’、‘某是张敬尧的人’、‘某是倪嗣冲的人’、‘某是李厚基的人’。对于官僚多说‘某是段的人’、‘某是冯的人’、‘某是徐的人’。这些话仿佛和‘这哈叭狗是张大哥的’、‘那鹤鹑儿是李二哥的’一样的口气。但是这些哈叭狗、鹤鹑儿的先生们,却硬要做我们小百姓的代表,硬要做我们小百姓的大公祖、老父台。”

李辛白在《新生活》第二十期《琐碎话》这一栏中发表文章说:“中国报界惯例,每逢新年第一号的报,必要刊出‘恭贺新禧’几个大字。我想中国现在的现象简直要退化到酋长时代了,试问‘新’在哪里?全国四万万人,除去大富大贵少数的军人官僚外,十个就有九个不是冻饿而死,就是被压迫蹂躏而烦闷苦痛要死了,试问‘禧’在哪里?本报新年缺礼,请阅报诸君千万原谅。”接着又说:“人到临死的时候,良心一定会复现。我想前代大总统冯国璋临死的时候,一定曾扪心自问:一、为什么头尾不过八、九年,竟发了这么大的家私?二、为什么于民国开国第七年,忽然召集一个临时参议院?”最后他说:“各省关卡,对于小百姓,就是一担米、十斤盐,都非完税不可,何以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十万斤烟土,居然无税从

奉天运到湖北?”

李辛白在《新生活》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抨击时政和执掌北洋政府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骂得他们狗血喷头,大快人心。在当时杀机四伏的环境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敢说敢写,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实在堪称是正义的喉舌、勇敢的报人。

《新生活》在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知识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在连载的《谈天》中,揭露了关于鬼神、天道等等骗局。《科学常识》一栏常常登载一些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解释和物理化学的浅显原理,既丰富了读者的知识,又提高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此外,《新生活》还发表了不少讨论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同等受教育和改良学校方面的文章。

《新生活》的主要对象是平民,文字通俗简短,结合实际,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多种多样的形式,编排成生动活泼的版面,售价又低,因此深受社会欢迎,发行面很广。从毛泽东当年主办的“文化书社”的材料上可以看出,《新生活》与《新青年》、《劳动者》,在湖南均是发行量最多的刊物。在其他各省以及日本、南洋等地,也拥有众多的读者,享有很好的声誉。

《每周评论》上的二首白话诗

《每周评论》是陈独秀、李大钊在出版《新青年》的同时,创办的一个革命报纸。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为声援爱国学生运动,在北京城南新世界娱乐场前,散发反政府传单《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消息传出,各界哗然,纷纷抗议。李辛白积极参与各种渠道的营救活动,曾和王抚五教授代表北大教职员前往监狱探望和慰问,并在《每周评论》第30期上发表了《怀陈独秀》的白话诗: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这首诗,文短意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和两个阶级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诗句脍炙人口,流传全国,堪称“五四”时期

最佳诗篇之一。

为了讴歌“五四”运动的伟大胜利,揭示黑暗社会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李辛白以满腔激情,写下了一首白话小诗《动》,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9期上:

天色黎明了!

树上的鸟,草间的土虫,唧唧呱呱地叫起来了!

孩子醒了!

老头儿、老婆子,一家人被孩子嚷醒;

看见曙光,把窗纸射得雪白,他们一个一个也不得不起来了。

都起来了!

天大亮了!

创办《第一小报》

1925年,李辛白在北京创办《第一小报》,曾配合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同章士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章士钊又名行严,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25年5月被赶下台,7月又重任教育总长。章在任期内采取了一系列倒退措施:制定《出版法》,限制出版自由;草拟整顿学风令,声言以严厉手段镇压学生运动;禁止男女同校,排斥白话文,规定初小四年级起必须读经。章并在7月份办了《甲寅》杂志,作为复古倒退,向新思想、新文化猖狂进攻的阵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立即在革命的刊物上和章士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李辛白对章士钊早期的学术思想颇为赞赏,但对章任了总长后的倒退行径深为不满,便以自己办的《第一小报》为阵地,发表抨击章士钊的文章。其中有名句为:“使名记者秋桐(章早期在日本曾以秋桐为笔名发文,力主出版自由)若在,则章士钊不敢食言矣!”吴稚晖也和李辛白站在同一战线,在《京报》发表《讣文》,文曰:“不孝友生,罪孽深重,祸延府君章行严……府君生于前甲寅,死于后甲寅。”章士钊此时除受到鲁迅等人迎头痛击外,李、吴两支笔又同时指向他,更让其狼狈不堪,一时又使得《第一小报》在文化学术界广为流传。

从北京逃亡,在南京办报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命令卫队向在执政府前请愿的学生群众开枪,当场打死47人,打伤200余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

面对迅速高涨、如火如荼的抗议活动,段执政府竟公然下达通缉令,通缉所谓暴徒首领李大钊、徐谦等6人。3月26日,传闻段祺瑞准备颁布第二批通缉名单,其中除重申徐谦、李大钊等6人外,还有李辛白、朱家骅、蒋梦麟、马叙伦、周树人、高一涵等共49人。

李辛白得悉后,匆忙至市内北海暂避。由于风声日紧,他潜行逃亡至天津,搭乘海轮于4月初抵达上海,再乘轮至安庆,过江后回返夫人刘冰仪的故乡——贵池。

李辛白早年在家娶妻吴氏,生有一子,取名国寿。1903年左右,李辛白在南京与刘冰仪相爱结婚。刘冰仪系安徽贵池人,毕业于南京江南第一女子师范学堂。李辛白在贵池城内的儒林巷自建有二室一厅的寓所。他多年奔走于民主革命,回到风光绮丽的贵池,获得了短暂的休憩。

同年除夕前,北大好友沈尹默教授专程前来看望,并亲笔为李的寓所题写春联一副:“明媚湖山,悠闲岁月”。这一段时间里,原北大的一些南下避难的教授,大都和他保持联系。1927年初,李辛白不甘蛰居,前往南京。经陶行知介绍,先到私立安徽中学教国文。在南京立住脚后,他着手筹办《老百姓报》。经几个月的多方奔走,在辛亥革命旧友的支持下,得到西北军的经济帮助。通过当时任内政部次长张吾华的关系,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老百姓报》于1928年初,在南京创刊发行。李辛白任社长,李蕴初任主编。《老百姓报》的宗旨是:“面向平民百姓,为民喉舌”。报纸为四开四版,每三日发行一期,每期刊头都登载四个方块字,供启蒙者读认,是一种通俗报纸。李辛白经常亲自采访,曾以“素”、“老实人”、“辣”等笔名发表评论、随感及纪实文章,所撰文章针对时弊,敢说真话,短小精悍,深受读者欢迎。当时冯玉祥住南京晓庄,他十分关注该报,只要三、五天看不见,马上就要秘书查

询,并和蔡元培每月分别资助200元、40元用于办报。

南京是蒋家王朝的大本营,在专制统治下,虽百事百非,也不容他人指责。《老百姓报》问世不久,因讽刺时政,立言偏激,故政治压力不时袭来,迫使多次更改版期,几度被迫停刊。报纸持续办了将近三年,最后于1930年冬报馆遭当局查封,李本人被通缉,被迫离宁逃亡。

熠熠发光的晚年

李辛白步入晚年之后,仍然壮心不已,生命不断地熠熠发光。1930年岁尾,李辛白返回无为故乡,在侍奉老母同时,与挚友王鹤天合作,在无为创办了“尚实学社”,为家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并在出生地湖陇乡下,捐资办了一所方巷小学,由夫人刘冰仪主持。1932年,李母病故后,他经安徽省教育厅长、前北大学生杨廉推荐到宣城中学主讲高中国文。他满腹经纶,教学得法,学生极为敬爱。1935年,他就任徽州中学校长,兼教国文,集中全力投入教学和学校建设,成绩卓著,备受全校师生爱戴。

“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战火迅速蔓延沪、宁。李辛白于8月临危受命,继吴天植之后,担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1938年初,日军沿江西上,开始空袭安庆。国民党省政府各厅弃下属于不顾,仓惶撤往皖西山区。李辛白闻讯后,立即召开全馆人员的紧急会议,讨论应变措施,动员大家共赴国难,为保护国家财产尽心尽力。当时省馆藏书近10万册,特别是1933年在寿县出土的718件春秋楚器,尤为珍贵。李辛白在会上果断决定:将出土楚器,在藏书楼后面空地掘坑深埋,并急电向中央博物院报告求援。李辛白先派馆员张志丹负责将善本图书及线装古籍3万多册运往桐城罗家岭度藏,继派馆员赵小梅将普通图书4万多册运往六安。这些书都装入赶制的200多只大木箱内,雇用民工400多人,分两批肩抬上路,跋山涉水,历尽辛劳。中央博物院接电后,很快拨出专款,派来专人,在李辛白协助下,将楚器安全运往重庆。待省馆图书文物转移停当,安庆已成危城。李辛白才草草收拾行装,过江返回贵池家中。

1938年8月,日军侵占贵池,李辛白举家避难山村。稍事安顿,李便办起塾馆,免费为十多名村童破蒙。翌年,经好友支持,在深山建了三间茅舍开办“南庄学院”,招收失学青年,免费入院学习。避难期间,他虽经济无来源,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忧国忧时,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精神,未尝稍减。

1940年春,李辛白受聘在省立休宁女中和私立安徽中学教高中国文。1941年春,经好友敦促,李辛白出任私立建国中学校长。

1942年春,国民党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为纪念他就读上海大学时的校长于右任,在歙县创办了右任中学。黄绍耿亲自登门劝驾,李出任右任中学校长。1943年,为了潜心教学,坚决辞去了右任中学校长职务,到绩溪孔林省立高级农校教国文。1944年,安徽学院皖南分院在休宁万安镇诞生,他应聘到该校任教授。

1945年8月,李辛白突然收到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寄来的请帖,邀他到重庆共商国是。使他激动不已,但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路途遥远,交通阻塞,无法成行,只好复函深表感谢。

1946年7月,皖南分院并入安徽芜湖学院,李辛白到该院继任教授,兼任建国中学校长。与此同时,他在贵池筹备成立了昭明国文专科学校,并招生开课。该校由许世英任董事长,陈演生兼校长,李辛白任副校长。1947年秋,李辛白辞去安院教授和建中校长职务,主持昭明校政约一年,后因校内有少数人拉帮结派,严重影响教学,作为创始人,他感到非常痛心而愤然辞职。不久,他又应聘到南京私立安徽中学教国文。1949年春,因病辞职,回到贵池家中疗养。

1949年4月21日,贵池解放之夜,他率领群众箪食壶浆,迎接大军进城。翌日,贵池召开欢迎解放军大会,李辛白代表各界人士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1951年,他病卧床榻,且日益沉重,医治无效,于7月病逝,享年77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本刊编辑部说明:本期《侦破“天津特别组”始末》一稿,因非典时期编辑和审查手续不够完备,决定撤下,换成《李辛白:创办白话报的爱国志士》。

中国道路：20 世纪的两次选择

● 应克复

刚刚逝去的 20 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值得省思。

至关重要,中国应当走什么路,在一个世纪中进行了两次历史性的选择。

第一次选择发生在 20 年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党,效法苏俄,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经 28 年的艰苦奋斗,于 1949 年夺得了全国政权。

在革命行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这次选择的历史正确性。

他写道: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当时知识分子的眼光中,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很可以救中国。中国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后,更是“一边倒”,一心一意“走俄国人的路”,师效苏联搞社会主义。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主政下的社会主义,倒也不是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如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就是一大“中国特色”。从“三反五反”,“三大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不过,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所建立的体制,中国与苏联则是一脉相承的。如农田集中,共同耕种。如消灭私人资本,消灭市场,国家作为全社会资产的所有者,进行计划生产和分配。再如,权力高度集中,出现领袖的个人权力驾于党、国家和国家法律之上,“个人崇拜”狂潮泛滥不已。文化

上则是“舆论一律”,任何异见都可能招致大祸临头。这种体制,虽也使社会获得了某些进步,但更多的是不断地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在不断地坚持中不断地遇到挑战。

到“文革”后期(1976 年),国家的经济已濒临崩溃。原先的种种美好承诺一一走到反面。“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中国向何处去?历史的挑战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考虑作出新的选择。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思想在这次重要会议中起了主导性作用。全会之后,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清理历次运动中的错误和错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猛烈冲击了僵化的教条。中国人开始反省过去所走过的路。接着,“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刘少奇、彭德怀等大量冤案平反昭雪,人们纷纷议论毛晚年的错误。

1978 年的三中全会,是党经历多次深重灾难后的一次醒悟,也是中国发展的一次大转折。

24 年后的今天,再去思考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应该意识到,这是 20 世纪中国人的第二次选择——告别“俄国人的路”——的开端。

1991 年,发生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重大事件。这是这一体制的内在逻辑发展之必然。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曾任苏共中央书记)指出,苏共垮台是因为它长期坚持“三垄断”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特权制度。

这一不幸结局,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严厉的警示。

1992 年,年迈的邓小平毅然南下,发表重要谈话,力排改革就是“改向”的质难。不久,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告别“俄国人的路”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历史的进程使我们愈来愈清楚,20 世纪中国人的第二次选择,就是告别“苏俄模式”,走世界文明的共同道路。时下的话语就是“与世界接轨”,或“接轨”、“转

型”。所谓“改革”，就是改掉“苏俄模式”中背离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那一套制度、体制、规则；所谓“开放”，就是接纳与建立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那一套制度、体制、规则。

如果要邓小平的理论作一个概括，那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他不可能引导我们走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特别是他多次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他光辉复出的极有限生涯中，不可能实现其全部目标；重要的是他开辟了这条道路。他是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作出第二次选择的领头人。这就是邓小平千秋功垂的历史地位。

当今中国的进步（或者说“复兴”），就是一步步地告别苏俄模式，一步步皈依世界文明，即一步步地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对中国来说，这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困难还是不小。

今天，主导全球化潮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文明。这一点，我们应当承认。但麻烦也在这里。因为我们曾否定过这种文明，并长期作为讨伐的对象；因为我们曾闭关锁国，长期与这种文明相隔离；因为我们曾夜郎自大，自认为有悠久的文化和先进的社会制度；还因为，即使向西方学习，在如何学习问题上，也各执一端，争论不休达一个多世纪。“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就是两种有代表性的意见。80—90年代以来，又冒出姓“资”姓“社”叫喊声，阻挡中国向西方文明靠近。现在，姓“资”姓“社”的论调已被人们看破，失去了传播的市场；但“西化”一说，是贯穿20世纪的骂声，仍是国人的一块心病。

诚如袁伟时先生所说：“铁的事实是，给古老中国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流文化。”陈乐民先生对此也说了一句富有启迪的话：“中国的近代史是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的撞击并接受其影响而启其端的。”鸦片战争是列强的侵华恶行，却更是中国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开端。这早成定论。战争的诱因，若从中方反省，实因清廷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拒绝参与世贸。此次战争之后，紧锁的天朝国门打开了，西方文明扑面而来，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等的历史事件，这些都是中国脱离中世纪孽根的西化现象，其进步意义谁也不能否定。有鉴于此，康有为感慨地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而袁世凯称帝，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政治，是抗拒西方文明的铁定的倒行逆施。建国之后，闭关锁国，“全面专政”，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导致贫困、落后，也是拒斥西方文明对我们的惩罚。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先贤们早有洞见。如冯友兰说，所谓“中西之交”，乃“古今之异”。瞿秋白也明白地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姓“资”姓“社”的诘难也好，“不符合国情”的龃龉也罢，面对这些卓识，不知还有什么招数。

现在已是今非昔比。推行市场经济仅仅10年，中国的城乡面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但决不可言“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类的虚妄之说。对中国的家底我们时时要清醒的认识。“转轨”、“转型”也好，“改革开放”也好，“现代化”、“全球化”也好（其实，这些不同的提法，其内涵大致是一样的），如果作全方位的理解，任重而道远。

肇始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新路，其重心限于经济领域。虽然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向上推进，那么现代化只化了“一半”。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所有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只是在经济上与世界接轨、一只脚踏进了全球化的门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在于跨进现代民主国家的行列；因为经济的持久繁荣，国家的稳定康宁，人民的自由幸福，文化的推陈出新，都有赖于它。这方面，美英两国已作出了有说服力的示范。

当然，在政治领域，我们也有了不小的进步。如领导职务终身制业已废除，以依法治国深入人心，选举制度在逐步推行，法律体系在快速完善，权力制约在不断加强；民主、法治、人权愈来愈成为普遍的诉求，在提高物质生活的同时，人们迫切期待着提高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准。但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未有突破，还基本上在苏俄体制的惯性下运作。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时至今日，又过去22个年头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自然更不适应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改革要有新突破”。突破什么呢？就政治改革而言，关键是要突破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是人民的意愿，历史的必然。虽然艰难，但必须去做。

（责任编辑 致 中）

故事新学

——小说《K》引发的我对鲁迅《华盖集》的学习

● 于光远

我原有一本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方舟子写的《溃瘍·直面中国学术腐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他提的也很及时。当今中国存在官场腐败、商场腐败,而且很严重,大家有理由指望学术界能够坚持真理,在反腐败上成为中流砥柱。现在又出现了学术腐败这种现象,因此,十分注意,准备好地读一下这本书,写一篇读后感。可是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我把它保存着。它一定在我家里。可是当我想看的时候,忽然找不出它来了。有一天,我逛隆福寺商场,看到书架上有这书,而且有两本。当时我正在想把这本书找出来,没有下决心再买一本。可是回家后经过好几个月,还是没有找到它。我就决定又去隆福寺商场购买。可是货架上不见了。我问售货员小姐,她对我说,店里的确有这本书,可是因为长期没有人来买,现在退回去了。我从来不反对人们重视流行畅销书,我自己也常常买回流行畅销书来看,可是我对我国今天读者对严肃的、很有价值的书籍如此冷淡,还是颇有感触,不以为然。

也就在那天,我看到货架上有一本旅英女作家虹影的小说《K》。我看过她写的《饥饿的女儿》。这本小说,写的是“大跃进”中的故事,小说中描写的事情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的时候,可是重庆地区还继续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我重视这本小说,并且写过一篇文章。这次我看到虹影又有一本小说,就买回看了一下。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史的英国青年朱利安和武汉大学文学院长的妻子“林”的热恋性爱的故事。小说应该说还是吸引人的,加上书中还收有海内外对这本小说予以高度评价的文章作为附录。这本小说,我读后并不喜欢,但是觉得值得注意。

原先我以为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觉得小说里的女

主角“林”似乎以林徽因为原型。林徽因同徐志摩相识,徐志摩也追求过她。可是她很理智地与梁思成结婚。《K》这本小说中的“林”正好也同徐志摩有来往,可是,看来又不很像。

2002年10月我到武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宾馆见到我的一个朋友——我国著名女小说家池莉。我说起这本《K》。她说她知道小说中的那个“林”,实有其人。她不姓“林”而姓“凌”。她就是当年1935、1936年武汉大学文学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妻子凌叔华。凌叔华这个人,我真没有注意过。她的丈夫陈西滢倒是听说过的。鲁迅抨击过他,这件事我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做过武汉大学的文学学院院长。陈西滢的本名是陈源,这个名字还是这次到武汉,在一个晚上去武汉大学见到一位研究生物学的院士,问起此人,才知道的。大概很多人知道,而我却孤陋寡闻。我毕竟是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许多事情当时我注意得很不够。

由于《K》这本小说,讲了武汉大学文学院凌叔华夫妇的事,它就涉及上世纪20年代我国文化史的一页。同时这本书中那个男主角——那个英国青年朱利安(小说里用的是真名字),则是英国“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重要人物范奈沙的儿子。范奈沙和她的妹妹弗吉尼亚的沙龙,是这个集团的中心。因此《K》又涉及上世纪20年代英国文化史的一页。进一步说,陈源本人就是留学英国学英国文学的。聘请朱利安到武汉大学,就是陈源的主意。朱利安在到武汉大学后,写给范奈沙的信上就说,凌叔华夫妇最接近布鲁姆斯伯里的作风。中英这两页文化史,本来就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我比较早接触的有关布鲁姆斯伯里情况的材料是《万象》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最近,我在上海《文汇报》上看到朱利安在中国寄给他母亲范奈沙的信。

《文汇报》说这信是从上海《译文》上摘下来的。这个月初即 2002 年 12 月 12 日,我找到了译文的全文,题目是《朱利安·贝尔——发自中国的书信》。我还看到陈西滢的女儿状告虹影的消息。这场官司还没有打完,长春的法院作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虹影还在上诉。

和池莉在汉口的谈话,引发起我研究一下有关的这一段中英文文化史的兴趣。但是我对布鲁姆斯伯里的兴趣只有那么一点点。我并不想研究这段历史。对虹影小说《K》我就更没有什么兴趣了。我真正有兴趣的是研究上世纪 20 年代鲁迅和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斗争。

说来惭愧,自从 1993 年拙作《古稀手记》问世后,我来了劲,想努力争取成为一名“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而且请戈革同志刻了这九个字的一方闲章,表明我有这样一种志向。时间过得很快。21 世纪来了,而我是否成了“文坛新秀”,却很不好说。即使我不想宣布自己是失败了,但实事求是地也得承认,当一名文坛新秀十分勉强。我根本不会写小说和诗歌,想成为“文坛新秀”,只有争取写出若干篇略好一些的杂文随笔。鲁迅的杂文应该是我学习写作的范文,可是至今没有好好学习。自知我这个人的惰性特别强,因此也就珍惜外来的推动力。于是现在我就把看了虹影的小说《K》后与池莉的这次谈话作为一个推动力,学习一下同这一段文化史直接有关的鲁迅的杂文。这样的杂文从时间来说应该编在鲁迅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这两天看了些文章之后,有一些收获。

陈西滢何许人也?我弄清楚他大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1896 年生,1970 年死。曾留学英国。大概在 1924 年前不很久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他是《现代评论》的主将。《现代评论》是综合性周刊,1924 年 12 月创刊于北京。1928 年底出至第九卷第 209 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陈西滢、胡适、徐志摩等人。当时这些人被称之为“现代评论派”。使陈西滢在近代文化史上出名的,是在从 1924 年秋发生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中他的表现。当时陈西滢站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章士钊、执政段祺瑞这边,与女师大革命师生为敌,并攻击支持女师大的革命学生的鲁迅。于是鲁陈之间打了延续很久的笔墨官司。

人们大都只注意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不会去注意鲁迅在 1925 年直接参与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斗争的行动。1925 年 5 月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任讲师,直接了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斗争的情况。鲁迅仗义执言,主张女师大的教

授、讲师联名发表一个支持北女师大学生革命行动、反对校长迫害学生代表的宣言。鲁迅自己拟稿。稿成后,找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和国文系主任马裕藻,请他转请其他先生联名发出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署名的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畷、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这就是有名的“七教授宣言”。

不仅如此,在 1925 年鲁迅还帮助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起草过两件要求速撤杨荫榆呈教育部总长的公文。这两个呈文何日发出,没有明确记载,似分别在 5 月中下旬和 6 月。

这次我关心凌叔华的丈夫陈源和鲁迅打笔墨官司这一件事,得到我国著名杂文家牧惠的帮助,他把 1996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一书中的第二部分“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复印了给我。这就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书名,用了鲁迅在他去世前 44 天的 1936 年 9 月 5 日留下给亲属的一张遗嘱中的一句话《一个都不宽恕》为书名。鲁迅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就是鲁迅的人格、性格、风格!

在这本《一个都不宽恕》中,除收入鲁迅的作品最多,陈源的作品次多,一为 9 篇、一为 7 篇。此外就只有徐志摩给周作人的两封信和胡适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三个人的一封信。陈源的文章的基本内容,在鲁迅的文章和《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我已经知道,但是我还是想看到陈源本人写的文字。这样,我的认识或许能更深刻一些。

我过去虽然读过《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但是只是一看而过,没有更多留意。这次重读,我才明白那两年鲁迅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的确有它的特殊重要的意义。

属于“现代评论派”的人很多。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其中有好几位,我是与他们相识的,而且一直对他们很敬重。比如建国后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时,与副院长李四光就有接触。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他,我听到的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人们说他在地学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说他的科学见解对找我国某些矿产起了指导作用。又如我是上海大同大学学生,我喜欢这个学校。我在大同读书时,校长是曹惠群,已经不是胡敦复。但我听过胡敦复教的西洋史和穆勒名

学。他教这两门课,用的是英文写的书。他采取的办法是让学生一面注意学习科学内容,一面学英文。我认为这是个聪明的主意。至于鲁迅写的、在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建女子大学时,胡敦复“趁火打劫,攫取女大的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算起来应该是我到大同读书5年前的事,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也没有听说过胡敦复在五卅惨案后禁止大同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这次我重读《华盖集》有了一个看法,像李四光、胡敦复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有一个长处,是掌握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能同时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作出贡献,但是学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人,我认为还是应该警惕不要站在社会进步的对立面。

而陈源这样的只会舞文弄墨的人,只要他们站错立场就没有这种两重性了。

鲁迅反对的“现代评论派”中的人数很多。他们大都留学英美,陈源是有代表性的。所以鲁迅一般用多数的“他们”,很少用单数的“他”。鲁迅在这一类知识分子中看出他们之所以会充当既凶狠又腐败的政府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者,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因此他同这些人的斗争,坚决而且凌厉。

在这次学习中,我有一个体会,像李四光、胡敦复这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同阿Q类似,也是旧社会统治者得以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不过阿Q在未庄,而这些知识分子在大学当教授。他们自己不会那么看,别人恐怕也不这么看他们罢了。而且这样的人现在也还大量存在。我不知道这么看是否站得住脚。

鲁迅对这种人的战斗,是相当孤立的,但是他丝毫不让步,一个都不宽恕,笔下尖刻,不留情面,越战越勇,而且不断开拓新战场。1925和1926这两年在鲁迅杂文发展的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对陈源,鲁迅毫不客气,要陈源等“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要他们除下假面具,赤条条站出来说真话。”这话直接是说给陈源听的。同时也说给“现代评论派”的所有先生和女士们听。他在这里用的都是多数的“你们”。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说的话,差不多都写了。还想多说几句关于凌叔华。这是因为小说《K》的主角,不是陈源而是他的妻子凌叔华。我没有想到鲁迅的文章会提到凌叔华。在《华盖集》中一处没有明白指出凌叔华的名字。那是在《不是信》这篇文章里有一段话,说的是凌叔

华的事。这一点如果没有看过陈源的《剽窃与抄袭》,我是不会知道。

鲁迅在驳斥陈源诬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的问题时说,“历史和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但也不必两样。说诗歌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陈西滢在凌叔华的抄袭行为被揭发以后,就在《剽窃和抄袭》中为凌叔华辩解:“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心灵受到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鲁迅文中使用“天才”二字,就是针对陈源文中讲蠢才如何如何,天才又如何如何而发的。

还有一处鲁迅倒是点了凌叔华的名字。那是在对《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陈源指责鲁迅:“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进行答复时鲁迅说陈源:“绅士的跳跟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凌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把‘大盗’两个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

正如在写鲁迅驳斥陈源这件事当中,凌叔华占不了什么位置一样,在小说《K》中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现在知道是陈源)占不了什么位置。我特别写这两段,只是因为《K》中,凌叔华——小说中是“林”——是主角,而她的丈夫在小说中虽然必不可少,然而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出场的人物。我记得他似乎只上场一次。那是在“林”和比自己小8岁的朱利安一起在床上时,因为忘了关房门,“林”的丈夫有意闯进房来,弄得朱利安三年合同未届满,就回到英国。而且在小说中,这个文学院院长没有说过一句话。

关于凌叔华,我只知道她是广东番禺人,画家和作家,英文很好,能用英文写小说,并且在英国出版。我不知道凌叔华是否同陈源一样也在英国留过学,也同陈源一样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早就有某种联系。

(责任编辑 继学)

“刘三姐”黄婉秋的故事

● 郭 华

2002年金秋十月,正是山水甲天下的广西桂林山青、水碧、天蓝、花红、果黄、丹桂飘香的季节。

在如诗如画的桃花江畔“刘三姐景观园”,我会见了园主——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婉秋女士及其夫君何有才总经理。

黄婉秋主演的电影《刘三姐》使其名扬天下。她创建的“刘三姐景观园”坐落在桂林风景怡人的桃花江畔。这是一座以壮乡“歌仙”刘三姐为主题,集文化、艺术、观赏、娱乐、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景观园。是一座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巧夺天工的景观园。在这里,黄婉秋向笔者讲述了她艺术生涯的曲折经历和创建“刘三姐景观园”的过程。

剧团破格录取,圆了小婉秋表演梦

黄婉秋祖籍广东梅县,1943年12月出生于广西桂林。黄婉秋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百货公司的店员,母亲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家庭妇女。黄婉秋兄妹六人,她排行第四。



《刘三姐》剧照

说起黄婉秋的家世,有一点却是不同寻常。她的姑父是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的堂兄,论起来还算是“皇亲国戚”呢!

黄婉秋家境虽然不宽裕,但父母却勤劳和善,节俭持家。母亲虽不知书,却很达礼,相夫教子。孩子们个个都好学上进。黄父平时最大的嗜好,就是喜欢哼哼唱唱。

1956年,也就是小婉秋13岁那年,小学五年级的她正在休寒假,在报上看到桂剧团招收学员的广告。剧团规定,报考演员必须具备高小毕业资格。刚刚念完五年级,天性腼腆的小婉秋,不知从

哪来的一股倔劲儿,大胆走上考场,主动要求表演一段舞蹈。小婉秋长相俊美,身段婀娜,舞也跳得像模像样,肯定是个好苗子,尤其是她热切当演员的迫切心情,感动了在场的老师,决定对她网开一面,免了她的文化课考试,破格录取。

孰料,一向较为开明的父母,却不愿意自己的掌上明珠吃“开口饭”。因为旧社会艺人非人的遭遇,凄惨的下场,让他们记忆犹新。

小婉秋犯起倔脾气来,父母早已领教过。实在拧不过,只得让她写信给远在长春读军校的大哥,征求意见。在等待大哥回信的漫长日子里,她真是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看到一起报考的小姐妹,有的已进了剧团,这更让她心急火燎,百爪挠心。大哥支持小妹当演员的信终于来了,有大哥的支持,父母也就不再阻拦她了。小婉秋总算圆了自小就想当演员的梦想。

黄婉秋考入桂剧团的时候,剧团还属于民营性质,按照梨园传统,刚入科班的弟子要在祖师爷神像前跪拜叩头,拈阄取艺名。当时桂林大红大紫的三大花旦,艺名分别是玉芙蓉、黄琼仙、苏芝仙。小婉秋非常崇拜她们,特别想拈得一个带“仙”字的艺名,谁料展开阄一看,偏偏是个“群”字,真让她大失所望,鼻子一酸,晶莹的泪珠好像断线的珍珠,扑簌簌滚落下来。站在旁边的老师见状反而乐了,爱抚着她那乌黑的头发说:“我们写‘群’字的时候,真希望你能拈到这个阄呢!‘群’就是技艺超群的意思,好得很呀!”听老师如此一说,她破涕为笑,暗下决心,绝不辜负老师们的嘱托和热切期望。

聪颖过人,刻苦训练,使小婉秋技艺精进,在各剧种《刘三姐》剧目汇演中,她成为饰演刘三姐的最佳人选

黄婉秋艺名“艺群”,入花旦行,从此开始了她多姿多彩和颇富传奇的艺术人生。

艺群学艺的三年期间,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期,尚未成年的她在思想文化上经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这期间,艺群和广大文艺工作者、

中国传统戏剧一样,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但老艺人们的人生观,尤其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审美情趣、一丝不苟的口传心授的训练方法,都给艺群稚嫩的心灵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一般来讲,科班出身的老师都没有多少文化,演戏也没有剧本,更谈不上什么导演、表演理论。学戏就学“手、眼、身、法、步”,练习的是“唱、念、做、打、舞”等基本表演技法。戏要一出一出地学,完全靠老师言传身教。艺人们把舞台的上场门叫马门口,每当老师在台上演出时,学员们躲在马门口后面观摩,把老师们的一招一式默记在心。艺群聪颖过人,学习刻苦,对白、唱段教几遍就能记得住。同学们说“大头有宝,记性好”,戏谑地给她起了个“大头”的绰号。

艺人们把形体训练叫做“练功”,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绝非夸张。每天清晨起来,先端来一盆滚烫的热水,将女孩子们的小手泡在水里,挨个儿把手指往反关节方向使劲儿扳,据说只有这样才能高高翘起一对漂亮的兰花指。

为了让旦角演员在舞台走出远看似蝴蝶飞,近看犹如风摆柳般的小碎步,她们要用很沉的沙袋压在膝盖上,使膝关节凹陷下去。练腿功的时候,老师令小孩子背靠在柱子上,用力将腿一点一点往上抬,一直要使脚尖触及额头。有一次,老师用力过猛,艺群的腿关节受伤,又红又肿,疼痛难忍。她吓坏了,深怕落下残疾上不了舞台了。老师只是把祖传的办法教给艺群:关节扭伤,用点口水抹在上面,揉揉就好了。艺群不敢不听,又没钱外出求医。每当深更半夜疼醒的时候,就用小手沾上唾沫,在被窝里揉啊、搓啊。这时她悄悄落泪,特别想念自己温暖的家。但为了圆自己的演员梦,她只得用“不受磨难,难成正果”的话鼓励自己,咬紧牙关,硬是挺过来了。

年近花甲的黄婉秋,每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不无深情地说:那个时候,思想纯朴得很,认为吃苦是理所应当的事。大家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学习了不少古典戏曲,传统文化中保留了许多美德,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大家养成了勤奋好学、谦虚纯朴的品格。

1959年,艺群满师那天,她献演的是传统剧目《斩三妖》,她在剧中饰演大妖姐己。以后,她又在桂剧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娘子等艺术形象。

195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了一次全区范围的《刘三姐》汇演。目的是让各剧种、剧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取长补短,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精品。

桂林市文化系统积极地参与了汇演。鉴于当地的彩调剧形式活泼,表演洒脱奔放,唱舞曼妙风趣,比较适合塑造传说中的“歌仙”刘三姐形象,市里决定由彩调剧团排演歌舞剧《刘三姐》。为了精益求精,将桂剧团、歌舞团、京剧团里所有适合饰演刘三姐的演员都抽调进彩调剧团。黄婉秋也被选入角色,担任刘三姐的C角。

这时,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苏里、作曲家雷振邦也莅临桂林,他们为拍摄同名电影做前期准备。黄婉秋的出色表演,给苏里、雷振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0年5月,正在南宁参加《刘三姐》汇演的黄婉秋,突然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邀她到该厂试镜,拟让她饰演《刘三姐》中的舟妹一角。

样片出来后,长影派人进京送审。在文化部电影局的审片厅里,列坐着多位领导和艺术家。看过自治区推荐的四名刘三姐饰演候选人的试镜样片,大家觉得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都和角色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时,著名戏剧家、时任艺术局局长的田汉慧眼识珠,他对导演苏里说:“我看,那个扮演舟妹的演员不错,是不是考虑让她演刘三姐?”众人都觉得田汉言之有理,也很合导演的心意。于是,黄婉秋就成了饰演刘三姐的最佳人选。

一片走红,名扬天下,但她十分清醒,老老实实地演戏,清清白白地做人

1960年夏天,电影《刘三姐》摄制组来到漓江之畔,顶着酷暑,冒着风雨,开始了紧张繁忙的拍摄工作。

黄婉秋基本功扎实又悟性很高,她认真听导演说戏,虚心向别人学,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越来越得心应手,表演起来挥洒自如,声情并茂。

1961年,《刘三姐》公映,海内外随即掀起一股“刘三姐热”。“一片成名天下闻”,黄婉秋如日中天,组织上给予了高度的表扬,“追星族”们成千上万的信件如同雪片一般飞向黄婉秋。这些信

发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海外。一位香港观众连续看了99遍电影,寄来99封观感后,并表示还要再看第一百遍。措词热烈的求爱信数量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过分。更有甚者,有的痴情郎已将户口迁进桂林,目的是为了和黄婉秋组织家庭。

在掌声和鲜花面前,年轻的黄婉秋表现得十分清醒,她更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尤其是作为一名女演员更要自重自爱,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其艺术人生的最高追求。

本来,观众还可以看到由黄婉秋主演的根据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故事改编的《宦娘曲》。黄婉秋已接到饰演女主角的通知,忽然又传来电影停拍的消息。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

“文革”使她遭受17年厄运,但在炼狱苦熬中,得到了人间真爱

“文革”刚开始,歌舞团造反派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指名道姓对黄婉秋的批判。造反派批判电影《刘三姐》“宣扬唱歌可以夺取政权,否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而黄婉秋本人则是一个“出身有问题、借电影《刘三姐》出了名,拿着50多元高工资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是典型的‘三名三高’人物”。一些人在其阴暗心理的驱使下,扬言漂亮的女演员肯定生活放荡,洁白无瑕的黄婉秋又被泼上了一身肮脏的污水,成了“政治上反动,生活上堕落”的罪人,险些丢掉了性命。

就在黄婉秋在炼狱里苦熬岁月的时候,爱神之子悄悄地走进了她的情感世界。“黄老师,给你药”,同在歌舞团的小伙子何有才勇敢地来到黄婉秋身边。何有才比黄婉秋小5岁,进团的时间晚,所以一直称她“黄老师”。

何有才是个苦孩子,家庭成分雇农,养父会点儿中医。生母走投无路时,把不懂事的他送给人家活命,时至今日他还为找不到自己的生身父母而苦恼着。何有才为人善良,对黄婉秋的才华、人品和相貌,既爱慕又钦佩。每逢黄婉秋被批斗挨打回来,他便从父亲那里抓几付跌打药,给她疗伤,用宽心话安慰黄婉秋那已近崩溃的身心。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曾经铺天盖地而来的山盟海誓,都随着政治气候的骤变而无影无踪。俗话说:患难见真情。黄婉秋在认真思考:什么是人间真爱?!

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何有才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比起那些趋炎附势、甜言蜜语、利欲熏心、忘情负义的人来说,何有才却有赤子般纯真的爱情。当耀眼的光环刹那变成带血的枷锁时,只有心甘情愿和你一起背负十字架的赤子,才是你终身至深至情的最爱啊!

黄婉秋与何有才恋爱的消息刚一传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歌舞团院子贴出大字报,讽刺这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畸恋,辱骂男小女大是“不负责任的互相玩弄……”,黑枪暗箭纷至沓来。“革命派”更是气急败坏,把两人叫到一块训斥一通,强令他们必须马上分手,否则将采取“革命措施”。在遭到黄、何的反对后,恼羞成怒的“革命派”把何有才调出歌舞团,到绒帽厂当工人。

患难见真情。黄婉秋、何有才于1972年结缔百年之好。“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刘三姐》的一段唱词,成为忠贞爱情的见证。

婚礼那天,新郎在乡下老家摆了20几桌酒席,四村八乡的乡亲们都拥到男方家看新娘子,何家老屋前的人群比赶大集还热闹。电影上的刘三姐与生活中的黄婉秋太招人喜爱了。憨厚耿直的乡亲们大声喊道:“婉秋,嫁到我们贫下中农家里来,你就放心吧!”有人还学起《刘三姐》里老渔翁的唱词:“猛虎再起伤人意,老汉敲它牙三根!”从此以后,黄婉秋的生活稍微平静了一些。但她仍然不能登台演出,只能在后台干点整理服装的粗活。

“革命派”不给黄婉秋分房子,夫妻俩只能在郊区农村的小屋里栖身。每天晚上,何有才都准时来到剧场接妻子回家。剧场里的“革命派”不准他进大门,他不管风吹雨打,蚊叮虫咬,硬是在门外等候。把黄婉秋送上开往郊区的夜班车之后,他再骑自行车一路猛跑40分钟,到黄婉秋下车的地方再带她穿过田埂回家。如果黄婉秋赶不上末班车,何有才就骑车带她回去。这样的生活一直熬了十个年头。因为直到1982年,黄婉秋才彻底得到平反。

婚后几年,自治区文化厅的一位干部,在桂林

至郊县的火车上偶然遇到黄婉秋夫妇。只见黄婉秋一身粗布衣衫,用布兜背着嗷嗷待哺的小女儿;何有才挑着一对箩筐,一头装着家什杂物,一头坐着稍大一点儿子,宛然一对农家夫妇。这位干部喟然慨叹:“就是董永和七仙女,也不过如此啊!”

转眼到了春暖花开的1978年。一天,黄婉秋正走在大街上,忽然听喇叭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电影剪辑《刘三姐》。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路小跑奔回歌舞团。刚进单位大门,她便被一股激动的情绪包围起来,同事们兴高采烈,欢声笑语震耳欲聋:“《刘三姐》解放啦,解放啦!”

前文说过,黄婉秋直到1982年才算彻底平反,是在《刘三姐》被解放四年之后,黄婉秋才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九死一生的黄婉秋此时已近不惑之年,一个才貌双全、风华正茂的青年艺术家就这样含冤受屈长达17年之久。

平反之后她改作艺术、文化指导工作,又为精神文明建设四处奔波,在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创建了“刘三姐景观园”

80年代中期,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的著名作家周民震,将黄婉秋夫妇调到自治区歌舞团,任命黄婉秋为该团领导。90年代初,黄婉秋夫妇故土难离回到桂林,黄担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作为著名表演艺术家,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广西文联副主席、桂林市剧协主席。黄婉秋作为一名艺术家官员,从不摆架子,从不贪图享受,不停地为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四处奔波。

黄婉秋是妇唱夫随,何有才为了爱妻的事业与追求,心甘情愿地甘当配角,做一片绿叶。

黄婉秋对“歌仙”刘三姐一往情深。为了弘扬和传承刘三姐的人文精神,她上下求索。为了全身心地重塑刘三姐新形象,20世纪末,黄婉秋辞去了行政职务,这在当时来说还不多见。

“刘三姐景观园”的建成,是黄婉秋、何有才夫妇及其他有识之士一个大胆的创举,并且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责任编辑 吴 思)

诗人艾青在北大荒

● 赵国春

著名诗人艾青,被错划为“右派”后,王震把他找到家里谈话,劝他到北大荒来。第二天又亲自到艾青家里,动员他和妻子高瑛带领子女一起前来。

1958年4月,艾青来到北大荒后,王震再三嘱咐八五二农场领导:“政治上要帮助老艾,尽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触群众,了解农垦战士。”

身材高大、年近半百的艾青,在王震将军的关怀下,当时担任八五二农场示范林场副场长,他是当时来北大荒的1500名“右派”中惟一挂了职务的。示范林场当时刚建,场部就坐落在八五二农场场部东面四里地的密林中,四周是茂密的红松林,一条小溪在附近流过。艾青到示范林场上任那天,林场还专门为他开了个欢迎会。

王震部长在大会上说:“你们知道诗人艾青同志吗?他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来歌颂你们的。你们要像尊敬其他领导一样,尊敬艾副场长。在延安的时候,艾青就是名人,我在南泥湾搞大生产,当我的三五九旅旅长。”接着他向大家再一次介绍了艾青,对艾青说:“你是大诗人,不要忘了你是耍笔杆子的。要多积累素材,多反映英雄开发北大荒的业绩,这就是你崇高的职责。”

看起来当时艾青心情很沉重,他对着大家躬了躬腰,点了点头,语气忧虑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干。至于王部长说的我这‘大诗人’的桂冠嘛!请同志们以后不要再提了,大家是了解我的心情的。”艾青当时住的俄式木壳筑填锯末的房子,是八五二农场总场部当时最高级的房子。当时,总场部有四幢这种高级房子,党委书记李桂莲原是少将军衔,黄振荣场长和匡汉球副场长是师级干部,又是老红军,他们四家各住一幢。艾青每天早早起床,从总场部和他爱人高瑛,步行到示范林场上班,风雨无阻。

艾青干活有股犟劲。有一次总场号召大家上山搞“小秋收”,每人都有定量。他提着大筐随着大家上山采橡子,干得挺热心。内行人知道哪里有橡子,很快就采满了筐。艾青不懂得要领,等大伙走得差不多了,他才盖着筐底。他的犟劲上来了,不完成任务就不下山。示范林场上山的同志们都回来了,就缺艾青副场长一个人。那时山

上野兽很多,不要说狼,连黑瞎子都会白日露面。同志们都焦急地到山上去找,费了很大的劲,才在一棵大橡树旁找到他。见他正跪在地上的泥水里,用手指头从土里往外抠橡子呢。

在农场,诗人拿起搁下多年的笔,写出了以“老头店”为主题的长诗《蛤蟆通河畔的朝阳》、《踏破沃野千里雪》等,歌颂开拓北大荒的动人业绩。诗人在劳动期间,还写下100首《风物诗》,连同其它诗稿一起送上审查。上级一位负责人批道:“此诗看不懂,原稿退回。”诗人因此又沉默了。诗人曾说:“不是我的诗看不懂,而是我头上这顶帽子,压得我的诗也叫人不敢‘问津’。”

“老头店”,原来叫“蛤蟆通店”,由于日伪时期的“宝大公路”(宝清县至大和镇)从这里通过,上山打猎的、冬天进山伐木的,一般都在这里落脚。据当地传说:很早以前,一位姓田的老人带着一条狗住在此处,后来又收留了姓于的老头在这住。1956年前后,铁道兵部队有几个勘探队员,在这一带踏察荒原,曾得到老人的许多关照,有时领他们趟漂堡甸子,有时给他们热干粮、烧开水,有时队员们赶不回营地,就在老人家里过夜……有人说老田头是抗拒日本关东军抓劳工的避难者,有说他是个老猎人,还有人说,是一位什么隐士。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老人,就给此地起了老头店这个名字。时间长了,人们都叫这里“老头店”。

有一次,转业军官、他的浙江同乡孟达问他:“艾青副场长,听说你在写长诗《老头店》?”“嗯!”

他的“嗯”字刚说出口,就抬起头来,他警觉地问:“你听谁说的?”

孟达看了他那窘态笑道:“我不是奸细,我不会告发,你放心。”

作家钟涛也热情洋溢地用手拍着案子上一大叠写好的书稿说:“写文章是好事,你这个大诗人今天怎么也扭扭捏捏起来了!”

艾青同志红着脸说:“我当前的处境,暖!”

一天,艾青把新写的长诗《老头店》,拿给王震看,王

震看后说：“诗写得不错，但目前还不能拿出去发表。”

长诗就压下来了，诗人继续默默地干他的活儿。1959年底，艾青把王震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示范林场的领导。王震在信中说，他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问艾青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到新疆去一趟？林场的领导看艾青愿意换个环境，只好让他走了。

农场派人去哈尔滨买东西时，艾青说他在哈尔滨银行里还存着些钱，只要林场需要的东西，他都给买上了，

从不到会计那儿报销。到他离开农场时，有人又提起这件事，他把手一挥，深情地说：“感谢八五二领导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这些东西就算我艾青留下的纪念品吧！”

艾青虽然在北大荒才工作、生活了20个月，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用自己的稿费，给林场添置了发电机、圆盘锯、扩大器、话筒、电唱机等，每当人们看到林场那通亮的电灯、听到高音喇叭传出的优美动听的音乐时，都会想起大诗人艾青的音容笑貌。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全四卷)	萧延中 全价	88.60	10.00
之一 “传说”的传说		28.80	4.00
之二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20.00	4.00
之三 在历史的天平上		19.50	4.00
之四 思想的永生		20.30	4.00
回首残阳已含山	殷 毅	16.00	4.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门 祝东力	17.00	4.00
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	朱永红(全四卷)	69.80	7.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程门立雪忆胡绳	郑 惠	12.00	3.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4.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航天情——永远的眷恋	彭洁清	16.00	4.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4.00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25.00	4.00
陈昌浩革命生涯	范 青 陈辉汉	38.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	13.00	3.00
胡风传	梅 志	28.00	4.00
虽九死其犹未悔	叶笃义	15.00	3.00
生命的风景	吴冠中	23.00	4.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是由《党的文献》编辑部组织编写的，旨在将从“文化大革命”前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十多年间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以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依据翔实可靠的材料，以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将其来龙去脉呈现给读者，从而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所走过的这段历程。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这部长达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是在军委张震副主席的热情鼓励及关怀下写成的，由萧克将军题写书名。此书重点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概述了正面战场的战况和战绩，回顾了成就与过失，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借以启迪后人，指导未来。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本书展示了过去13年的大脉络，书中牵涉众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叙述了很多小人物和小事情。内容浩繁，见解独到，既有极强的政治震撼力，又有历史的穿透力。它展示伟人风范，却让普通人的悲欢成为众目所矚，它针砭世情时弊，却让我们看到了进步和希望。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中国历史“两大变局”管窥

● 官伟勋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变局”指的是：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第一次大变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尚在进行的第二次大变局。

第一次变局变了五六百年，定型后，延续了二千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仍在变中的第二次变局，还要变多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一次大变局”说的提出

春秋到秦汉为一大变局说，先见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顾炎武（1613—1682）；后有清朝的史学家、文学家赵翼（1727—1814）。而冯友兰先生则进一步做了明确阐述，并谈到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变局。

王夫之说战国时代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春秋以前是“封建之天下”，“其富者必其贵者”。即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奴隶）永远是平民（奴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指出周王朝是讲究宗姓氏族的社会。有了死丧事故都要告诉各国，说明他们之间的宗族姻亲关系。战国时代就不讲这些了，出现“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新现象。

他们已经察觉到战国时代跟以前不同了，发生深刻变革了。

春秋以来，随着铁器的普及，生产工具的改进、牛耕以及人口增多、私垦荒地的出现，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从而为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创造了生存条件。最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结束；国有（贵族）土地，变成了私有土地；严加看管的“千耦其耘”（二人为一耦，千

耦为二千人）“十千维耦”（二万人）的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变成了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

从此，君主世代为君主，诸侯世代为侯，卿、大夫世代为卿、大夫——贵族永远是贵族，庶民永远是庶民的老规矩，不再“成例相沿，视为固然”了。

靠着知识与能力，范雎、蔡泽、苏秦、张仪，“徒步而为相”；孙臆、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衣而为将”。春秋时代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贵族相残的现象也逐步绝迹了。秦汉以后的二千年，皇族靠弑君而登皇位的现象已罕见。从宰相到太守县令，经一定的制度从庶民中选拔的、只管行政没有领地的官僚机构，替代了以往大小贵族对各自领地的统治。

先变先强，后变后强；变彻底者御天下，不彻底者亡天下

第一次大变局由晋开始。

春秋大国晋国，地处华北大平原。这一带，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人口众多。

随着铁器的出现，这里较早地出现了大量的私垦土地和自耕农以及新兴的地主阶层。原来的封疆逐渐被破坏。由于土地兼并激烈，晋国先是出现“八大姓”，最终导致魏、赵、韩“三家分晋”。从此进入战国时代。

魏国在魏文侯（前455—前396）时已进行政治改革。掌权的已不再是清一色的世袭贵族。中央有了可以任免的相、将等官吏，在郡县设置了守、令。相国李悝（法家始祖）著《法经》，集各国法律之大成，“成为秦汉以后各代法律之基本”。李悝因此被称为“集权的地主政权政治制

度的奠基者”。

通过改革，魏国成了战国初期最富强的国家。其后，赵、韩、齐以及郑、宋等小国也相继改革。楚国是在魏国的吴起因受保守派排挤逃到楚国后，才开始改革的。经过改革各国的国力都增强了，连不起眼的宋国也成了“五千乘之劲宋”。

秦原来是西方的一个落后国家，各国都瞧不起它，把它看做夷狄之邦。“国际会议”也不让它参加。强盛起来的魏国赵国还多次攻占它河西的土地。秦孝公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富国强兵。正好商鞅入秦，他便重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在秦孝公全力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立军功则奖，私斗则罚；把提升官职与军功结合起来；宗室不立军功者不得有分，没有军功的贵族成了普通老百姓；尊卑爵禄等级，一律按军功重新规定，并按等级高低享有田宅、臣妾、穿不同的衣服；努力耕织产量大可以免除劳役；统一度量衡标准；全国普遍设立县制；开裂“阡陌封疆”，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等等。

变法后的秦国是个什么样子呢？晚于商鞅百十年的荀子这样描述了他“旅游”见闻：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川林谷美，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音乐健康），其服不挑（不奇装异服），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桡（恶劣），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荀子·强国篇》）

如此朴实的民风，如此廉洁光明磊落的政风，如此的政府办事效率，即使今天的人看了，也不能不佩服，不能不羡慕！如此之秦，怎能不雄视宇内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呢？

综观一部《战国史》，七雄之所以强盛，是因为进行了经济改革，农业发展了，国富兵强了。秦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六国之所以被灭亡，是因法家在秦真正当权，削减权门势力，集权于中央，实行彻底的足食足兵的

农兵制。一句话，改革彻底。其余六国政权虽也进行过一番改革，但都不彻底。赵国许多权力落在贵族手中，赵国每当国君新立，常有强大宗族的公子为争王位发生战争；齐国田氏势力强大，凡将相基本出自田氏，形不成一致的改革意见，更不必说推行。楚国更糟。楚悼王一死，反改革的保守派立即发动政变杀了吴起，改革夭折。执政带兵的始终不出昭、景、屈三大家族，政治极其腐败，“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百姓”，老百姓恨透了他们。

“周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虽亡，秦制仍为“万世法”

这是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说的话。周朝灭亡是因为它的制度不行，不是它的政策不好；秦亡不是因为制度不好，是因为实行了错误政策。



秦始皇

秦变(贵族世袭的)私天下为“公天下”,是势所必然。公天下“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世袭制,继位者不必贤,不继位者未必不贤,天下就难治了!

苏轼评论说:“论封建者”,“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文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志林》)称赞柳宗元的观点为千古不移之真理。

为什么呢?苏轼接下去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乱之始也。”他说:“自书契(即文字)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而汉以后,“君臣父子相贼虐者”都是王侯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靠才能选拔,就没有这种事了。所以秦制“当为万世法”!

秦在统一全国后,不考虑战后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医治战乱创伤,恢复生产,填饱肚子,安居乐业。却在派大军驱逐匈奴后,又征调几十万劳力修万里长城,大规模“移民”,大规模修宫殿、筑驰道。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更为关键的是秦始皇用人不慎,他刚死就被野心家赵高和不肖儿子胡亥篡了皇位。使秦的错误不仅得不到纠正,反而变本加厉了。终于激发民变,大局糜烂,万世基业毁于一旦!

成也汉董,败也汉董

秦虽亡,秦所开创的事业并没亡。刘汉王朝继承了秦的事业并加以完善,使这个模式一定是二千年。

最终使这一模式“定型”是秦亡后约半个世纪的汉武帝、董仲舒。虽说汉初也封过王、侯,但他们只食租,不治民。已没有行政权力。而且没多久又都废了。

说秦制“完善”于汉武帝董仲舒时期,主要是指这个时期确立了一整套适应当时经济制度与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的、汉武帝予以采纳并大力推广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是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他在对策“天人三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即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天人感应”理论就是他发明的。他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是人格化了的上帝。他的基本观念是:“道之大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还根据“阳尊阴卑”的观念,建立了“三纲”道德观。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使皇权、父权、夫权伦理观,成了巩固封建制度的不可动摇的浸骨入髓的精神力量。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中国人,都把这些教条作为天经地义。

除“孔子之术”其他一概“绝其道”的影响,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严重!它使封建社会稳定了二千年,也使中国社会停滞了二千年。

实际上,他所谓的孔子之学,是他按现实需要与他自己的认识修正改造了的儒学。他扼杀了儒学其他许多方面的生动活泼的东西。儒家当年培养出来的人才多方面的。既有军事家吴起,也有富等国君的子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儒家还培养出像李悝(子夏的学生)、吴起(曾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等法家著名人物。子路“可使治赋”,冉有“可使为宰”,公西华“可使与宾客言”。都是国家需要的管财政的、做行政领导的、办外交的人才,不是“一家的学者”。

“罢黜百家”延续到宋明理学与八股取士之后,路子越来越窄,把全国知识分子引向了死胡同。正如班固说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对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曹聚仁在读到这里时感叹道:透辟极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发财与做官,对人更有诱惑力的了!

从此,普天下的士子,一股脑都“皓首穷经”,把毕生精力耗尽在四书五经里,一天到晚吟诗诵词背章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心只为科举做官当老爷。什么数学、化学、物理学,什么英国、德国、法兰西!满朝文武一窍不通毫无所知。人家一打进来,又怎能不一触即溃望风而逃?

若像董仲舒那样,只允许他认为有用的一种思想存在,而且把这种思想简单地归结在一个狭窄的框框里,把其他一切人类有史以来的精神财富都“禁绝”,结果就必然扼杀社会发展所必需

的营养、创新的动力,阻碍新生事物生长,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第二次大变局”的提出与开始

第二次大变局,早在鸦片战争前已开始酝酿,到鸦片战争时进入急剧裂变阶段。

李鸿章应是早期察觉这一大变局的人物之一。不过,从他的原话“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看,他看到了这次大变局,却不认识从春秋战国开始的第一次大变局。那时唯物史观还远未传到中国,他能有这样的看法已经很不简单了。

把两大变局同提的是冯友兰先生,并分为三个时期,他说:

头一次大转变是在春秋战国,产生了一个封建主义的大帝国,它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封建制度发生根本动摇,第二次转变即从那里开始。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都是转变的开始。以后就算不再走弯路,过程也是漫长的。估计要到二十一世纪才能走完大转变时期。(《光明日报》86.6.23)

要说第二次大变局,不能不谈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随着“珍妮纺织机”、“水力转运机”与蒸汽机的发明,生产技术发生了决定性的革命。轻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铸铁炼钢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伦敦的人口,由19世纪初的几十万人,到1840年就达到了280万人。产品的大量增加,产生了占有更多市场掠夺更多原料的需求。新式交通工具的运用,又使这一野心有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它在占领了印度后,立即把下一个重要目标瞄准了中国。

这时的中国,还在浑浑噩噩地做着“天朝”梦,陶醉在“万国来朝”“四夷宾服”“远慕声教,倾心向化”的盲目自大中。自己什么都远远落后于人,又要以天王老子自居。英国人说,他们用一个方队,就能打垮百万清兵。面对这么一个软柿子,强盗下手了。一次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直到甲午海战,“天朝梦”破了。大清帝国成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二千年的帝制动摇,巨变开始。

二次变局的三大特征

第二次大变局与第一次大变局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师夷”,民主,改革动力与阻力换位三大特征。

先说“师夷”问题。

“师夷”问题的提出,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战争的惨败,使国人突然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军队、兵器都根本不能跟人家比。弓石刀矛根本不是洋枪洋炮的对手。林则徐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已先及我。”琦善说:英国人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英国人的炮位下,没有“石磨盘”,“中具机轴”,转动灵活。我们山海关的炮,是“前明遗物,勉强蒸洗可用”。由于痛感船不坚,炮不利,林则徐在广东竭力买外国船外国炮。为了了解敌人,他翻译出《四洲志》交给魏源,魏源据此写了《海国图志》,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后“洋务派”兴起,办工厂,开矿山,炼铁造枪炮,建纺织厂、设电报局等等,很热闹过一阵子。

甲午一战,“洋务”破产。发现只学技术不行。魏源说:“人但知船炮为西洋之长技,而不知西洋之所长,非徒船炮也。”认识到需要改革体制。游历过英国,精通西洋科学的王韬鼓吹学日本,说日本之所以比我强,是因为日本“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到过使馆区,见过香港高楼大厦、整洁街道的康有为发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也提出学日本,可把日本作为“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当做“识途老马,收其利,去其害”。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他大声疾呼:“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于是而有“戊戌变法”。变法又失败了。忧国忧民的先进人士觉悟到改良主义行不通,于是有了主张共和打倒帝制的“辛亥革命”。

民国了,照搬了西方的总统制、议会制。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没干几天,就被迫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倒台,黎元洪上台。黎元洪倒台,先后又有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再作冯妇)摄政、曹锟内阁摄政、段祺瑞总执政、冯军赶走段再摄



李鸿章(右二)签订《辛丑条约》

政,然后来了张作霖大元帅。倒台上台,从1912年到1927年,16年间,倒腾了9次;同一期间,内阁倒台更频繁,高达51次,最长的徐世昌干了1年5个月,汪大燮内阁8天,颜惠庆6天,伍廷芳5天,走马灯一样,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流氓、劣绅贿选议员,各找列强作靠山。议员在会上打,军阀在全国打,打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都为捞肥缺饱私囊而奋斗,闹得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什么事也干不成。

议会制也好,总统制也好,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封建专制制度根本不能比的。但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相当发展,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国民具有相应的教育程度与信息手段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成功。不看条件盲目照搬,不仅不会受益反会受害。我国民初与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都是无可否认的例证。

北伐后蒋介石上台,虽说远未完成真正的统一,但总算有了个受到国际承认的有了统一“法币”的政府。但他建立的是代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共产党和一切要求民主的爱国人士,终于被“师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推翻。

“师夷”,一步一步向更深层次发展。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师夷’已成为近代文化发展的主流。违反这一潮流的,无不立刻被冲倒。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进入,都属于这一潮流。”

(《光明日报》86.6.23)“师夷”也就是后来说的“西化”。

事实上,不管人们怎么看,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一直都在“化”。政府机构的设置、教育体制、公用事业、海陆空交

通、军队的编制与武器、金融商业、房屋建筑、通讯设施、生活用具,文化活动以至电灯、电话,从红绿灯到抽水马桶等等,无不在“化”。确乎是一直处在“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梁启超语)之中。

对于“化”,有的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有的则视为洪水猛兽,“背叛老祖宗”。

路威说过: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什么是他们独家制造的。转借乃是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

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本是很理性很正常的事情。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里曾称赞过汉唐气魄,说汉唐就不怕外来的东西,敢于拿来为我所用,就像对待俘虏一样。只有衰败孱弱的民族才神经衰弱,怕这怕那,怕外来的东西把自己俘虏过去。觉醒了的拥有无比深厚无比灿烂辉煌文化历史的中国人民,应该有比汉唐更雄大的气魄才是!

第二个特征:要民主,人民要当家作主。

“师夷”是手段,是办法。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才是第二次大变局的主题。

经过二千年的故步自封,通过列强的崛起与入侵,眼见政府的腐败与国家的落后,人们终于觉醒了。越来越多国人认识到:天下应是人民的天下,国家应是人民的国家。只有人民自己管理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的利益,创造美好的未来;少数人的专政,个别人的独裁,总要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于是,民主化、人

权、法治、依法治国诸问题,就成了封建专制被推翻后变革的最基本的课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就不能由穷变富,不能由弱变强。就不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权继续存在的受尊敬的一员。

实际上,早在晚清时的先进人士已冒着杀头危险提出民主问题了。谭嗣同就说:“君,未也;民,本也。”他明确主张实行“民治”(《仁学》)。梁启超也认识到:“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这些言论引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弹,疯狂围剿,攻击为“无父无君之乱党”。骂“一切平等,禽兽之行”,是“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张之洞耸人听闻地斥责说:“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为了减少阻力,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抬出了孟老夫子,说孟子早就主张“两院制”。因为孟子说过:“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查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去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查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康有为解释说,诸大夫就是上院,国人就是下院。国君要经过上下两院后,进行调查再做决定,这就是“两院制”。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不会使顽固派信服。

由于民主政治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致命问题,所以成了一切忧国忧民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反袁的二次革命,“五四运动”,打倒蒋介石政权,推翻三座大山,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中国的建立,为实现这一目标开辟了广阔大道,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与人治习惯的影响,要圆满完成这一伟大辉煌的历史使命,仍需我们继续努力。

第三个特征:动力与阻力的转换。

这是上一个问题的延伸。

向谁要民主?将触犯什么人?不言而喻,自然要向大权独揽者要,要触犯专制者的利益。这对于一个根本缺乏现代意识、缺乏民主熏陶、而又嗜权如命的独裁专制者来说,简直是与虎谋皮的事情。

因此,与第一次变局相比,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就换位了。

战国时代各国的改革,都是由各国君主主动重用杰出法家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七大国以及郑、宋、鲁等小国莫不如此。因为他们处于各国兼并空前激烈的严峻时期,他们意识到:要不灭亡就必须富国强兵,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改革,要改革就必然触动贵族领主们的利益,调动庶民与新兴地主及其他各阶层的爱国、生产与作战积极性。因此,国君就成了改革的主导力量,广大贵族就成了改革对象。

齐桓公用管仲,郑简公用子产,魏文侯用李悝,楚悼王用吴起,秦孝公用商鞅,秦始皇用李斯,都遭到了贵族的顽强抵抗。吴起、商鞅、李斯等人因此遭惨杀。

由于变革的性质与任务不同,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变了,而习惯于独揽无限权力的原有统治者,几乎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自动放弃这种权力的。

韩非子说过“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什么是国之利器?就是国家权力。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是个活生生的典型。

晚清灭亡前的半个世纪,实际掌权者是慈禧。颐和园里有条对联:“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天下母”一当就是五十年,的确是后无继者,以前也没有第二个。但若就她一旦掌握了独裁大权就决不松手,谁挑战就坚决镇压这点看,她便“后有来者前有偶”,绝对是千年一律的了。

今天,二次变局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决心有能力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理想与奋斗目标。我们党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

梁启超在二次变局前期说过一段话:“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操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所敢言矣!”(《变法通议》)只要变革没有最后完成,应一直以此话为警为戒!

(责任编辑 吴思)

在英国参加“令人愉快”的葬礼

● 李 岚

老牧师大卫走了。临走前,他留下遗言:葬礼要举行得简短、令人愉快。

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一遗言,直到葬礼举行的时候。

参加葬礼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很多,有认识他的,也有不认识他的,还有才来几天、仅仅听说过他的。尽管葬礼没有特别要求,大家都着了一身黑。中国人没有葬礼穿黑衣服的习惯,在海外也很少有参加葬礼的机会,许多人的黑衣服都是专门准备的。葬礼开始前,大卫的亲属传过话来:大卫生前热爱这些年青学生和学者,请他们都坐到前排来,离大卫近一点,离他的亲人们近一点。

按照大卫的生前遗愿,葬礼仅仅举行了半个小时。悼词在回顾大卫的一生时,选了很多充满幽默和趣味的轶事,令大家不禁笑了起来。形容他小时候的调皮,悼词开玩笑地说,“在学校里,他花在椅子下面的时间,比坐在椅子上的时间要多得多。”说起他对足球的迷恋,悼词描述了一件小事:在泰国工作期间,一天,大卫陪着几位英国客人参观一个村庄。忽然他跳起来,郑重宣布:“我们现在必须赶快回去,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千万不能失约。”待一行人匆匆忙忙赶回驻地,英国广播电台国际台的体育报道正好开始。

不知不觉,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是葬礼,忘记了大卫已经离开了他们。像往常一样,人们享受着一种轻松和快乐的气氛,仿佛又在听大卫说俏皮话,讲逗笑的故事。

然而,当仪式结束、大卫的棺木被徐徐推离教堂时,全场忽然一片肃穆,很多人都哭了。人们终于意识到,这是大卫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愉

快。几乎没有人相信,在这个生离死别的时刻,他们曾经笑过,曾经沉浸在快乐之中。它近乎不可思议,却当真发生了。它发生在大卫的葬礼上,来自大卫,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普通。乍一听,大卫的遗言让人有点意外。毕竟,这是葬礼,是一个最不可能产生愉快的时刻。但是,当这份愉快真正到来时,却没有人觉得奇怪。这就是大卫,这才是大卫。

熟悉大卫的人都知道,生活并没有厚待过他。他一生没有什么积蓄,住的房子很小,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平平淡淡、默默无闻。到年老时,和妻子先后在一年之内发现了癌症……可是,他对生活永远充满了感谢之心:快乐、风趣、乐于助人。他日复一日、开开心心地做着一些不起眼儿的小事,说些幽默的玩笑话,点点滴滴,给别人增添一分愉快。不知不觉,这些愉快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就像柴米油盐一般琐细而平常。人们习惯了它,把它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人特别注意过它,直到有一天他病倒了,检查出癌症。

在大卫最后的日子,许许多多人来看过他。他极度虚弱,却依然开着玩笑、不给人们悲伤的机会。他愉快地谈着未来的打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其实,他哭过。当医生说已经没有什么办法时,他哭了。他要求继续化疗,近乎固执。可是,他不想把这份悲伤给别人。

……大卫走了,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个永远的空缺。然而,他“令人愉快”的葬礼,却成为人们感谢生活的不尽源泉。每当想起它,人们就会想到大卫,想到大卫创造愉快、给予愉快的执著努力。

(责任编辑 吴 思)

有没有万能的思想

——精神现象零拾之四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人类一直期望着一种万能的思想，不但用以安邦定国，还要用以指导一切。有了这种万能的思想，只要照着去做，世界就会归于至善。

中国在先秦之时，还没有确认这样的思想。老、孔、墨、杨、农、兵、名、法，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其中有同有异、有分有合，使一段思想史异彩纷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推出了一种万能的、惟一的思想。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别的思想，而是不准有别的思想。从此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按孔子的理论去说，才叫“名正言顺”，然后因名设教，“天下太平”。各行各业，也都要依此行事，断案不以刑律而以《春秋》，退敌不以军旅而以《孝经》，治河、察变，要靠《尚书》，到后来干脆只要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了。这虽然都是极端的例证，但以为一种思想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却是当时流行的观念。有没有觉得孔子思想不敷用的时候呢？也有，于是就造假。造假的方法一是编造遗文，二是把一些并非孔子的思想通过不同形式硬栽到孔子头上，但儒学这面旗子是永远不能倒的，必须保有永远正确的形象。

一种思想要万能而且亘古不变，必须靠强力维持，恰如梁启超氏所说，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有以一字一句稍涉疑义，便成了“非圣无法”。于是，这思想也就变成了含有宗教性的教条。以宗教性教条统治社会，思想归于僵化，社会趋于停滞。这是中外历史都证明过的。在欧洲，为了推倒宗教教义这种万能的思想，经过了文艺复兴以后几百年的努力，而在中国，直到“五四”才动摇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推倒了一种万能的思想，并不等于人们就不再追寻另一种新万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发展着的理论，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的思想，不承认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但它传入中国后，却往往被奉为新的万能思想，成了又一种



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的新教条。好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可以找到万事万物的现成结论。只要熟记这些结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50年代，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经向学生提出治史的四把钥匙，即职官、舆地、年代、目录。不意因此引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痛加批判。理由是只要有了马克思主义这把金钥匙，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到了“文革”，更是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不许读其他任何书籍。“绝对权威”、“顶峰”、“一句顶一万句”一类口号和各种固定的仪式，把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变成了一本语录治天下的宗教式教条。那结果如何，已无需多说。为了推倒这种新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已经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尚未有成，因为总还是有人喜欢供奉一种这样那样的万能思想，好让他们少动些脑筋，靠几句教条混上一辈子。

中国除非不要前进，若要前进，先就要从此不去妄想什么万能的思想。诗曰：

思想万能貽笑柄，万能思想总难寻。
曾经挫折须针砭，革面还须再洗心。

炎黄春秋

2003/7 (总第 136 期)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

方 实 宋文茂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吴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郝爱存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书长 :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68522852 68534879 68532048

传真 :68532569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 (E-mail) 地址 :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